

B A N N E R

# 旗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漫谈

葛晨虹 等◎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旗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漫谈 / 葛晨虹等著. —  
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300-0337-4

I. ①旗… II. ①葛…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价值论  
—研究—中国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1698 号

本书为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旗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漫谈

QI ZHI

葛晨虹 等 著

\*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出 版  
北 京 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bph.com.cn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总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 京 京 华 虎 彩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7.5 印张 217 千字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00-0337-4

定价：39.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8572393

# 目 录

## 导 论 / 1

## 第一章 何以必要：中国为什么要建设核心价值体系

### 一、理论影响力：“软实力”原理充满硬道理 / 17

1. “软实力”理论出于全球国际竞争语境 / 18
2. 第三种“战争”：文化意识和“文化统治”在竞争 / 21
3. 话语权：现在世界上究竟“谁在说” / 25
4. 价值文化软实力与社会整合 / 29

### 二、现实价值观的“漂移”与“错位” / 33

1. 全景扫描：社会道德状况显露价值观生态 / 33
2. 精神家园的现代性失落与守望 / 36
3. 当传统文化遭遇现代性和市场经济 / 42
4. “价值消解”：文化多元与理论交错影响 / 44

### 三、共同价值观：一种必要的国家力量 / 46

1. 一个解读国家意识的新视角 / 47
2. 理论大众化：一种必要的国家能力 / 51
3. 再思考：走什么道路，要怎样的核心价值 / 55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

### 一、改变中国命运的一种“主义” / 61

1. 谁是“千年思想家” / 63
2. 走近马克思 / 65
3. 民族危机与志士仁人的救亡图存 / 69
4. 共和国：几代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梦想 / 72
5. 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的选择 / 73
6. 新的航程与理论指导 / 77

### 二、把握世界的思想“慧眼”和理论工具 / 80

1. 中国发展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有机统一 / 81
2. 剩余价值理论：揭示资本剥削的秘密 / 83
3. 马克思主义的人学：人的全面解放 / 85
4. 唯物史观：人类社会规律的认知 / 88

###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时代精神的生成 / 89

1. 马克思主义统领下传统精神的赓续 / 90
2.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精神与建设精神 / 92
3.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理念和精神品质 / 94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核心价值体系的主体

### 一、“十月革命”吹响社会主义号角 / 99

1.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开启人类新纪元 / 100
2. 苏联解体之历史洞察 / 102
3. 苏东剧变之省思 / 104

4. 百年激荡改变不了社会主义发展轨迹 / 107
5. 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与发展的历史“困途” / 109

## 二、共同理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112

1. 沉舟侧畔：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 113
2.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114
3. 社会主义与先进生产力和共同富裕 / 117
4. 中国与世界之间 / 119

## 三、中国特色“特”在哪里 / 121

1. 中国特色发展模式与中国“亚细亚”历史道路 / 122
2. 社会主义体制优势和集体主义价值优势 / 124
3. 社会主义与以人为本的宗旨特色 / 126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特点 / 128

## 四、“中国模式”的魅力 / 132

1. “中国模式”触动全球神经 / 132
2. “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133
3. “拉美模式”给我们的警示 / 134
4. “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 / 135
5.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模式” / 136
6. 中国模式宣告“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 139
7. “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 / 140

# 第四章 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是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

## 一、中华民族与民族精神 / 145

1. 中华民族的“名”与“实” / 145

2. 政治一统与文化一统 / 147
3. “和”字里面有乾坤 / 150
4. 勤而能勇者，自强不息 / 152

## 二、位卑未敢忘忧国：民族精神的不变语境 / 155

1. 爱国主义的两个概念 / 155
2. 爱国的“情”与“理” / 157
3. 现代社会的爱国“情理” / 159
4. 从“要爱国”到“我爱国” / 161

## 三、我们为何需要民族精神 / 164

1. 构筑民族精神家园 / 164
2. 增进民族认同 / 166
3. 凝聚民族力量 / 168
4. 展示民族形象 / 169
5. 推动民族发展 / 171

## 四、时代精神如是说 / 174

1. 时代问题与时代精神 / 174
2. 革命时代与革命精神 / 176
3. 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 177
4. 民族发展与中国时代精神 / 179

## 五、守望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 180

1. 诗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 180
2. 民族的文化乡愁与现代文明 / 184
3. 民族精神与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 186

## 第五章 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基础

### 一、荣辱：道德感之维 / 191

1. 荣、辱、耻 / 191
2. “羞恶之心，人皆有之” / 193
3. “仁则荣，不仁则辱” / 195
4. 荣辱观：一种价值共识 / 197

### 二、“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 / 198

1. 骑士精神与绅士风度 / 199
2. 《忏悔录》的启示 / 202
3. 日本武士的牙签 / 204

### 三、行为的底线在哪里 / 207

1. 价值错位之种种 / 208
2. 价值观漂移或扭曲的根源 / 210
3. 道德底线何以必要 / 213

### 四、道德的人：荣辱观的个体构建 / 215

1. 追寻美德，彰显“最美精神” / 216
2. 追求荣誉，拒绝虚荣 / 218
3. 坚守底线，“行己有耻” / 220
4. 知行合一，贵在“慎独” / 222

### 五、道德的社会：荣辱观的社会构建 / 223

1. “衣食足”与“知荣辱” / 224
2. 从“富之”到“教之” / 226
3. “让高尚者高贵” / 227

## 第六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

### 一、“问题意识”中的理性思考 / 233

1.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跟进状态 / 234
2. 多元社会价值观的并存与冲突 / 237
3. 不良价值观的规导缺位 / 240

### 二、核心价值观教育群体的重心锁定 / 242

1. 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 243
2. 党员干部的率先垂范 / 244
3. 学术共同体的责任关注 / 246
4. 注重青少年的“养成教育” / 248

### 三、优化核心价值的传播能力 / 250

1. 现代传媒的欲说还休 / 250
2. 传媒伦理的重申与规范建构 / 253
3. 把握自媒体时代文化传播中的互动规律 / 255

### 四、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建设 / 258

1. 加强理论构建与理论阐释力 / 258
2. 整合多元时代的价值共识 / 261
3. 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制度保障 / 264

### 后 记 / 267



# 导 论

一个国家和社会，想要秩序，要发展，要有国家综合竞争实力，必须建构起相应的表达国家意识、核心价值理念的理论体系和文化体系。马克思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sup>1</sup> 赛义德说：“文化是一个舞台，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势力彼此交锋。”<sup>2</sup> 阿尔都塞说，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在掌握政权同时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在这套机器中行使领导权的话，那么它的政权就不会持久”<sup>3</sup>。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中也对文化强国做了着重强调，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努力构建中国话语权和在世界上的文化影响力。在新形势下，党中央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多维复合式的国家治理能力中，文化是重要的一维。

中国文化“软实力”打造国际竞争力。中国理论、价值观及其文化，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一样，面临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也有来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9页。

2 参见韩少波等译：《赛义德：自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3 陈越：《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38页。

自国际文化竞争的挑战。国际文化竞争表现为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竞争，但作为国际竞合的一部分，文化竞争历来包含着价值观和思想意识观念的竞争。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此强调：“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思路中，也包括来自文化安全的把握要求。

今天的文化竞争力已和政治、经济、军事竞争力一起，成为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影响了美国，也影响了世界。美国前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也提出了“文化统治”概念。这一切表明，文化实力已在国际竞争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事实上，苏联的解体，原因多维，但意识形态理论的改变是一个重要原因。日本学者堺屋太一在《历史的波澜》中指出：“任何政权，只有两种情况会使它发生毁灭性的大变革，那就是丧失治安的能力和人们不再信任支撑它的文化”，他认为“使苏联社会主义体制走向崩溃的其实是”变化了的“社会主义文化”。

文化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维。诸多社会治理理论都很推重文化的功能，葛兰西曾将文化意识的社会凝聚作用比作“水泥”；社会功能学派把“文化系统”置于“社会系统”诸因素的首位，强调如过多社会成员拒绝社会共同价值观，社会系统就会崩溃。帕森斯在《社会体系和行动理论的演进》中强调，一个社会要达到整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社会成员在秩序中行动，二是控制社会行动在秩序内不冲突的规范化文化模式。

现代社会治理中，制度建设和规导需要强调，但制度治理不是唯一，在强调外在制度建构的同时，不应忽略精神文化的社会引导和人的心灵秩序建设。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克姆（Emile Durkheim）在研究“社会病”时提出，文化价值失范是引发社会无序、松散、人们迷茫甚至自杀的重要原因，指出在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在传统生活习俗、道德规范、信仰变化瓦解的同时，新的文化价值观如未能跟进，就会产生令人不安和困惑迷茫的社会阶段。某种意义上，现代社会片面“物化”的发展模式忽略或放逐了对精神家园、意义世界、高贵人性的追求，社会才会出现大量道德问题。

注重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注重构建当代中国价值观根基，构建中国话语权。文化具有价值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但其本质首先是意识形态属性。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但不是搞文化“产业化”“市场化”。文化建设从理论到大众文化，如不同国家核心价值观保持同一取向，社会共同价值观就无从形成。在关注“文化统治”和“文化冲突”的国际竞争时代，在国际多元价值意识竞争背景下，我们更要强化对“中国理论”和中国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自觉”和“自信”，注重构建中国理论及其文化的软实力，如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sup>1</sup>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文化强国要注重传承文明之道，守望精神家园，构筑“中国梦”。夯实国内文化建设根基，一个重

---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

要工作就是要从核心价值观建设抓起，从社会风气抓起，从思想道德抓起，从每一个人抓起。要加大核心价值观宣传力度，贯通社会合力，加强中国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道德观教育。在把“治理能力”作为主打词的今天，构建好中国价值文化，并通过“内化”使社会成员共享核心价值观，形成社会“共意”，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能力。

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执政党历来重视社会主流文化及其价值观建设，历代领导集体都是把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建设置于重要位置，视其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一系列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的理论与目标，不断推进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建党以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民族解放为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通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取得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大发展与大繁荣，社会主义制度得到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及主流文化也在不断探索中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些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的提出奠定

了坚实的政治、物质及思想基础。在继承与总结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在新阶段，党和国家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任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明确提出，是在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决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和谐文化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一域，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决定》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四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它们从不同侧重面表达了社会主义本质及其思想理论和价值取向。

社会价值体系解决社会“应然”价值取向问题。它表达并设定一定社会价值取向和理想目标，引导社会发展方向，规定社会发展目标，把握和调整社会各个方面的应然合理性。这些价值取向和理想目标深深渗透在政治、法律和经济生活等各个领域，无处不在地发生着作用。

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一定的价值体系，这个体系不可能是单一层次的，它应该是一个既体现社会先进理念，又体现社会广泛性要求的多层次、多样性的有机整体。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社会价值体系中居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的核心理念，也是一个社会相对稳定的需要普遍遵循的基本价值准则。社会多种价值取向和层次必须整合在核心价值观统领之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整合社会主义多样化价值取向的基本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社会主义社

会本质，表达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理念，从本质深处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和思想体系的灵魂，它引导着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目标。

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对社会多元价值取向的整合，源自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也依赖于全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共同价值观的认同。缺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中国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凝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社会主义发展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变质。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加强荣辱观基础建设，就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理念和基本准则进行普遍确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一元导向和多元取向有机整合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体系。而确立一元导向的社会主义共同价值观，对于保证社会主义方向，引领良好社会风气，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社会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具有决定性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涵十分丰富。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基础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信念所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动力源泉所在，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基础所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是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过程中，在执政理念和精神文化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建设的经验总结，也是

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在思想文化建设领域的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

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进一步提炼与概括，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又以“三个倡导”的话语方式，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个字为基本理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了不同侧重点的价值目标，为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确立了价值目标和理念准则。应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十二个词的基本内容以理念提炼的方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更概括的表达，每个词都蕴含丰富的内容，这些理念组合在一起，体现了内容全面的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确立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个价值原则。贫穷、落后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富强”不仅要实现国强民富，更要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重要一维即要建设富强中国，而“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重要特征。中国近代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实现国家强盛，人民的福祉与尊严才能拥有坚实的基础。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带来的系列社会问题也警示我们，只有实现共同富裕，才能实现人民的真正幸福与国家持续的强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民主”是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关键词之一，是国家和社会保持活力的基础，没有民主的国家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的社会必会走向僵化或专制，人民的主体地位和创造力也会遭到制约影响。

坚持民主,才能保证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平等自由和社会创造力,社会主义体制优越性才能得以体现。社会主义的富强、文明不仅指物质文明的极大富强,本身也包含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等政治领域内容的文明发展。

“文明”一直是中国优良传统的一个主题词。作为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历来重视道德,讲究君子之风,成就了中华礼仪之邦。现代中国应继承发扬优良文明传统,在全社会倡导并发展“文明”,提升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素质。有文明,才会有良好社会秩序与社会和谐。社会主义的“文明”价值取向,包含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社会主义的“文明”,追求的是“五位一体”全方位发展的文明。

“和谐”主要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的有机统一,是关乎人民生活幸福与安全的价值原则。实现社会“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直追求的社会理想,更是社会主义要实现的社会发展目标。和谐社会建设不仅需要富强、民主的基础,也需要法治与德治的良好协作,需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还需要人的主体精神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协调统一。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四个价值原则,相对而言是保证社会秩序与活力、保障人民权利与政治文明的基本价值原则。社会主义社会,首先必须是消灭了人压迫人的剥削体制,建立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的社会。倡导自由对确保人民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发展非常重要。我们所倡导的自由不是形式上的、少数人的自由,应该是人民群众普遍拥有的真正的自由与解放,它应当能够让人民群众真正处于主人地位,能够自由地工作、生活与创造,自由地选择和追



求自我的实现。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条件下，更应当倡导自由，积极创造条件实现真正的普遍的自由。

缺乏“平等”的社会，一定是不公平的社会，也是不稳定的社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实现的就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的人人平等的社会。当然平等不是平均主义，平等首先要求每个人的付出与回报总体上应成正比，平等还表现为社会成果不是被某些个体或集团所垄断，在“第一次分配”的基础上，还必须注重“第二次分配”的公平正义，注重社会主义改革创新成果由广大人民群众所共享。只有倡导实实在在的“平等”，社会才能稳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公正”是自觉人类的普遍追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立言之本和价值目标所在。我们倡导的“公正”要体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价值目标，强调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获得与责任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视域中的公正社会，应最大可能地满足所有个体成员的正当利益，并最大可能地使社会共同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以进一步提高所有成员的利益所得。这是社会合理性的要求，也是社会公正观的集中表现。公正在一般意义上表现为给每个人“得所应得”，“得所当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中的公正，还强调“以有余补不足”，强调成果共享，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特色，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

“法治”不仅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更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和社会安定有序的重要手段。国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十八届四中全会公告进一步强调了法治体系建设要务是：法治理论、更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

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遵循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中全会以此为主题，意味着国家上下在治国思路和执政党、政府职能定位方面已进入“依法治国”的语境之中。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相对而言是对公民主体提出的价值要求。“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宪法中规定的公民义务之首要一条。爱祖国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sup>1</sup>。爱国作为公民对祖国的一种价值观念，集中表现为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表现为维护祖国尊严和国家利益的使命感、责任感，表现为热爱祖国的河山、历史传统和文化，以及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同祖国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理念和感情。一个合格的公民，有德性的公民，应当为祖国的富强、民族的兴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敬业”要求我们做任何工作都应认真负责以事其业。敬业是中国传统美德之一，古人强调“执事敬，与人忠”“事思敬”。敬业是一种热爱本职、恪尽职责、追求职业理想的工作态度和精神。敬业是基本的职责要求，也包含着超越职业利益的奉献精神。爱岗敬业是个体生存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没有对工作的兢兢业业的态度与积极进取的职业热情，就难以建立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难以实现事业理想的成功，而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人民的福祉也都不可能实现。

---

1 罗国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3页。

“诚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强调的道德信条。诚信是人伦交往的基本规范，也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准则，当年学生问孔子如何理政，答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问必去时先去何者，孔子曰，去兵。再去？去食。“信，国之宝也”。可见对于治理国家来讲，“信”是重中之重。国“无信不立”，社会的诚信危机会导致社会风气败坏，人际信任及社会公信力失落，最终致使国家社会生活的无序。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在《信任》一书中曾预言，21世纪是信誉的世纪，哪个国家信誉度高，那个国家就会赢得更广阔的市场前景。诚信建设已成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在诚信教育基础上，还必须和社会法治、制度规导及社会管理结合起来，建设讲诚信、有信用的良好的社会秩序。

“友善”是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道德准则。任何个体都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个体“小我”应化在“大我”之中，用雷锋的话来说，即“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在大我、大爱和友善大德中延展个体生命意义。在社会主义践行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道德观中，也表达了友善的价值取向。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要求，传承了传统仁爱原则的精神内核，同时又对“仁爱”进行了现代创新，它不仅要求我们友善亲朋，也要求我们在今天“陌生人社会”中友善每一个人。它不仅要求我们与人为善，而且要求与物为善，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友善道德精神不仅关乎人性品质，也关乎社会人际和谐与国家发展，是国家发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重要道德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涵与外延上具有高度一致性。

首先，我党自成立以来便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经过九十多年的历史实践，证明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都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前提下提出的，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时期的理论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实现，必须以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前提。中华民族历经百年苦难，终于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通过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是我党同时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这种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进一步具体化，并概括为几大价值准则。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精神，也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更有“仁爱”精神与“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原则，这些优秀的民族精神和思想资源，需要我们的继承和发扬；同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现了飞跃，社会环境也变得更加自由，改变了以往那种“政治挂帅”的社会氛围，改革与创新精神被充分激发，并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种时代精神也需要我们继续坚持与发扬，基于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了对于传承民族精神和发扬时代精神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把这种精神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在全国建立一个简明扼要的价值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提供了更加清晰明确的价值准则与荣辱标准，有利于人们更好地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成果，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它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概括，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具象化。浓缩为二十四个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民众提供了明确具体的价值原则与道德规范，其简洁通俗的语言具有天然的亲和力，能够更好地为普通民众所理解与接受，真正发挥在全社会范围内的价值主导作用，进而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人民提出了具体的价值准则，只有真正让人民群众知晓并接受它们，从内心里认同，并能够指导人民的行动，这些准则才是有价值的。因此，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与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便成为全国上下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抓好这项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提出，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所做出的重要论断。

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工作进行总体部署，

提出原则要求。201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又印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对下一步要开展的活动、采取的行动作了明确安排，这是与《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相配套的文件，是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步骤。

在《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为培育和践行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核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从以下六个方面针对如何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了具体意见：一是阐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与指导思想；二是如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的过程中；三是如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四是如何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五是如何通过开展实践活动以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六是如何加强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织领导。<sup>1</sup>为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中，又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由于任何一种主流价值观念的确立，都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从现在做起，坚定地走好每一步，通过依据《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的具体意见，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所提出可操作性强的标准，推动以二十四个字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原则的普及与落实，逐步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全面提升国民素质与道德水平，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http://cpc.people.com.cn/n/2013/1223/c64387-23924110.html>。

# 第一章

何以必要：  
中国为什么要建设核心价值体系

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

中国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党应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摘自十八大报告

文化是一个舞台，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势力彼此交锋。

——赛义德

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想要秩序，要发展，就需要建构相应的国家意识和核心价值观。阿尔都塞说，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在掌握政权的同时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在这套机器中行使领导权的话，那么它的政权就不会持久”。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能否大众化而“落地”，能否使民众对民族、国家和社会发展目标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在“中国模式”中显现，这一切既是时代提出的任务，也是一种国家能力。

——摘自本书



“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今天耳熟能详的一个话题范畴。十七大报告中的这个主题词，在十八大报告中继续得到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sup>1</sup>。核心价值观到底表达什么？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了中国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中国为何必须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什么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和国家软实力有什么关系？中国在复杂而充满竞争的国际社会如何立足？社会现实中为何存在价值观“漂移”与“错位”现象？国民的精神和素质怎样跟进？文化强国怎样实施？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到底应向何处去？

所有这一切问题，都和核心价值观建设息息相关。马克思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sup>2</sup>，无论从时代任务还是现实需要看，中国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是“必须的”！

## 一、理论影响力：“软实力”原理充满硬道理

人们说，当今世界人类面临三大“战争”：一是军事战争，二是经济战争，三是文化意识战争。三大“战争”中，文化意识“战争”因其越来越具有超越于军事战争和经济“战争”的能量而备受各国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9页。

重视。军事竞争和经济竞争的胜负输赢,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而文化意识竞争即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竞争,则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思想理论、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十八大报告也提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sup>1</sup>。中国道路,和中国所坚持的理论指导及价值取向息息相关,在此意义上,坚持中国发展道路,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从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开始。

## 1. “软实力”理论出于全球国际竞争语境

约瑟夫·奈 1990 年写的《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被称作一部反映美国冷战后政治思潮的专著。他在书中批评了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所代表的一种美国“衰弱论”观点,认为“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不仅在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力量方面拥有优势,而且在文化、价值观念、国民凝聚力等软力量方面更是苏联、中国、日本、欧洲所无法相比的”<sup>2</sup>。此后他不断发表文章强调“软权力”的重要性,强调在信息时代,知识就是权力,而这一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2000 年他发表文章,进一步对美国的软权力资源作了论述,“美国软权力的一个资源是其价值观念,在某种程度上美国被认为是自由、人权和民主的灯塔,而其他国家则纷纷效仿;软权力的另一个资源是文化输出、电影、电视节目、艺术和学术著作以及因特网上的材料;软权力也通过国际组织(例

---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 年。

2 Joseph S.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Basic Books, 1990, New York; 《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何小东译,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 年,第 1 页。

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约或美洲人权委员会等）发挥作用，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他国家形成多样化的与美国利益相包容的选择，这些国际组织巩固美国的软权力。”<sup>1</sup> 约瑟夫·奈明确强调：“美国应利用自己庞大的软力量工具，把观念、意识形态、文化、经济模式和社会政治制度投射出去。”<sup>2</sup>

约瑟夫·奈提出的软权力实指一国文化和价值观通过吸引力达到期望结果的那种思想影响力。他认为在影响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有些因素是硬性或显在的，如国家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资源基础、人口规模等，有些因素是软性或潜在的，如政治体制、社会意识形态、共同价值观、历史文化、科技发展水平、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社会的凝聚力与国际影响力等。就国家社会一般发展而言，硬实力、软实力都不可或缺，但在一定意义上，软实力具有更加积极的、灵魂的作用。在《软实力的挑战》以及《为何再不能单纯依赖军事力量》等文章中，他一再强调“软权力”对于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性：它是“一个国家构筑一种情势的能力，借助于这种情势，这个国家使其他国家以与其倾向和利益相一致的方式来发展本国的倾向，界定本国的利益”。软实力概念一经提出，很快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认同，并逐渐成为人们评价世界各国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准，以及应对国际局势的新的思路依据。

在军事和经济上一向以强势示人的美国，尤其在小布什入主白宫后，采用的国际事务政策较多强调了美国的“硬实力”，走了“单边主义”的强硬外交路线。小布什政府由于在国际复杂局势中再三遇阻，尤其面临伊拉克、阿富汗等进退两难的局面，也开始反省自

1 Joseph S. Nye: *The Power We Must Not Squander*, New York Times, Jan.3, 2000.

2 见范士明：《CNN 现象与美国外交》，美国研究，1999 年第二期。

己“单纯依赖军事力量”的国际“战争”思路。国际问题专家基辛格 2007 年就曾发出忠告：“国际系统正处于一个我们几百年来没有见到过的变化时期”，在多元而复杂的世界格局中，美国处理国家利益和国际事务方面一定要慎重再三，要更多采取与其他国家商谈的方式而不是单边使用军事武力。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在出访法国时也曾这样说：“我广泛使用‘实力’这个词。比军事实力甚至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实力、同情实力和希望实力。”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注重软实力或者说软硬兼施的思路运作，在军事、经济实力运用基础上，也着力在全世界推行它们的价值理念，用文化、互联网技术、基金等多维途径实施它们的影响力。

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中，如果说一个国家拥有的“硬实力”是威慑或迫使其他国家就范的外在工具的话，那么“软实力”就是一种吸引他国成为自己同盟军的思想文化的影响能力。要有效维护主权国家实力，仅靠经济和军事力量很不够，必须要有政治、文化思想、文化价值观等软性力量。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留给世界的启示之一就是：在二者进行军事、经济实力之战的同时，还进行着制度模式、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软实力的较量。事实上，正如学者们所看到的，真正压垮苏联的那根“稻草”，不是军事武力，也不是科技与经济实力，而是意识形态及其价值观文化的“新思维”变化。

当今国际竞争可归结为以硬实力为基础，以软实力为主导，硬实力与软实力共同作用，软实力地位愈加突出的格局，提升国家软实力由此也成了当代中国的重要发展战略。胡锦涛同志指出：“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

实课题。”<sup>1</sup>在《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一书中，作者表达了学者们的共识，“在全球化时代，要有效维护国家主权，主权国家实力，仅仅依靠经济和军事力量不够，还必须要有政治、文化和道义力量。”<sup>2</sup>

总之，国家软实力打造已成世界竞争力的“硬道理”！而软实力中的核心问题就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及其文化的建构和实践。中国要想在世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格外重视国家思想理论和价值观等软实力的打造，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重视中国理论的建构、文化氛围的营造，以及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社会化。

## 2. 第三种“战争”：文化意识和“文化统治”在竞争

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今天的价值观及其意识形态的竞争力已经和政治、经济、军事竞争力一同，成为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组织部分。文化意识竞争甚至被人们喻为和军事战争、经济“战争”相同或更凸显的第三种“战争”。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则将文化和帝国主义实践直接联系了起来。他明确指出：在帝国扩张的过程中，文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角色<sup>3</sup>。

中国理论、价值观及其文化，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一样，既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种种机遇，也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挑战，特别是来自文化安全方面的挑战。国际文化竞争首先表现为文化产

1 胡锦涛《人民日报》2006年11月11日。

2 俞可平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3 [美]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主义》，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0页。

业和文化市场的竞争。但作为国际竞合的一部分，文化竞争历来包含着价值观和思想意识的较量。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此强调：“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

“冷战”结束后，萨缪尔·亨廷顿等一些政治学者和政界人物开始研究新格局下的新问题，亨廷顿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该理论论点有三：一是提出“冷战”后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将会占据国际政治问题的中心；二是指明和西方文明产生冲突的是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三是警示美国等西方国家，要想保证西方文明的秩序和发展，就必须警惕其他文明的崛起。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对美国甚至全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克林顿主义”“新干涉主义”作为美国对“冷战”后国际形势变化的“政策反应”和“未来规划”，其核心是强调美国作为“冷战”后的唯一超级大国，“必须担负起领导全世界的责任”，“在全世界推进美国的价值观和促进美国的利益”<sup>1</sup>，在其中就有“文明冲突论”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明确内涵。

“软实力”理论在美国近年的国际事务和外交路线中，变成了“巧实力”思路。“巧实力”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苏珊尼·诺瑟 2004 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2007 年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约瑟夫联手发表了《巧实力战略》研究报告，针对美国以往片面强调硬实力的强硬单边主义战略，提出运用“巧实力”帮助美国摆脱硬实力不足的困境，进行“全球领导地位”方式的战略转型。2009 年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希拉里又一次表明美国政府要运用“巧实力”的主张，强调应通过各种手段开

---

1 丁胜：《新克林顿主义评析》，现代国际关系，1999 年第 8 期。

展国际事务，运用“巧实力”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一切都表明，思想理论实力或文化意识的影响力已在国际竞争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邓小平早就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sup>1</sup>事实上苏联的解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意识形态的改变是一个重要原因。日本学者堺屋太一在他的《历史的波澜》一书中提出：“任何政权，只有两种情况会使它发生毁灭性的大变革，那就是丧失治安的能力和人们不再信任支撑它的文化”，他认为“使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走向崩溃的其实是”变化了的“社会主义文化”<sup>2</sup>。

尼克松在其著作《超越和平》中曾预言中国也将像苏联和东欧一样演变为资本主义，他说：“从长远来说，中国将成为那些已经在东欧、苏联和不发达国家把共产党政权扫下台的巨大变革的一部分。如果它继续同这场新的自由事业保持接触，它就不可能抱着已经失败的共产主义革命不放。由于有了信息革命，各种思想将越过长城上空进入中国，用不着穿过城墙或者在墙根下挖地道——而且没有意识形态上的战略防御计划会把它们击落”。“将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的”。

近些年许多人在使用“文化安全”概念，事实上对文化安全进行关注首先是从美国人开始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引起了全世界对文化安全问题的关注，“冷战”结束后的状况也使西方国家普遍认识到，国家安全问题已由传统的军事领域扩展到经济、文化、生态等领域。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4页。

2 [日]堺屋太一：《历史的波澜》，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布热津斯基是美国前总统的安全顾问，一位国家安全顾问超越军事和经济领域，开始关注和考虑如何布局“文化”棋子，确实因为当今世界文化已成国家安全问题中的重要元素，这一点在美国“9·11”事件之后更成为西方世界的共识。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棋局》中提出了“文化统治”概念，他说：“当前，美国前所未有的全球霸权没有对手”，“虽然大大得益于它的民主原则和机制的吸引力，美国的全球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对依附它的外国精英们行使间接的影响。由于美国主宰全球通信、大众娱乐和大众文化的巨大但又无形的影响，也由于美国技术优势和全球的军事作用的潜在的有形影响，以上这一切都得到了加强。文化统治是美国全球性力量的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方面。不管你对美国大众文化的美学价值有什么看法，美国大众文化具有一种磁铁般的吸引力，尤其是对全世界的青年。它的吸引力可能来自它宣扬的生活方式的享乐主义的特性，但是它在全球的吸引力却是不可否认的。美国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大约占世界市场的3/4。美国的通俗音乐居于同样的统治地位。同时，美国的时尚、饮食习惯甚至穿着，也越来越多地在全世界被模仿。因特网用的语言是英语，全球电脑的绝大部分敲击动作出自美国，影响着全球会话的内容。最后，美国已经成为那些寻求高等级教育的人的圣地，有近五十万的外国学生涌向美国，其中很多最有能力的学生永不再回故国。在世界各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内阁中都能找到美国大学的毕业生。”<sup>1</sup>

在美国的全球“大棋局”布局中，美国的文化战略正通过电影、电视、音乐、语言、互联网、教育以及生活方式的影响而全面展开。

---

1 [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38页。



在这个关注“文化统治”和价值观的国际竞争时代，在世界多元价值体系和世界意识形态复杂格局中，中国应怎样关注自我的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安全问题中文化安全具有怎样的地位？中国应走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道路？坚持什么样的理论和价值观？对这一切，我们都必须有清醒的目的和自觉意识。而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建设，最重要的就是思想理论建设和价值观建设，它是软实力中的脊梁或灵魂，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有什么样的核心价值及其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发展道路。在国际多元价值意识竞争背景下，我们更要强化对“中国理论”和中国特色价值体系建设的“自觉”和“自信”，注重构建中国理论及其文化的软实力。

中国社会主义在探索、在成长，中国理论及其价值观也越来越在“中国模式”中彰显其存在的理由和魅力，并在世界多极发展中产生积极的影响。正如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约瑟夫·奈曾评价的那样：“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的特殊发展模式包括特殊的民主方式也被一些发达国家称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民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sup>1</sup>

### 3. 话语权：现在世界上究竟“谁在说”

美国当代著名批评理论家、后殖民批评理论代表人物赛义德（Edward Said）说：“文化是一个舞台，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势力彼此交锋。”<sup>2</sup>我们要发展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 吴江：《“中国模式”面临生死考验 不可自夸“盛世”》，北京日报，2009年2月9日。

2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London, 1994. 参见韩少波等译《赛义德自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文化。中国文化有自己的价值观，有中国历史积累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有自己坚信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念及其理论。中国文化建设必须有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不能简单用西方的普世价值文化来代替，建设这样一种文化，“谁在说”的问题很重要。文化是有属性的，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中探讨了“资本主义文化”，指出“资本主义文化的确有使世界同质化的倾向，而文化的同步化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现代性的特征’。但资本主义是一个‘经济—文化’二元复合体系，其经济基石是财产制度与商品生产，其文化的要素则是一种无孔不入、商品化了的交换关系。”<sup>1</sup> 资本主义文化中那些全球“同质化”的东西，如环境理念、医疗保健、艺术文化、民主平等、诚信的道德观念等，都是人类共同价值财富，中国文化也可吸收共享。但汤林森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那些东西，我们就不能照单全收了。

“文化帝国主义”是否存在？认识这一点也是文化自觉意识的要求。在《哈珀现代思想辞典》（1977年版）中，“文化帝国主义”被界定为“运用政治和经济力量，在牺牲当地文化的同时宣扬并传播外来文化的价值和习俗”。1982年，法国文化部部长雅克·朗把文化帝国主义界定为“不再夺取领土……但却改变意识、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帝国主义”<sup>2</sup>。美国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在研究美国传教历史时也用了“文化帝国主义”（Theories of Imperialism）概念，并指出传教士在传播中没有使用经济或政治方面的权利，但是他们的传教行为反映出美国文化对其他民族的思想 and 文化的有目的的侵入<sup>3</sup>。

1 [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郭英健校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2 转引自王晓德：《美国“文化帝国主义”与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研究，2008年第1期。

3 同上。

约瑟夫·奈在“软实力”理论阐述中，专门发表了《美国的信息优势》《信息时代的力量与相互依存》《信息时代的国家利益》《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等文，对信息时代美国应当运用的“软实力”和“巧实力”做了具体的政策建议，并强调软实力资源“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践这些价值观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sup>1</sup>。所以，“谁在说”的问题，对走什么样的道路，怎样发展本国文化和价值观十分相关。

目前在国际文化竞争中，中国在话语权上并不占优势。由于历史以及技术因素，全球新闻话语权的75%是掌握在美国等西方大国手中；我国和西方在文化产品“贸易”上存在着逆差，仅美国电影就占世界电影市场的60%。发达国家借强大政治、经济优势和传媒技术优势，对发展中国家文化积极进行“软实力”的影响。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在宣传上花1美元，其效能等于国防上花5美元”<sup>2</sup>。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一个自由电台的威力，等于20个师<sup>3</sup>。尼克松在其《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说：“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意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艾伦·杜勒斯曾说，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美国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都能够教会他们按照美国所需要他们所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sup>4</sup>。

美国学者彼得·伍德曼在研究美国在拉美国家的文化战略后说：“文化帝国主义控制和西化了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心理，使他们与

1 [美]约瑟夫·奈：《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2 <http://lib.hnswdx.gov.cn/164/list.asp?id=290>。

3 赵小娜：《论文化在综合国力中的重要作用》，新长征，2004年第12期。

4 转引自史方倩：《实施全方位文化安全战略》，人民网，2008年8月1日。

美国帝国主义利益保持一致。文化帝国主义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作用，原因在于它从内部控制了人民，装扮成为了他们的自由意志。文化帝国主义作用是控制第三世界居民的精神，形成政治上顺从的民众，在人民中间唤起消费主义的愿望，致使能为西方的商品培育丰富的市场。文化帝国主义的目标强烈地针对年轻人，因为他是理想的观众，社会敏感度高，易于适应变革。”<sup>1</sup> 美国学者自己也认为：“美国的文化，不论是粗俗的还是高雅的，都强烈地向外散射，类似于罗马帝国时代，但表现出一种新奇的扭曲。罗马和苏俄的文化影响仅限于它们的军事疆域，而美国的软实力统治了一个太阳永远不落的帝国。”

事实上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是包括电影、电视、音乐、书籍、娱乐和电脑等在内的文化产品。据统计，美国生产全世界 75% 的电视节目、60% 以上的广播节目；发展中国家 75% 以上的文化产品来自美国，而美国市场上外来文化产品只占 1%~2%<sup>2</sup>。“全球 90% 的网络业务在美国发起、终结或通过。互联网上访问量最大的 100 个站点，其中有 94 个在美国；全球互联网管理中所有的重大决定仍由美国主导作出；13 台世界顶级域名服务器就有 10 台在美国。”<sup>3</sup> 而互联网上 90% 以上的内容是以英语来表达的。“英语训练将是美国软权力投射政策的重心，这是很符合逻辑的。（他国）允许或限制英语语言训练对美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简而言之，英语语言训练等同于软权力。”

随着改革与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浪潮也带来了文化的全球化进程，西方文化的好莱坞大片、迪斯尼形象、可口可乐广告，随着

1 转引自王晓德：《美国“文化帝国主义”与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研究，2008年第1期。

2 郭继文：《文化软实力的历史观阐释》，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

3 车跃朋：《信息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东北亚论坛，2001年第4期。

电视和互联网进入中国的千家万户，也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吃快餐，喝可乐，看大片，过洋节。与此同时，西方的各种思潮理论也进入中国理论界和各种头脑风暴中，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观念也随之涌入，其中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但不论是“A面”还是“B面”，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各种影响是不争的事实。

“谁在说”等话语权问题也引起世界组织的注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早在1992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就已把文化安全列为人类社会应该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力。但现在不仅仅是国家、民族自我的文化权利问题，还成了国际竞争的重要部分了。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提高国家的整体安全感，有效维护和推动国家稳定发展，已必须和打造文化安全紧密联系起来思考了。事实上许多国家都为文化安全问题采取了诸多国家政策。法国为了防止他国文化侵入，保护国内文化市场，较早就制定了《古迹保护法》《建筑法》《著作法》等，提出了“文化例外”原则，反对将文化产品列入关贸总协定的自由贸易范围，反对文化市场的贸易自由化。“从1959年起，法国开始制定‘关于在国外扩张和恢复法国文化活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9—1963），后来又陆续制定了‘二五’、‘三五’计划等。”<sup>1</sup> 韩国提出了“文化立国”的国家发展方针。文化立国的思路也应成为中国今天发展思路中应有的理念。

#### 4. 价值文化软实力与社会整合

社会整合 (social integration) 是社会学功能结构学派使用的一个核心概念，旨在表达社会中各因素和各部分系统化为一个有机整

---

1 参见龚铁鹰：《软权力的系统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5—157页。

体的过程和结果。社会学功能学派大师T. 帕森斯把社会视作一个“系统”，系统概念是帕森斯社会功能理论的核心概念。社会运行系统涵盖四个子系统，即文化系统、社会系统、人格系统以及行为机体系统。由此帕森斯明确提出了他的“AGIL”社会整合理论。在这个社会系统理论分析框架中：A（adaptation）指适应，即社会系统适应外部环境的功能；G（goal attainment）指达标，即社会系统谋求实现自身目标的能力；I（integration）指整合，即社会系统协同内部各种关系的功能；L（latercy pattern maintenance）指维护能力，即社会系统维持自身独特发展模式的功能<sup>1</sup>。

帕森斯指出，一个社会只有拥有上述四个基本功能，才能维持其秩序和稳定。这个社会必须具有自己的明确的社会发展目标，能随时世变化与时俱进地不断改革和发展，能将社会多样元素和不同部分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能调控社会张力、维持社会秩序和模式。在这四个基本功能中，帕森斯尤其强调社会整合功能。在一定意义上，社会整合就是结构功能主义表示社会核心功能的一个特有概念。

而在社会整合理论中，帕森斯理论又特别推崇价值和文化的整合功能。社会整合实际上是通过多种维度和方式实现的，如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的整合，社会功能机制的整合，再有就是社会文化、价值规范的整合。“文化系统”在功能结构理论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其理论在“社会运行系统”中，第一层次放置的就是“文化系统”，而我们许多人的思维语序，通常习惯以政治、经济、文化，或制度、文化的序列表达。文化包含的内容很多，有价值理念、理想信念、社会法律、道德规范、宗教信仰、科学技术、文学艺术

1 参见T. 帕森斯和E. A. 希尔斯：《关于行为一般理论》，纽约，1951年，第58—60页、第80—84页。参见“帕森斯的理论体系”。<http://hi.baidu.com/%BC%BA%B0%D9%D6%AE/blog/item/25c41739ced8cec8d462251a.html>。

以及相关表意符号等。其中价值模式最为核心，它定位着文化系统的性质，为社会制度、规则秩序的合法化提供最直接的论证。

帕森斯清楚意识到社会整合与该社会的“共意”或“一致性”有多重要，因此他特别强调社会“共意”即共同价值观存在的必要。他认为正是社会成员认同且受其影响的共同价值观，能产生一种强有力的凝聚力将社会成员整合在一起。他在《社会体系和行动理论的演进》中强调，一个社会要达到整合的目的，必须具备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是有足够的社会成员作为社会行动者受到适当的鼓励并按其角色体系而行动；二是使社会行动和规范控制在基本秩序之内，避免形成离异或冲突的文化模式。在这两个条件中，我们看到了几个关键词，即社会秩序、公民素质、共同价值观。

在强调“软实力”主打词的当今时代，在强调核心价值观的思维语境中，我们恐怕也得学会文化价值观的“思维前置”，并习惯把表达价值理念的“文化系统”放置在“社会功能系统”的第一位。

社会学功能学派强调社会共同价值观存在的意义，同时强调能否通过“内化”使社会成员共享这些价值观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能力。这种理论认为“社会化”是调控社会秩序和保证社会整合凝聚的一个原则性环节，“一套共同的价值模式与成员人格的内化的需要——性格结构的整合是社会系统动力学的核心现象。除了稍纵即逝的互动过程外，任何社会系统的稳定取决于这类的整合的程度，这一点可以说是社会学基本的动力学原则。”<sup>1</sup>

一个社会系统组织着社会运转，也调控着个人或群体进行社会

---

1 参见：帕森斯《社会体系》，纽约，1951年，第42页。

互动，而社会成员同心同德的凝聚力，他们的行动目标或动力方向，都和他们拥有的价值观相关。许多思想家有关于“行动理论”的思考，对人们作出意识行为的过程进行考察和探讨。我们只有在社会行动理论中引进价值观念影响因子，才能更清楚地解释社会人群或个体行动目标的一致或差异。帕森斯说，如果过多的社会成员拒绝社会共同价值观，社会离心离德严重，社会稳定就将会崩溃。这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sup>1</sup> 纵观社会发展过程，德国在近代的革命和发展，以及今日在欧洲甚至世界所居的经济大国地位，与 18 世纪后德国完成的哲学思辨和文化革命息息相关，而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观念中，当年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政治实践是对自由的辩证历险，它对抽象的绝对自由的追求导致了大革命中的暴力与恐怖。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专门讨论了法国大革命中的“绝对自由和恐怖”<sup>2</sup>。此外，许多学者都在说，苏联解体的原因也许是多维的，但根本原因之一是人们对社会主义发展失去了价值信念的支持，在理论和文化层面发生了“新思维”的转变。

上述这些告诉我们，文化系统，尤其是社会共同价值观，在社会整合中十分重要。也正因为如此，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539 页。

2 [德] 亚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年，第 6 页。



帜之下。”<sup>1</sup>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共同价值观？应当怎样建构核心价值体系并使之大众化？都是我们不仅要思考且必须行动起来全力解决的问题。

## 二、现实价值观的“漂移”与“错位”

我们能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发展至今，社会价值文化建设始终被放在重要的位置，国家一直在力主走“两手抓”“四个文明”“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思路，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诸多成绩。从当代道德热点问题引发的社会讨论看，公众对道德问题的基本判断和价值诉求主流也是健康的，但社会上也的确存在不同程度的道德失范和价值错位问题。如十八大报告指出，一些领域存在诚信缺失，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奢侈浪费现象严重。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某些“社会病”症结何在？如何根治？这都是我们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重要问题。

### 1. 全景扫描：社会道德状况显露价值观生态

放眼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用一句话难以概括的社会。这是一个彰显“大爱”的社会：近些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无论哪件事，都见证、彰显了中国民众具有并在成长的道德精神。比如，与“汶川地震”“动车事故”大灾大悲同在的，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互助精神，是大国、大爱和大写的人！与北京奥运的成功一起写入历史的，是中国人的爱国情结和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我参与、

---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

我奉献、我快乐”的道德精神！

当然这也是一个发生了某些无德现象的社会，食品、药品、交通安全等人命关天的问题，以及“道德冷漠”“道德血液”词语，已成为全社会上下热议的话题和坊间“关键词”。我们看到了身边那么多令我们感动的道德楷模和好人，但也看到了种种无良行为和事件。

“小悦悦”事件中的“冷漠路人”有，但“最美教师”“最美妈妈”“最美女孩”“最美交警”也不少见；社会道德现象中出现了许多假冒伪劣甚至一些极端无良事件，但慈善组织、民间救援组织、志愿者行动也呈现出雨后春笋般的生长，助人为乐者及道德激情也在生长。许多人在痛斥或忧虑缺德人和缺德现象，也有许多人主张，现在存在一些道德问题，但还要看到社会道德、社会文明的成长和发展，事实上大多数人还是在说“世上还是好人多”；学者们也主张不要在“滑坡论”“爬坡论”上争论不休，这种争论本身也有不科学之处——社会道德状况评估要量化，对道德冷漠、缺德现象、慈善情况、公民素质、志愿精神、城市文明等，要用道德综合指数来具体分析说明。

但社会道德风气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必须充分估计到，道德问题背后的症结所在要充分解析把握，在问题意识引导下解决那些影响道德发展的深层问题。

据媒体报道，在“2011 最受关注 10 大焦点民生问题”调查中，“社会道德风气”位列第七，首次进入国人最关注的问题前十<sup>1</sup>。近年来相继发生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等食品安全事件，以及“道

---

1 见求是杂志旗下《小康》杂志与清华大学联合发布《2011 最受关注 10 大焦点民生问题》，<http://www.sx.chinanews.com/news/2011/1204/54551.html>。

德冷漠”“权力腐败”“潜规则”“楼脆脆”“桥垮垮”“路塌塌”“彭宇案”等各种热词，在显示无德行为和缺德事件在社会许多领域频频出现的同时，也在不断刺激和考验着人们的良知底线。而“小悦悦”的遭遇更使全社会上下受到震动，有良知的人们被刺痛的同时，也有一种自己“受伤”的感觉。全社会都在关注、追问并彻底思考着道德风气问题。人们发现社会现实生活中，道德失信带来的损害和成本就在自己身边，善恶不辨、荣辱错位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一些人奉献进取与索取享受观念模糊，另一些人勤俭与奢侈观念错位，审美和“审丑”同时上演，劣币时不时在驱逐良币。

我们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我们真的“冷漠”和“缺德”吗？是什么使人不敢“扶老人”？是什么让假冒伪劣大行其道？老百姓为何被网络称作“老不信”？社会为何陷入“低信任度”的恶性循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人们物质生活富裕了，幸福感为何反而时不时降低？坊间名言快语说：底线不在，利益动机却遍地可见。

当道德互助、良知、信用、责任等社会道德底线频频失守，个体“自私自利”甚至“缺德”和“人性冷漠”现象频频出现，当“逐利”成了一些人行为选择的价值取向，这个社会一定发“病”！客观地说，社会失信、自私逐利等道德问题和市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秩序缺陷有关，和民众素质尤其是一些无良逐利者有关，和社会管理机制不完善、监管不力有关，和一些管理者的腐败无能有关，当然也和市场经济利益导向价值观及其理论文化有关。

当然，任何时候我们也都应看到，面对无良逐利者和种种缺德事件，众多有识之士、有德之人在痛心忧虑之余，为社会的无德现象和缺德之人进行着“道德救赎”；这些有良知的人永远是中国社

会的“脊梁”，他们的积极行为也给我们和社会提供着积极向善的力量和信心。而在执政党和国家“五位一体”发展布局中的文化强国思路，尤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与自觉，也为我们国家社会，为人们的精神世界，提供着思想文化氛围的“正能量”！

## 2. 精神家园的现代性失落与守望

《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是余秋雨先生多国之旅中的感慨和思考的集结，在书中他探讨了伊斯兰文明、两河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希伯来文明等文明衰落的原因。在中央电视台“文明之旅”的一次节目采访中余秋雨说：我去各国旅行，不完全是看古迹，主要在思考，如像能建造金字塔这样辉煌古迹的民族，到底是怎样衰败的，那些雄伟的古迹还在，但这个国家今天的主要国防力量，是致力于保护外国旅游者不受恐怖袭击，因为今天旅游是他们国家第一项的国民收入，他们请大家来看他们祖先留下的石头。当主持人问：我们有令我们骄傲的辉煌文化，但今天又时常觉得没有文化，为什么？余秋雨说：文化分“道”和“术”，如茶具、旗袍、金字塔等，传留下来容易，这些文化物体是“术”，但关键是文化的“道”如何流传下来。<sup>1</sup>

失落了“道”的文明一定会走向衰落。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有古代中国、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等四大文明发源地，唯有我们中华文明发展延绵不绝，传承至今而未有中断。这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已成为一个引众多学人兴趣并探究其中原委的历史现象。究其根源，最重要的是中华文明不但有文化之“术”即辉煌

---

1 中央电视台“文明之旅”：<http://jishi.cntv.cn/C30810/classpage/video/20110517/100008.shtml>。

的文化形式和器物的积累，还有深厚的文化之“道”的创造和流传。纵看中华文明史，有多少思想家、艺术家、文化大师，构筑了精深博大的中国智慧和精神文化世界。就是这些东方智慧和民族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人类必须有家园，地球就是我们的家园。一个民族也必须有它的家园，不同民族栖息生活的地方及地域国家，就是它的自然家园。但是，无论是人类还是民族还必须拥有它的精神家园。自然家园很重要，缺乏自然地域家园的民族，必将在世界上四处漂泊而最终在历史进程中消亡。然而精神家园对一个民族更是至关重要的，失落精神家园的民族，民族的精神灵魂同样会居无所定漂泊遗落，民族文化会因为没有个性特质而萎缩、衰败，直至销声匿迹，而没有精神灵魂、没有民族文化的民族最终也必将走向衰亡。古罗马帝国盛世之后的衰落，古巴比伦文明的消亡，古埃及文明的衰败，都和其精神文化的衰落相关。

在一次关于中国文化自觉、自信、自强的研讨会上有学者感慨地说，现在的许多文化缺乏骨头，骨头就是“道”，没有道的文化就没有骨头，没有精神就没有“魂”。任何一种文化都凝结着一定的价值理念，它就是文化的灵魂，或曰文化其“神”。守护文化其“神”，就要把握凝结在文化之中的精神本质——价值理念，从而把握文化立场、文化取向和文化选择，这是文化自觉的根本要求<sup>1</sup>。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就是在坚守创建属于中国的文化之“道”和“精神家园”。

“深度意义”解构引领大众走向感性享乐。市场社会中的大众文化，尤其后现代的大众文化中，有一种主张削平“深度模式”、

1 朱贻庭：《守护文化其“神”》，道德与文明，2011年第3期。

消解“历史意识”和“价值感”等思潮。“深度解构”取向，在大众文化创作中还被表达为“平面化”和“距离感消失”原则。后现代大众文化这种“解构”和“开放”的态度，对传统普遍价值的个体化超越，对历史意义和权威话语的破除，对大众主体的零度亲和，诉诸大众感觉并满足他们文化快乐的欣赏需要，这些都是大众文化的优点，但也正是它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大众文化这种对文化审美功能、道德功能和价值导向功能的抑制，对意义深度的消解，走得太远也有问题。事实上一些文化现象把即时当下的快乐感觉作为文化作品评价标准和出发点，使大众文化走上了“娱乐至死”的道路。许多当下影视、网络、数码图像、流行音乐等都以各种娱乐方式，刺激着大众的神经，满足着大众的感官需要。正如伊格尔顿所认为的：“大众文化的技术方式满足人们绝对的享乐主义本质，使力比多的身体受制于经济的要求，所以在这个时代除了有劳动的身体、欲望的身体之外，更多的是一些残缺不全的身体，这就是大众文化中身体的普遍形态。”<sup>1</sup>

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娱乐和感性快乐，娱乐是文化“必须的”功能之一。但如著名美国传播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所指出的：“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sup>2</sup>

问题也不在于要不要大众文化，文化生态本身就应该多姿多样。大众文化具有令人轻松愉悦的魅力一面，在当代中国，出现了许多

---

1 傅守祥：《审美化生存——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想象与哲学批判》，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2页。

2 [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亲和大众的作品，使人们享受到了更多样的、更新式的文化作品，也使各种感性、个性获得了释放，事实上许多作品使大众在“喜闻乐见”的作品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教育，在中国大众的生活娱乐、文化启蒙、提高素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问题在于，如果我们的文化过多以感性娱乐为方式，甚至在商业迎合策动下产生“媚俗”的文化取向，以“解构”深度意义，价值“祛魅”为特性标志，就会使中国文化生态落入缺乏精神和隽永价值的另类不平衡中。事实上现实中的确存在着过多强调感性快乐、解构价值、“去意义”的作品的消极因素问题，爱情不再是梁祝式的至死不渝，而是《天亮说分手》，美好神圣的爱情的表达被一些创作者采用“下半身”的写作方式。中国传统伦理观强调的社会责任、荣耻感、崇高感，在一些文化作品颠覆下不断被消解，许多文化创作不再负有“载道”“言志”的责任，文化不再是人类生存的内在基础，而成为娱乐的游戏，文化应有的精神特性被消解了。

德国著名学者阿多诺说：“失却了审美精神与人文理想制衡的文化是可怕的，文化陷入单边主义和商业实用主义是危险的；这种可怕的背后是非人化与物化，这种危险的内里隐藏着自我的失落和意义的虚无。”<sup>1</sup> 不仅如此，这种即时的感性娱乐文化的蔓延，还易导致人们对传统文化、社会历史、道德责任的淡化，这会使社会进步缺乏可持续的动力。而“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言语，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

1 [德]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362页。

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sup>1</sup>。

“意义感”失却与社会焦虑情绪。事实上当下中国社会中许多领域的文化与现实生活中，或多或少地弥漫着利己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气息，充斥着明显的物欲膨胀和财富取向。中央电视台的一位记者不知疲倦地询问每一个他随机寻找到的被访者——他们的身份从无职业者到城市精英——他们想要什么？大多数答案是“钱”。<sup>2</sup> 许多人不再关心保尔·柯察金是怎样的英雄，不关心他们存在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不再崇尚这类英雄；真善美的符号典型被冷落在日常话语体系中，你如果还执着于雷锋精神等英雄信仰的情怀上，一定是“OUT”了。中国现在在硬币的A面，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经济商业金钱物质的增长之地；而在B面，自利不择手段、物欲膨胀、财富竞炫、道德冷漠的现象也随处可见。“你在大卫·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C. W. 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中的现代性社会病描述中，都可能会看到今天中国社会的某个侧面或影子，看到民粹主义、消费主义、拜物教、身份焦虑、群氓、个人主义”，“更关键的问题是，似乎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sup>3</sup>。

我们会感觉到，人的生活是需要社会归属和意义感的，在物质生活获得基本保障后，人还必须的情感的需求；个体有自我个性的发展，但再个性的人都有社会尊重和归属感需求，有精神信念和人生奋斗的目标方向，人的幸福感就是来自这一切属人的需求满足的意义体验中。人的心灵往往是寄托在精神家园中的，如果仅限于物

1 [美] 乔纳森·H. 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邱泽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

2 见许知远：《醒来》，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十二章“焦虑的社会”。

3 同上。



欲追求，完全生活在自我孤立中，久之会失去生活意义和方向而陷于迷茫、焦虑和无意义感。

如果我们的文化教化给大众的，是纵欲享乐和物质财富地位的追求，是支持把“小我”和“大我”割裂开来的理论，是放弃对国家社会和他人的责任，远离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社会缺“道”呈散沙状态不说，人们也会因为完全生活在“小我”个体中，失去“大我”归属而备感孤独和苦闷。如果我们的文化不能提供理想信念和人生意义，就有人会渐感物质富足而精神空虚，生活意义感丧失，人们的精神世界就会出现危机。这就是坊间为什么有人说：现在社会上“瘦猪哼哼，肥猪也哼哼”，这也是为什么一些人不乏物质财富但仍选择自杀的“无意义”问题所在。

事实上当下中国社会中我们还能感受到，有些人精神空虚引出的社会焦虑感。我们可能感受到的首先有“人际焦虑”，这是一种来自社会关系状态的焦虑。人际关系应有的仁爱或博爱淡漠，人际间缺乏基本的信任感，亲朋关系在物质财产利益面前那样没有权重，“亲们”为利反目，人际关系被冷冰冰的利益关系所替代，社会关系在市场经济中仿佛被市场格式化了，有西方学者说，中国现在的某些方面比西方市场经济还“市场经济”，言外之意即中国人完全金钱利益化了；社会人际关系的现实和人们所期望的目标出现较大差距，人们就会产生紧张不安和担忧。除此之外似乎还存在着“身份焦虑”，社会中的拼爹现象、拼孩子现象、拼房拼车现象，社会地位的攀比；从前人们“爱厂如家”，“有问题找组织”，但市场经济社会发展造就的“后单位时代”，把众多个体抛到市场社会中，个体化后的人们缺乏稳定的组织担保和依赖，前景的、人生的不确定感增加，也引发一种“社会归属焦虑”；还有一种不相信现实中

存在任何超越物质和功利的情感和爱心，寻觅不到永恒价值和人生意义的焦虑，这应该可以归为一种“意义焦虑”。普遍的“社会焦虑”心态和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提高有关，和人生觉醒有关，但更和意义感失却、“精神家园”迷失相关！

十八大强调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盛，社会文明和公民素质的提升，都有赖于文化。而文化的灵魂就是核心价值体系，价值文化不仅为社会发展提供方向和目的动力，也为人提供人生意义感和精神家园。我们必须重视并积极建设中国文化，构建核心价值观，为社会营造一个良性发展的文化生态。

### 3. 当传统文化遭遇现代性和市场经济

我们总在强调中国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中国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一方面焕发出了时代的活力，但同时确也出现了诸多问题。曾经给中国人提供安身立命所在和解读天地万物意义的传统文化，在遭遇现代市场经济变革浪潮后，一些传统价值观开始了某些“漂移”不定，文化生态显得有些发展不平衡，精神家园处于某些失落与守望之间。

一些经由市场和商业制造的文化产品，往往会在变身为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后失落某些深度和永恒的东西。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机制中，文化产品从策划到制造都会进入商业运作的轨道。甚至它的商业性使它在发展策略上要作出迎合大众的态度，很多时候这种商业迎合会导致大众文化的娱乐功能呈现媚俗特点。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对此曾指出：“由于艺术成了迎合低级趣味的拙作，因此便迎

合了具有主导作用的赞助人‘趣味’的混乱。艺术家、美术馆老板、批评家以及读者观众一起沉迷于‘流行的时尚’。这个时代真可谓一个宽松的时代。但这种‘流行的时尚’现实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金钱现实主义；因此在缺少审美标准的情况下，根据其产生的效益来估价艺术作品的价值依然是可行的和有用的。这种现实主义顺应所有的倾向，恰如资本迎合一切‘需要’一样，只要这些倾向和需要拥有购买力。”<sup>1</sup>

和现代商业性结合的大众文化，与生俱来地带有日常消费、娱乐、享乐主义和感性快乐的取向。正如麦克唐纳所言：“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家高兴。”<sup>2</sup> 弗洛伊德对此也从心理分析角度给予了揭示：“想象的王国实在是一个避难所……艺术作品正像梦一样，是无意识的愿望获得一种假想的满足。”<sup>3</sup> 又如阿诺得·豪泽尔所言：“通俗艺术的目的是安抚，使人们从痛苦之中解脱出来而获得自我满足，而不是催人奋进，使人开展批评和自我检讨。”<sup>4</sup> 人们需要大众文化带给自己的“快乐”引导，需要通过感官欲望的满足和游戏化的心理经验，使自己暂时忘却生活中的困苦和忧伤，释放种种压力。

我们不是把精神式微、人性冷漠、信任危机等价值观错位问题简单归为市场经济和商业运作，但经济活动中自发的商业规律作为“看不见的手”，往往使市场社会处于“自在”和商业经济导向状态，必须用社会理性、核心价值意识等“看得见的手”，去修正市场文化的自发功能性局限。有学者指出，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并转型的

1 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2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

3 弗洛伊德：《自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4 阿诺得·豪泽尔：《艺术社会学》，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233页。

发展阶段，高速转弯的同时，如果思想理论、文化价值引导以及民众素质和社会管理等软件因素没有同步发展，社会秩序及其价值观就会出问题。网上民众的呼唤：“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社会发展中“硬件—软件”的这种关系。

事实上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确也存在某些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长久以来，一些领域和地方在市场经济“效率至上”追求引导下，对社会责任和对消费者的责任规导不力，在张扬个性和一己利益时，对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强调不够，在强调权利的时候，对义务和责任以及对权利使用的制约强调不够，以致出现了种种不择手段的自私自利现象。与此同时，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理论大行其道，社会中讲社会奉献、集体主义等道德原则规范反有所冷落。

#### 4. “价值消解”：文化多元与理论交错影响

在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市场本身会自发助长商业文化生长。自发的商业文化又往往易导向消费主义、奢华主义、享乐主义生长，导向金钱关系和利己主义。如果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物质主义等理论文化留有一定市场，如果社会文化价值导向不明确，是非、荣辱、美丑不分，人们的观念心态就会出现道德淡漠甚至缺德的行为取向。所以社会文化建设一定要有正确价值观导向，要有理论分寸的把握。例如，要消费但不能走向消费主义和奢华主义，与消费同行的还应有创造和节俭，消费也有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把握；要娱乐但不能娱乐至死；要物质但不能走向物欲主义；要经济建设但更要有社会精神文化与社会和谐的建设。

反观我们的理论文化建设，成绩显著，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有些理论不确定并储备不足，许多以往理论被“破旧”了但未完成“立新”，比如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一直处在构建过程中；二是理论解释力严重不足，一些创新确立的理论在社会宣传解释和大众化方面还很不够；三是理论文化主旋律和社会文化生态还相对缺乏合力，社会道德培育中所说的“5+2=0”现象，表明的就是主流价值被社会现实环境价值观“消解”的现象。

社会在改革开放发展中，精神文明和国民素质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提高，但整体看国民素质参差不齐、民众价值心态和道德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也是事实。社会舆论一方面是高扬的社会主义主旋律文化，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传统文化、社会荣辱观等所处的文化环境，还缺乏某些共识整合。如在弘扬社会主义道德的同时，质疑、排斥、嘲笑道德的声音也不绝于耳，陈阿婆救小月月，企业家做慈善，郭明义做雷锋传人，都受到一些坊间舆论的质疑甚至嘲笑。事实上对许多慈善、良知行为的无意或恶意的质疑，已成为我们社会舆论中的一股负面声音，再经过一些媒体的聚焦放大，客观上对社会舆论起了不利于道德善良普及的消极作用。许多人不是不愿做好事，但做了好事反被嘲笑或质疑的后果，让他们对选择行为心存疑虑；此外，种种质疑还会影响公众对良知的更多“不信”，引发道德失望和坏事归因的思维逻辑习惯。

如果社会理论多元交错，现实价值观念和舆论杂乱，就会对国家精神文明、价值文化、大众心态和社会风气产生种种“负能量”影响。

在“软实力”集群理论中，许多思想大家都在说，在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有些因素是硬性或显在的，如社会政治制

度和法律体系等正式制度体系；有些因素是软性或潜在的，如社会意识形态、共同价值观、民族文化传统、伦理道德要求等思想文化层面的内容。就对社会治理作用的发挥而言，法律和制度的强制治理和思想意识价值体系的非强制规导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在一定意义上，思想价值体系从共同价值观、精神文化、社会习俗及其道德力量层面产生的非强制性约束，对社会和谐治理，对引导社会成员自觉主动接受社会规则约束，具有更加积极的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 诺斯对此就曾强调，在人类行为的约束体系中，“非正式制度”的文化约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体系中，“正式制度”规则也只是决定行为选择的总体约束中的一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的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规则来约束的。<sup>1</sup> 所以，社会理论及其价值观，社会大众舆论环境，这些文化因素发挥的“正、负能量”，我们须臾不可轻视。

社会和谐发展，必须要有共享的价值理念系统。可以说，在一个价值是非不明、善恶荣辱不辨、缺乏和谐文化价值观生态的社会环境中，是不可能有效建成和谐社会的。

### 三、共同价值观：一种必要的国家力量

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想要秩序，要发展，就都需要建构相应的国家意识形态。阿尔都塞说，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在掌握政权同时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在这套机器中行使领导权的话，那么它

---

1 “如何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光明观察网络杂志》，2005年2月24日。

的政权就不会持久。”<sup>1</sup> 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理念，意识形态理论及其价值观能否武装大众，能否使民众对民族、国家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在“中国模式”中显现，这一切既是时代提出的任务，也是一种国家能力。

## 1. 一个解读国家意识的新视角

我们完全可以把核心价值理念理解为解读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新视角。意识形态（ideology），指一种观念和理论意识的集合。意识形态不是什么需要质疑的概念，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意识形态存在。《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定义说，“意识形态是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中国大百科全书》解释说，意识形态是指“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意识形态就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这些意识形式会以一系列的理论文化方式存在，如哲学、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等，都是社会意识形式或意识形态的内容。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就是价值观，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正如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我们把理论文化体系中那些核心价值观及其理论抽取出来，就形成了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其中那些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核心价值观。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三个“倡导”表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理念。

核心价值理念作为软实力中的重要部分，它对选择国家发展道

1 陈越：《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38页。

路和制度提供合理性理论论证和支撑。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一旦崩溃或失落，整合国家社会的思想文化价值纽带不复存在，那么轻则会使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受到阻滞，重则整个国家、社会和民族就不会兴盛甚至衰亡。

核心价值理念及其意识形态，还为社会人们提供精神家园和生活方向。意识形态中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社会发展道路的旗帜，是“一种特有的思想先导作用，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或社会危机时期，意识形态常常成为社会动员人们向既定的方向和目标前进的一面思想旗帜”<sup>1</sup>。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或核心价值观，有一个引领文化、理论和发展道路的问题。理论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等同于任由各种价值观念杂乱无序地发展。中国要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就要坚守自己的核心价值原则：我们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同时我们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不能丢，这是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本源和文化之根，当然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有一个和时代精神结合发展的问题；再者是必须信守维护法律和道德规范体现的社会基本价值内涵，这是社会法治和德治的基本价值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上述各种维度的价值理念的系統表达。

一个价值多元化的社会，犹如没有规则的交通秩序定会陷于混乱无序。所以，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整合多样化的大众意识和文化取向，如果核心价值观对大众文化起不到应有的主导作用，就谈不上社会“共同价值观”。另一方面，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与尊重价值观的“多样”和“差异”是相辅相成的。它们是

---

1 [美] 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6页。



一种“一元统领”“兼容共生”的关系。意识形态及其文化的建设，从而社会价值的凝聚整合，必须建立在社会上下的“共同价值观”基础上。葛兰西曾将意识形态的凝聚作用比作“水泥”，他说：“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的统一中，意识形态起了团结统一的水泥作用。”<sup>1</sup>核心价值观就在为整合中国社会发挥着重要凝聚力。

法国早期社会学家迪尔克姆（Emile Durkheim）在研究社会整合问题时提出，“社会失范”是引发社会无序、松散、人们迷茫甚至自杀的重要原因。指出在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在传统社会的生活习俗、道德规范、信仰变化瓦解的同时，新的价值观如果还没有完全跟进建立，就会产生令人不安和困惑迷茫的社会阶段。美国社会学家默顿进一步把“社会失范”的含义由“无规范”诠释为“规范冲突”，认为社会价值观结构的不同组成部分间的冲突，以及文化蕴含的价值目标同当下社会的制度环节之间的游离，是造成社会失范的原因。

无论怎样表述，都说明理论意识及其核心价值在整合社会与规范秩序中发挥着重要凝聚力和能量。社会理论及社会价值观如果发生缺位、失范或冲突，就会在变革时代引起社会无序甚至紊乱。如前所述，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中探讨了文化属性问题，文化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文化是有价值属性的。中国理论建构中不仅要张扬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色和优秀传统价值，还要凸显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主张。曾经一度，“价值中立”主张曾在我国学术研究和理论教育中产生了不小影响。价值中立思潮在西方社会曾有过很大影响，但在实践过程中，理论局限使该理论逐步走向衰落。问题主要

---

1 转引自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18页。

表现在：价值共识以及社会凝聚力被瓦解；责任漠视和极端个人主义泛滥；引发了更多的社会价值模糊。无导向的价值教育，使受教育者的价值观出现虚无化、功利化、非理性化等倾向。20 世纪 80 年代末，美国的道德教育对主张价值中立的“价值澄清”理论进行了彻底反思批判，以传导核心价值观的“品格教育复兴运动”逐步兴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就“价值中立”主张也曾指出，“努力逃避价值观念是错误的，并且注定是徒劳的和破坏性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在一起，即使把它打入地下，它仍然指导我们的工作。”<sup>1</sup> 社会政策资深学者蒂特姆斯也指出：“以中立的价值立场讨论社会政策是没有意义的事情。”<sup>2</sup> “价值中立”理论主张价值教育不能简单采取价值灌输的做法，强调在教育方式上给受教育对象一定的思考空间，这是值得吸取的合理部分，但这不意味着要否定价值观教育的必要。所以，社会应对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价值问题做更多思考和辩证，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的价值体系和理论文化。

在变革和社会转型期，如果旧有规范动摇瓦解而新的规范没有及时建构起来，如果缺乏核心价值一元整合，不能多样统一，社会价值观就会出现“空场”或者“冲突”，在引起社会无序的同时，还会使人们失去价值依托而找不到生活方向和意义，精神失落，心态失衡，继而引发人们普遍的无意义感。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目前已位居世界排名第二位，但有人说中国是“经济巨人，道德侏儒”，撒切尔曾说中国不是世界大国，因为它没有向世界输出文化价值观。美国学者查德·加德勒对美国说

---

1 [瑞典] 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谭力文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年，第 13 页。

2 [英] 蒂特姆斯：《社会制裁十讲》，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 年，第 15 页。

“决定美国资本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是意识形态，而不是武装力量。”<sup>1</sup> 这种论断不仅适合美国，也适合中国等一切国家。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发展，使社会经济结构和阶层发生了深刻变迁，全球化背景也使各种理论、文化的交流或碰撞更加活跃，中国社会各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多样变化，涌现出各种理论和思潮。理论的活跃是文化大发展的表征，而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也表现在对多元文化的包容程度上，但包容多元性文化和多样性价值观，不等于说不要社会理论的主导，不要共同价值观原则。一个国家、社会要想有序发展、和谐发展，就必须在多样性价值观和多元性理论文化中，找出其中的“最大公约数”，确立起符合中国实际的主导的理论体系，即构建出核心理论基础和共同价值观。所以，社会转型时代，须要积极构建中国发展所需的新的理论文化体系，并在理论指导、传播和教育中不断凝聚价值共识，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支撑。

## 2. 理论大众化：一种必要的国家能力

一个典故说：父亲在思考明天的演讲，为让五岁儿子不影响自己思考，他将一杂志上的世界地图撕碎给儿子：“你把这张世界地图拼对还原，咱们就开始做游戏。”没过几分钟儿子说图已拼好。父疑去看，果然撕碎的地图完整拼摆在地板上。儿子说“地图背面有一个人头像，人对了，世界就对了。”

人对了，世界就对了。这样的哲理，许多人用其他话语方式也曾表达过，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

---

1 [美] 理查德·加德勒：《在意识形态领域推销美国》，纽约时报杂志，1983年3月20日。

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sup>1</sup>毛泽东说：“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sup>2</sup>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打造国家软实力，凝聚民心，整合社会力量，须从理论意识和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抓起。

事实上许多国家都将国家价值意识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建构社会思想理论支撑，整合社会共同价值观。韩国政府一直坚持将道德课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课程，其内容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完善，但其始终将韩国价值意识教育作为最核心的内容<sup>3</sup>。美国也很注重向国民推行具有美国特色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体系。美国政府通过稳定的主导机制、灵活的组织形式和完善的评估体系等途径，向美国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灌输国家价值意识，进而培养美国公民的国民精神。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说：“美利坚是一个高度注重意识形态的民族。只是作为个人，他们通常不注意他们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们都赞同同样的意识形态，其一致程度令人吃惊。在表达对民主意识形态信仰方面，美国人比世界其他任何民族都更一致。”<sup>4</sup>可见，任何国家都有一整套适应其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教育系统，而国民意识形态教育的核心内容就是进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灌输和教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一元主流价值观对多元价值取向的引领和整合，才能保证国家的共同价值观。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2 见毛泽东：1963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3 [韩]汉城大学道德课教育课程改订研究会：《第七次中小学道德课教育课改订研究》，《1997年教育部咨询报告》，1997年10月，112页。

4 [美]杰里尔·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周启朋、傅耀祖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354页。

“树德莫如兹”<sup>1</sup>喻义润物无声的隐性教育。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有个“如何化”的问题。中国智慧早就说：“树德莫如兹”。曾有学者提出，意识形态教育应该变成“文化意识形态”教育，即“理论武装”不是让百姓都变成理论家，而是让理论“化”在文化中。这一点需要研究一下西方国家在长期的公民教育过程中形成的隐性、渗透的教育方式。隐性教育重视公民教育的广泛性和渗透性，注重在“无意识”的境界中接受教育。此教育方式特点主要是不简单采取灌输教育，而是主张借助于无意识心理学理论，使其在无意识中去感受和体味价值观、道德观、政治观等教育内容，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隐性教育重视公民教育的广泛性和渗透性，注重感化，在“无意识”的境界中接受教育。有媒体理论工作者探讨问题曾举例说，新编《江姐》电视剧受到“80后”等大批观众的好评，许多“80后”观众点评重播，他们接受江姐等革命者形象并受感染，“红色”教育在剧情中隐形实现。

葛兰西认为：在意识形态是为历史所必需的范围内，它们是“心理学的”……实现“文化领导权”的方式是采取“弥漫式的”“毛细血管式的”长期渗透和潜移默化，因此由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构筑的是“一道具有威力的防线”<sup>2</sup>；阿多诺则说，意识形态的功能完全可以“由文化工业——电影院、剧场、画刊、无线电、电视、各种文学形式、畅销书和畅销唱片……加以实现的”<sup>3</sup>。

他国也对公民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这些国家注重借助社会各种文化力量和利用公共资源，营造一种价值观教化的大社会环境，进行一种实践性教育方式。在美国，家庭、学校、社区、教会、政

1 《左传·哀公元年》。

2 葛兰西：《实践哲学》，徐温存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36—64页。

3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19页。

府、传媒等，形成的是一个互相协调和配合的教育合力。但更值得一说的是，一些国家价值观教育很重视通过各种社会实践达成效果。教育不仅在课堂和书本上，也在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如美国等国家，通过组织社会考察、志愿服务、教会议工等方式，使人们相互感染，也受到自我教育。

韩国许多中学都设有志愿者社会服务或实践课程。实践课程是必修课，有课时要求。学生每年有十八小时的社会服务课程，在升学的时候会有考核，但是现在学生越来越自愿参加社会服务，有的学生每年参加志愿者活动达百余小时。

许多国家公民教育方案的具体实施一般都有“公民教育委员会”“社会道德委员会”或类似专职机构，以指导公民教育的方向目标、规范内容、课程体系等，监督、考核与评估公民教育的实施过程和效果。美国“社会研究委员会”对美国公民教育和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推进起重要作用；英国“公民教育协会”（AEC），对公民教育的目标、内容、教育方式等作出明确规定；俄罗斯“国家公民教育中心”具体负责公民思想教育；新加坡的“公民委员会”制定公民教育课程纲要，对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具有重要意义；日本则把全国教育一体化，建立各级政府领导下的学校多元一体的公民教育管理体系，统一管理各行各业的公民教育。文部省、都、道、府、县、市、町、村教育部门以及学校，都设置专人负责管理机构。另外，在澳大利亚、法国、德国、韩国等国家公民教育发展的历程中，都拥有本国的“公民教育委员会”或类似专责机构，以保证本国公民教育方案的顺利实施。

所以，我们在研究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方式中，应注重借鉴并

挖掘他国隐形的渗透式的教育方式。

### 3. 再思考：走什么道路，要怎样的核心价值

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一个大国，但中国不能像有些人所说：是“经济巨人，道德侏儒”，不能被他人评论“不是世界大国，因为你的价值观没有影响世界”。中国面对复杂世界格局中“文明的冲突”或“文化领导权”的竞争，面对种种社会现实问题，必须全面反思，中国要走什么样的道路，要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核心价值！

中国社会处在变革发展中，它需要正确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价值指导，需要有序的而不是紊乱的思想文化价值秩序，需要大众对执政理念的认同和支持，需要中国特色的共同价值观。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每一社会都有其独特的社会精神气质，它因社会的经济方式、政治理念、文化传统而形成，反映社会的价值需要、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涵盖社会的理想信念、精神风貌、道德规范，构成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对经济社会建设、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发挥着引领和主导作用。这是一定的社会系统得以运转，一定的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依托。”<sup>1</sup>

十八大报告特别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可以说，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主体和灵魂。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

1 袁贵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它们从不同侧重点表达了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取向。而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三个“倡导”，“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sup>1</sup>，表达了中国追求的社会目标和最核心的价值观理念。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基础所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实现的。今天在发展社会主义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仍是我们认同和坚持的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信念所在，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动力源泉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有关，“中国特色”不仅是指当代中国的国情特色，同时也是指中国文化的社会历史环境。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都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精神价值和内在精神力量。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基础所在。它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道德理念，并从社会基本道德认同和是非善恶荣辱共识角度提出建设任务。

国际关系历史和现实都反复证明，文化冲突或意识形态竞争“就在那里”，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本质上就是各自代表的核心价值体系的竞争。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和激烈，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巧实力”，已被各国共识并争相纳入本国国际战略大思路中。中国特色的价值观文化

---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



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此凸显，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要求如此紧迫，中国各界的我们，怎能对此还毫无感觉？怎能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巧实力”利用的负面力量？怎能不积极参与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任务中来，担当一分责任，发挥一分“正能量”！

中国道路需要主导理论和价值文化。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重要时期，社会从单质化向多质化或异质化转型，从简单化向复杂化发展，各种思想文化在激荡，人们思想的独立性、多元性、差异性显著增强。中国秩序整合，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社会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都离不开来自共同价值观的维系和支撑。改革过程中我们原有的传统观念被打破，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发育成熟需要一个过程，这种状况容易在社会某些领域和群体中，造成一定程度的价值观念的失序或紊乱。但中国不能允许社会价值观领域长期“空场”，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必须加快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步伐。社会要明确定义我们这个时代应有的善恶美丑价值理念，确立社会评判是非的标准和界限，这对于在全社会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提升全民思想文化与道德素质、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具有重要意义。在一个缺乏共同价值理念和共同理想信念的社会环境中，是不可能有效建设文明而和谐的社会。因此，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把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任务的提出，是全党全国在时代发展新阶段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理论及其制度建设的更加自觉、自信的把握，也是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核心任务

和基础工程。在今天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发展部署思路中，经济发展速度等硬实力和思想文化等软实力、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社会政治秩序、理论文化建构、文化生态和共同价值观、公民素质与国家精神，等等，一个都不能少！因为这一切，作为与硬实力同等重要的软实力构成要件，都是一种必要而又独特的国家能力！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

此时此刻，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经过九十多年艰苦奋斗，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我们对党和人民创造的历史伟业倍加自豪，对党和人民确立的理想信念倍加坚定，对党肩负的历史责任倍加清醒。

——摘自十八大报告

---

世界与中国人民一道，见证了 2002 年到 2012 年中国走过的不平凡的十年。著名国际投资战略家库恩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十年是中国发展、壮大、转型的关键时期，历史将会记住这一时期取得的成就。”这十年，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理论创新的强大能力，同时，也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强大生命力<sup>1</sup>。十八大的召开，是这十年的总结，也是新航程的开启。

——摘自本书

---

1 罗伊斯特：《中国十年发展启示录：以人为本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瞭望，2011 年 11 月 7 日。

在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五位一体”<sup>1</sup>中国发展道路总布局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将肩负起“中国理论”的独特使命，它“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sup>2</sup>。这一理论体系饱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强、仁爱、群体取向的价值内涵，也张扬着中国向现代跨越的创新精神与开放气度，还开放包容着人类最优秀的文化智慧，面向着世界和未来。

在这个理论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处于思想指导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关注世界范围的社会公正与人的平等问题，但和以往思想家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满足于解释世界，其视域永远是现实的改造和建设。它关注剥削制度的现实消除和平等社会的现实建立。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近代中国才得以化解民族危机，建立起人民的共和国，并在新时代开启中华民族崭新的伟大航程。

## 一、改变中国命运的一种“主义”

1840年前后，清政府国门开始洞开，依托于农业文明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尊在此时受到了强烈冲击，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对峙和冲突，也以鸦片贸易为导火索全面爆发。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并

1 从十六大的“三位一体”，到十八大的“五位一体”，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境界——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全面和谐发展的图景。

2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

存的中国，如何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传统，走向民族、民主革命，这是中国近代史的最大追问。仁人志士们目睹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寻找着中西对峙与冲突中中国失败的根本症结。

应运而生的“洋务派”与“立宪派”，给出了中国落后病症的不同诊断。洋务派掀起了洋务运动的风潮，他们认定科学技术落后是造成中国落后的根源；而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则直指中国传统封建王朝的制度体系。20 世纪前后，一种新的“主义”传入中国。1899 年上海《万国公报》刊载节译的英国社会学家颉德的《大同学》，将马克思的名字和《共产党宣言》介绍到中国<sup>1</sup>。1902 年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也将马克思介绍给国人。俄国“十月革命”后，更有许多留日、留法初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翻译介绍到中国。历经中国“五四”运动的洗礼，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李大钊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相对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中国人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

历经艰辛探索之后，马克思主义因其公正平等社会建立的理论，因“十月革命”的实践成果，吸引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目光，成为中国人改变固有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理论武器。在马克思主义平等、自由和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引下，人民的共和国在 1949 年建立起来。

---

1 该号刊载了由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 年 10 月 10 日—1919 年 4 月 17 日，英国传教士。他生于威尔士的农村，属于大英浸信会。这一教会在中国先后开辟了三个传教区：山东、山西、陕西。）与中国教士蔡尔康译作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在其中，提到了“马克思”、“安民新学”（即“社会主义”，socialism），并摘录了《共产党宣言》的一段文字。参见：蔡尔康：《大同学》，万国公报，1899 年第 121 期，第 13 页。

回顾历史，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展望未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发展的旗帜与灵魂，一定会不断发展，并影响未来中国的发展。

## 1. 谁是“千年思想家”

启蒙运动的伟大人物伏尔泰说：“了解前人是如何想的，比了解他们是如何做的更有益。”<sup>1</sup>千百年来，人类的征程总需要先进的思想为其领航。生活在 20 世纪的人们开始回顾总结：谁在过去的千年中对人类文明贡献最大？是 17 世纪用“万有引力定律”给人类引来一片理性世界的科学家牛顿？是用“进化论”开辟出不同于唯心主义和神学创世论的达尔文？是在 20 世纪初颠覆了人类对于宇宙和自然常识性认识的爱因斯坦？还是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马克思？

1977 年，《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发表了主流经济学家约翰·卡西迪（John Cassidy）一篇不寻常的文章。该文认为，冲击世界的“下一个伟大思想家”非卡尔·马克思莫属<sup>2</sup>。1999 年，英国剑桥大学发起了评选“千年第一思想家”的投票活动，结果马克思居于榜首，爱因斯坦和牛顿分列二、三位。2005 年 7 月，英国广播公司又以古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为题，调查了 3 万名听众，结果仍是马克思在最后入选的二十强中荣登榜首，居第二位的哲学家休谟得票远落其后。

马克思被世界公认为是影响世界的千年思想家，有其必然性。

“在 21 世纪，人们仍然需要阅读马克思，不但把他作为一种过去的

1 参见：[美]罗兰·N. 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赵国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3 页。

2 John Cassidy: ‘*The Next Big Thinker*’, Independent on Sunday, 7 December, 1997.

运动，也把他作为一个现代的作者。”<sup>1</sup>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不仅在于其思想的科学性与内在思辨的独特魅力，不仅在于其对于现实社会深刻的洞察和批判，更在于其实践性。“很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包含了真理的精髓，这个精髓具有普遍适用性，已经超越了马克思本人生活和研究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sup>2</sup> 在影响世界的千年思想家中，马克思是唯一对现实社会产生了卓越解构、结构与建构的思想家，他的思想魅力在于为人类的平等与自由开启了现实的解放之路。

放眼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发展之中，17 世纪的牛顿为工业革命创造了一把科学的钥匙，18 世纪的瓦特拿着这把钥匙开启了工业化的大门，资产阶级革命为商品经济的推进缔造了私有制秩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用“看不见的手”，使“自由竞争”遍地通行。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资本积累的本质与人的生存尊严产生着尖锐对立。在现实中，灰暗的房屋和高耸的烟囱取代了迷人的城乡风景，赤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商品交易取代了宗法的田园诗般的亲近与依赖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已被异化，工人们辛苦劳作，生产出的财富越多，他们就越穷困。劳动为富人生产宫殿，为工人生产棚舍，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富有和商品利润，但为工人生产出了赤贫和疾病。

马克思没有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随资产阶级一同为胜利干杯，他带动了一场经济学革命。他洞察社会不公平的秘密，《资本论》因此就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他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他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

1 Balibar: *The Philosophy of Marx*, London: Verso, 1995, p1.

2 [南非]达利尔·格雷泽, [英]戴维·M.沃克尔:《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导论》, 王立胜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第 232 页。



学原理，使实践也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与此同时，马克思赋予了无产阶级拯救不平世界的历史角色，劳动者被看作现代社会发展的中心。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展望：“代替了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联合体”，“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失去的仅仅是锁链”<sup>1</sup>。《共产党宣言》因对资本主义即将发生的全面危机的预言而引人注目。这将为无产阶级领导所有被压迫阶级走向彻底的民主社会创造前提条件<sup>2</sup>。马克思用一个伟大思想家的智慧与远见，带动了哲学、经济、政治各方面的革命，让全世界的人们重新审视世界，并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实践，为全世界的劳动人民获得平等解放，指明了前行的方向。我们必须在马克思反对他那个时代所有“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过程中，深入探究他的真实世界和检视他所完成的转变、进步与发展<sup>3</sup>。

## 2. 走近马克思

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出生于普鲁士一个律师家庭。1843年和燕妮结婚，同年秋迁居巴黎，同卢格合办《德法年鉴》杂志。这时发表的一些文章表明他已成为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19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标志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并为无产阶级改变不公社会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武器。

马克思一生拥有崇高的理想和抱负，在中学时代就表现出了出

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1页。

2 [英]罗纳德·蒙克：《马克思在21世纪——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张英魁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3 [英]罗纳德·蒙克：《马克思在21世纪——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张英魁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页。

色的天赋和才智,并立下为全人类幸福献身的誓言,他在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sup>1</sup>,“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无声息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sup>2</sup>1841年,年仅23岁的马克思大学毕业,1842年到《莱茵报》担任编辑,然而《莱茵报》在1843年因著名的“林木盗窃问题”被迫停止印刷。当时在德国西部有大片森林草地,之前居民可在这些地方砍柴、放牧。可后来这片森林被贵族地主霸占,居民想到山林中拾柴草,却被议会政府认为是“盗窃”。此事引起民众不满,人们谴责议会的不公裁断。马克思在《莱茵报》发表了系列文章表达看法,严厉抨击普鲁士政府的做法,站在民众一边,维护了农民利益。“林木盗窃案”问题促使马克思对当时维护贵族地主的私有制社会进行了更多思考。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他亲身经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差异与贫富悬殊,目睹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资产阶级的罪恶和无产阶级的悲惨,对现实社会有自己的认识和思考。在当时,“英国的农业工人是悲惨的穷人,需要救济的贫民……除了北美和某些新殖民地以外,还有哪个国家农业上使用的自由劳动的工资是大大超过工人最必需的生存资料的呢?……毫无疑问,英国的耕马由于是一种贵重财产,吃得比英国的农民好得多。”<sup>3</sup>马克思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9页。

2 同上。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84页。

思描述英国资产阶级“圈地运动”说：“英国工业的发展使苏格兰地产获得了新的价值。而英国工业则为羊毛开辟了新的销售市场。要生产大量的羊毛，必然把耕地变成牧场……由于耕地接连不断地变成牧场，结果苏格兰的地产使羊群赶走了人。”<sup>1</sup>“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sup>2</sup>一面是资产阶级对于货币利润的极度崇拜与推崇，过着贪婪腐化的生活；另一面是无产阶级对现实社会的极度悲观与失望。可以说，是资本家一系列的贪婪本质以及对于劳动者的掠夺造成的社会极度不公，深深刺痛了马克思，使马克思更加坚定了改变劳动阶级状况与命运，为“人类解放”奋斗的终极目标。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sup>3</sup>。对此，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作了深入研究，并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剩余价值理论，真正揭露资本剥削秘密的伟人。

马克思现代性的新方法创建了一种救赎政治，一种普世的政治。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4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40页。

永远发展与历史必然进步是一个大胆的观念<sup>1</sup>。然而，由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和剥削制度的揭露和批判，使贵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势力迫害他，驱逐他。他不得不四处转移，靠朋友救济生存，其生活困难有时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曾经一度连每天买面包、买写作纸张的钱都没有，可以说，马克思一生绝大多数时期是在贫困中度过的。马克思和燕妮共生了四女二子，由于上述原因，只有三个女儿长大成人，马克思更是积劳成疾。青年时代通宵达旦地研究写作，30年窘困的生活，严重损伤了他的身体。由于老年后疾病的折磨，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于1883年3月14日永远地停止了思想。

以马克思过人的才华和他的法律专业，他能在当时谋得一份非常稳定和富有的职业，但马克思选定要为人平等和解放而工作。他要研究揭示私有制剥削的秘密，要研究如何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改革。他一生坚持为此奋斗，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为人类作出了伟大贡献。20世纪90年代初，当苏东剧变、自由主义欢呼“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之时，雅克·德里达，一位后现代、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捍卫者，却在其著作《马克思的“幽灵”》中大声疾呼“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sup>2</sup>。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也说，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仍旧可以“揭露资本主义价值的历史相对性，揭示它们的历史局限性，并且因此防止让它们冻结成一种无边界常识”<sup>3</sup>。事实上人类在今天并没有忘记马克思，马克

---

1 [英] 罗纳德·蒙克：《马克思在21世纪——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张英魁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页。

2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页。

3 Bauman, *Socialism: The Active Utopia*, London: Allen&Unwin, 1976, p99。

思成了人们推举的“千年马克思”，也是永远的马克思。

纵观马克思的一生可以发现：这位伟大的社会改造者，他思想中关注的是全人类的命运，是人人平等和幸福。他预言资本主义将被它自身能量的产物所吞噬，预言社会将最终发展成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他是一位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批判者，也是一个新社会的创造者。

### 3. 民族危机与志士仁人的救亡图存

中国幅员广大、文化精深，拥有灿烂的古代历史文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更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的杰出科学成果。从闻名世界的丝绸瓷器，到神秘的中医文化，从巧夺天工的宫殿园林和精美的石窟雕塑，到百花竞艳的戏剧艺术，无不彰显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勤劳与智慧。

但在 1840 年的历史坐标上，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在鸦片的烟雾缭绕中和西方列强的践踏下消耗殆尽了。西方列强毫无顾忌地蔑视着“东亚病夫”，先后与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了中国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强租了山东的胶州湾、威海卫，香港岛及广州的广州湾和福建等中国领土。这些自称“西方文明传播者”的侵略者在中国恣意妄为，抢劫中国财富，破坏中国文明古迹，肆意释放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霸权主义侵略本性。

帝国列强在政治方面也控制了中国的内政外交，镇压反抗，扶植收买代理人。从此，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横行不法，中国政府却无权干预。在经济方面，控制了中国的通商口岸，剥夺中国的关税自

主权，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并实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这使中国在经济上丧失了独立性，中国被迫纳入了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成为了西方大国的经济附庸。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矛盾，呈现错综复杂的状况。其中，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了最主要的矛盾，近代中国面临着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失去主权与尊严的大地上，中国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想要迈开前进脚步，却找不到进发的路。

近代中国处在彷徨年代，混合着屈辱与悲愤、焦躁与希冀的中国人，被迫进入了有西方列强殖民霸权横行的世界近代史旅程，无数仁人志士也踏上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之路。

首先被唤醒的是中国士大夫阶层。以魏源<sup>1</sup>等为代表的中国爱国人士发出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历史声音。中国的农民阶级也开始觉醒了，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利用改造的基督教义，对中国封建社会进行了猛烈抨击，但最终倒在了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夹击之下。“师夷长技以自强”付诸实践是在1861年后，以奕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运动”开始运作。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中对如何解决当时内忧外患的危机，形成了“洋务派”与“守旧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工业，培养新式人才，创办新学堂并派留学生，筹划海防，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

---

1 魏源（1794—1857），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著有《海国图志》。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指出：“《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巨大影响，认为它是‘不龟手之药’，其意义出自《庄子》中的故事，指一种使手不裂的药，有人用其来治伤，有人用它来实现政治抱负，借喻魏源《海国图志》放在中国其影响甚微，却造就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另外，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海国图志》之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中国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

朝封建统治。这些举措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由于其阶级局限性，洋务运动终以 1895 年甲午战争失败而告终。

19 世纪后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夹缝中艰难生存。冯桂芬、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一批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反对侵略，维护民族独立与主权，批判封建守旧势力，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变革封建专制制度，实行君民共主义院政治。但因未认清西方侵略者的强权本性，其政治上的软弱性与妥协性注定他们的呼喊只能苍白无力。康有为的维新思想，严复的进化论等也曾起过振聋发聩的作用，但都因为其阶级局限性而陷于失败。

资产阶级改良派倒下了，但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没有屈服，他们控诉帝国主义的侵华罪恶，提出了挽救中国危局的行动纲领。其中涌现了孙中山、章太炎等一大批伟大的爱国人物。他们为代表的大批爱国先觉者，涉外远洋，历尽千辛万苦，寻找强国之道。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在实践中也再三碰壁。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到历经“公车上书”与“百日维新”，再到历经学生与知识分子爱国的“五四运动”，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巨大疑问仍旧是：中国向何处去？

探索的过程是艰辛的，但探索中累积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却弥足珍贵。有人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失去了信心和勇气，有人从改革派转变为保皇派。但更多的中国人，在民族救亡图存过程中觉醒，并逐渐形成了中国未来景象的共识，那就是打造一个“天下为公”的平等、自由、富强之共和国。

## 4. 共和国：几代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梦想

立足新时代，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sup>1</sup>；回首历史，中国道路的艰难抉择，共和理想的实现，几代中国人国富民强的梦想，凝聚在对共和国的历史追求之中。“周召共和”，是用雏形的“共和行政”表明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共治实践和愿望<sup>2</sup>。当东西方文化的真正冲突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发端于西方的“REPUBLIC”观念，和中华民族古老的“共和”观念相融合，一种崭新的政治图景开始在中国人头脑中渐以明晰，并成为替代中华传统帝制的理想国图景。

开始时，立宪派企图以宪法来制约皇权，从而达到保障民权的目的。清王朝也宣布了“预备立宪”，但不过是为了暂缓自己统治的危机。<sup>3</sup>孙中山在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之前，是一个改良者。他曾经献上万字强国策，却吃了手握清朝大权的李鸿章的闭门羹。我们在百年之后做一个想象，如果李鸿章当时接纳这个年轻才俊的变革策略，清王朝的命运会如何？会走向一个君主立宪、民权得以保障的现代化国家，还是会不经历激烈革命，通过改良而走向民主与共和？当然，历史没有如果，但历史告诉我们，企图借助于自身改

---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

2 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厉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又载“共伯和干王政”。历史记载公元前841年（一说前842年）周朝国人暴动，周厉王出逃山西，太子静藏于召公家，后来召公以自己的儿子顶替太子静赴死，太子静得以保全。后来共伯和摄行王事，史称为“共和”。

3 从1906年开始，清末统治者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学习西方以宪法限制王权的政治实践。这是一场清朝统治者不得已的一种让步行为，立宪活动不免带有统治者强烈的自我权力自保痕迹。这场宪政改革虽未取得立宪派的预期效果，但诉求于国家体制与制度创新，仍然具有开创中国政治近代化的意义，同时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也是一场宪政知识的教育活动，具有一定的意义。



革走向封建专制的彼岸，建构一个现代民主共和的国家，几乎是痴人说梦。

武昌起义留下了永远激励中国人的英雄主义与革命精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坟茔，已成为中国人走向共和的决心与革命精神的象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使中华民族迈出了走向共和最坚实的一步。

封建主义清王朝自身无法实现社会转型，内部变革无法推动，抵御不了外侵的凌辱与斗争的溃败之势。而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失败，也最终证明了资本主义强国之路在中国走不通。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sup>1</sup>如果说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对共和与民主的表达，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也培育组织着一个最广大的追求共和的群体，即由中国优秀知识分子领导的、以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构成的共产主义者群体。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这一群体对共和国的追求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中国人民对共和国的追求，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 5. 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的选择

在历史彷徨和道路探索中，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个“主义”从此和中国一同历经沉浮，并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

---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4页。

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sup>1</sup>。马克思主义，一种崭新的思想影响了世界，也影响了中国，其所诉求的人民政治权利与经济地位平等及其公有制度，吸引着中国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人民的理性选择，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一句我们耳熟能详的描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sup>2</sup>，“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来说，无疑是一种社会改变的样板<sup>3</sup>。俄国建立了工农联盟执政的国家，人民的地位获得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俄国的经验，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未来革命方向的认识更为清晰。可以说，十月革命的胜利，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影响和落地，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而“五四运动”高举着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五四运动之后，青年社团和传播新思想的报纸杂志大量涌现，各种思潮相互争鸣。先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目睹西方列强对中国利益的践踏，向往中国能够如俄国十月革命一样产生劳动人民执掌的政权，因此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把公有制的人民主权的社会主义视为人类的共同理想。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培养着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两股巨大的力量最终在历史进程中融合在了一起。

---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5—1476页。

2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3 1917年11月7日，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因其发生在俄历的10月25日，史称“十月革命”。

马克思说：“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主张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主张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公有制社会。而这种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重任，必须由自觉了的无产阶级来担当。

历史考验过每一个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相继进行了一次次尝试，但历史一次次证明他们担当不了历史重任。中国的无产阶级，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承担起了自己的历史重担。

1921年7月23日是一个光辉的日子，在这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标志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者与先锋队诞生了。从此，中国的无产阶级担当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担，在改造世界的同时改造着自身，并朝向一个平等、自由与民主的方向前进。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的排挤迫害，中共在汉口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确定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1927年8月1日爆发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历经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了。国民党疯狂的围剿及党内的各种错误，使中国共产党一度陷入危亡边缘。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全国强烈的呼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二次合作，共赴抗日战场。抗战胜利后，联合政府成为全国焦点，1946年的遗憾注定要留在重庆。三年的解放战争，南京总统府里的旗帜最终伴随着硝烟降了下来。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二十八个春秋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精神上滋养着中国共产党人，也在现实中成就了中国社会的质变。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世界的东方，“一唱雄鸡天下白”，一个古老的大国在获得新生后开始了新的征程！

马克思主义最终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君为臣纲”的政统颠覆了，政治权力的君主独占独有，转变为权力的人民所有。马克思主义还改变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气质，人民、平等、权利、自由、法治、民主、社会主义这些新观念成为中国人价值体系中的原则概念。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中国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模式。几十年的建设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在过去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里，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奇迹，完成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

在政治结构方面，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体系，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途径不断增多，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得到了充分尊重。在社会文化结构方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发展壮大。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时代文化相结合，中国特色和世界文明相结合。十八大报告给予这段历史以这样的评价：“在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中，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付出了最大牺牲，书写了感天动地的壮丽史诗，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sup>1</sup>

## 6. 新的航程与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缔造了共和国，指引着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中共中央做出了将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决定，并从西柏坡出发，“进京赶考”，奏响了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序曲。七届二中全会批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历史从未驻足，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奠定新政协制定共同纲领政治基础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历史的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sup>2</sup>马克思主义因为历史的选择，必然成为中国新航程中的旗帜与风帆。

新中国成立在即，激动与喜悦早已融入新中国的筹备工作中。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区域代表，人民解放军代表以及特别邀请人士，齐聚北京，共商国是，共同为新生的中国建言献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这一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盛会，向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新政协的成功召开，是爱国主义凝聚下中国人民共和精神的张扬。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新中国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历史实践相结合的成果，也给中国劳动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

2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0页。

大众带来“换了人间”的解放和欣喜。

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百废待兴。经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后，新中国已革新面貌，准备开启新的航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中国人民不仅要建立一个新的共和国，让华夏民族以独立的形象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自己从枷锁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还要建立一种新制度。中国人细胞里世代相传的“大同”基因，让人们渴望马克思所描绘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成为现实。1956年召开的八大，为中国人民描绘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宏伟蓝图。

但任何历史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在付出了代价之后，终于走上了新的改革之路。在拨乱反正的历史关口，新的改革需要解放人们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显现出巨大的威力。一场意义重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拉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次会议书写了新中国历史上转折性的一笔。

改革开放历程已走过三十余年，中国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在全球化与国际化的浪潮中，中国遭遇挑战也面临契机。国际间竞争的复杂性与国内发展任务的艰巨性，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整个中华民族都提出了必须解答的问题——中华民族如何塑造、凝聚现代民族精神？如何确立自我在世界体系中的角色？中国如何在经济高速发展中，构建中国特色的思想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软实力？如何不迷失自己的理想信念和目标？

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sup>1</sup>。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对此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sup>2</sup> 理想信念，是一个政党治国理政的旗帜，是一个民族奋力前行的向导。

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在党的文献中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理性命题，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表明中国执政党对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和软实力功能的认识达到了一种新的水平。新的航程必须在自觉的理论指导下才能进行。

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树立了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和理论。邓小平说：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sup>3</sup> “共同理想”正式提出也是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至此，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已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精神支撑，是当代中国人创新发展的力量源泉。早在1935年，毛泽东在谈到中华民族的抗日决心时就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63页。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44页。

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sup>1</sup>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中华民族精神与传统美德的提炼和时代升华，其中贯穿着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要求，作为社会价值导向的标尺，在构建社会主义文化、凝聚社会、营造社会风气、塑造公民素质的任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等，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千年思想家”影响了世界，影响了中国，并在中国获得了新的时代生命力。

## 二、把握世界的思想“慧眼”和理论工具

世界处在变化中，瞬息万变的金融潜流，无时不在的民族、种族冲突，日益凸现的领土与能源争夺，文化竞争与价值观冲突……拥有 13 亿人口的中国，该如何面对世界，走向未来？“全球化”是 20 世纪晚期的词语，但马克思在 150 年前就预测到了其产生的大部分后果。<sup>2</sup> 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走出了历史危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创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模式。不论当今世界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不论前进道路上多么错综复杂，我们都将继续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前行，走出独特的“中国模式”发展道路。今天，我们在感知世界、融入世界与建构世界的过程中，

---

1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56 页。

2 John Cassidy: 'The Next Big Thinker', Independent on Sunday, 7 December, 1997, p11。



更需要一种独特的、被中国实践检验了的理论智慧——马克思主义作指导。

## 1. 中国发展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有机统一

以 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为导火线，点燃了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的烽烟<sup>1</sup>。全球股价、大宗商品价格和主要货币汇率等剧烈波动，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巨幅涨落，危机发展速度和造成影响的程度大大超出世界范围原有的想象，说明其中有更深刻、更复杂的原因<sup>2</sup>。毋庸置疑，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的蔓延，对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神话提出了挑战，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迷思”（myth）再一次被打破<sup>3</sup>，一种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现代虚拟经济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模式，此时再现危机，跨越国界的经济模式把这种危机蔓延到全世界。人们忽然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危机并不以经济发展外在形式的变革得以消除，反而会以新的面目重现——只要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间的矛盾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难以消除。

2009 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际，中国市场的稳定发展成为一道独好的风景；在欧洲，在马克思的故乡，另一道风景也引人注目，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伟大著作《资本论》重新成为读者追捧的对象。柏林卡尔－迪茨出版社社长尤尔根·施特隆普说：“现在，马

1 美国次贷危机（subprime crisis）又称次级房贷危机，也译为次债危机。它是指一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它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092871.htm>，2012 年 10 月 30 日。

2 王永利：《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中国经济时报，2008 年 11 月。

3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一体化”，其本质是适应国家垄断资本向国际垄断资本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 and 政策主张。

克思又成为了时尚。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现在马克思的书非常热销，我们预计到了今年年底，销量还会增加很多。因为很多人都会选择这本书做圣诞节的礼物。”《汉堡晚报》则评论说：“现在马克思的魅力正在飞速增加。”<sup>1</sup>马克思著作，尤其是《资本论》畅销的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青年学者们，认为金融危机昭示了新自由主义幸福诺言的破产，更在于“千年马克思”对经济发展的深刻洞察——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源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

金融危机让世界焦虑。此时的中国却在向世人展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能量。“中国”（China）更成了世界流行语。而中国的沉稳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模式分不开。正如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sup>2</sup>中国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在这一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引下逐渐形成的。

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始终处于世界格局与语境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雅尔塔体系基础上形成的美苏两大阵营对抗的格局，或称为“冷战时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以一方瓦解而解体。世界格局从此由两极向多极发展。冷战格局虽然风逝，但其思维仍影响着现代世界秩序的整合与建构。文化的多元化及其价值观冲突，威权体制合法性的弱化趋势，加上金融危机使一些国家出现了社会动荡，局部暴力和武装冲突也越来越多。在多元秩序中的新世界，中国必须持有清醒和智慧的头脑，以应对复杂世界格局提出的种种

1 《资本论》热销欧洲 马克思“火”了，参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10/18/content\\_10213543.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10/18/content_10213543.htm)，2012年10月10日。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417页。

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抗风险能力说服着西方世界，也引发了世界重新审视中国模式。人们可以忽略与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与发展路径，但不会无视他种模式的超越性发展。不管现实中国还存在多少待解决的问题，不论对中国现实有多少诟病，中国社会的总体进步，中国人在数十年中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让世界“意外”。中国模式所信守和依赖的中国特色理论，即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传统、渐进式改革、体系性包容、文化自觉等，这些中国发展模式中的重要元素，也渐受世人关注。

当外国研究者在追问中国发展模式的魔力在哪里时，我们也在总结思考发展成就的经验和思想理论根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是秉持马克思主义，在具体实践中创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符合中国实际的思想理论指导下，创造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成就。那么千年马克思的理论魔力究竟在何处？

## 2. 剩余价值理论：揭示资本剥削的秘密

在马克思的时代，人们目睹资本主义私有制体系下劳动者的悲苦境地。有人把这归于劳动者的能力，有人把这归于资本特定的效能，马克思却用他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私有制下资本剥削工人的秘密，使劳动阶级认清了自己悲惨状况的社会根源，也激活了无产者的阶级意识，为后来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阶级力量。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因之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发现”之一。

19世纪，西欧主要国家陆续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的财富超过了以往人类社会生产的总合。人们在惊叹机器

生产给人类文明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却不明白无产阶级的境况为什么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工人们不明白为什么每天竭力劳作，换来的却是每况愈下的生活。直到马克思发现了他一生研究中最重要理论之一——剩余价值理论。

剩余价值理论区分了剩余价值和利润，指出剩余价值的源泉是可变资本，而把剩余价值看作全部预付资本的产物时，剩余价值就转化为了利润。剩余价值率揭示的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而利润率仅表示资本的增殖程度。当资本家试图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都归为生产成本时，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事实就被资本利润假象掩盖住了。马克思还研究了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形式——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资本主义初期技术手段相对缺乏的条件下，资本家要想增加剩余价值，就只能采取较原始的剥削手段——延长工作日或增加劳动负荷。资本家“使工作日延长到正常的最大极限，然后越过这个极限，延长到12小时自然日的界限。此后，自18世纪最后30多年大工业出现以来，就开始了一个像雪崩一样猛烈的、突破一切界限的冲击。道德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sup>1</sup>

马克思认为，剥削的关键是资本家掌握资本的所有权：“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sup>2</sup> 马克思《资本论》问世以前，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在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度辩护，但没能正确解释无产者贫困

1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07—308页。

2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63页。

化的根源。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让工人们明白了自己为什么创造财富却不能拥有财富。剩余价值理论成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奥秘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批判资本的剥削，“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sup>1</sup>。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出要变革这种不合理的剥削制度，核心在于推翻资本私有的制度，变革这种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分配方式和制度，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公有制度。剩余价值理论的确立，“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sup>2</sup>

### 3. 马克思主义的人学：人的全面解放

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中心议题。在马克思理论中，人不同于自然动物，不是单面的经济动物，他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sup>3</sup>，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在现实关系体系中，人必须挣脱个体所承受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压制，才能实现人类整体的全面解放。“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sup>4</sup> 马克思看到了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的解放作用，借助于新生产力发展，人们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自由，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相比较，却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

1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2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3页。

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sup>1</sup>但是，人仍处于资本的剥削和奴役之中，有资本家的自由，而无无产者的自由。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指出了摆脱奴役走向全面自由的人类解放之路，解放之路涵盖三个维度：一是人类从自然界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摆脱客观“必然王国”的支配，成为把握自然的“自由王国”的主人。当人还无法认识自然规律时，就只能受制于它的支配；二是人类从旧的社会关系束缚下解放出来，摆脱剥削压迫和不合理分工分配的束缚，成为平等社会关系的主人；三是人自身的解放。这意味着人对人性的全面自觉，对人自身物化、异化的扬弃，人不再是某种外在权威的奴隶，人为自己确立价值，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人成为自己的主人，并回归其社会性本质。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简明地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称为“自由人联合体”，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sup>2</sup>，一种“在保证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全面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sup>3</sup>。正是在此意义上，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实现共同富裕等思路，正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解放思想”在中国的具体运用。

邓小平提出了以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为基础，通过物质文明而达到社会系统文明的发展战略，他说：“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2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4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30页。

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sup>1</sup>而共同富裕的实现，是部分到整体的逐步富裕，是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过程富裕。“可以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sup>2</sup>这个“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构想，定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与实现社会公正平等的路径。

十四大报告中，就强调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十六大报告则进一步突出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强调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每一阶段都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学者们在理论层面也强调，伴随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将传统政治经济中纯公有社会主义论、产品社会主义论、速成社会主义论这三大理论支柱转化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理论、共同富裕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理论、依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和完善政府调控的理论、全面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理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举的理论。”<sup>3</sup>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要“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sup>4</sup>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8页。

2 林建公、咎瑞礼：《邓小平的实践辩证法》，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2页。

3 刘诗白：《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代序》，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

4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

当代中国的发展，充分地展现六十年来几代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及全面提升社会文明的理解、探索 and 追求，发展和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人学思想。

#### 4. 唯物史观：人类社会规律的认识

如果将马克思主义比喻为一座花园，那么，唯物史观无疑是这座花园里最美丽的花朵。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方向以及创造历史的主体，都在唯物史观中得以充分阐释。人类在这里运用自己的理性，把握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人类在漫长历史实践中，探索自然规律与人类社会规律，并产生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哲学家与思想家们以不同的方式诠释着世界，许多人将社会历史发展根源归溯到人的精神与意识领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社会历史规律的概括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的指称，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sup>1</sup>。

唯物史观的基本论点如下：①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具有反作用；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④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变革，其最高形式是社会革命；⑤社会发展历史是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和作用总是受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条件的制约。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4—705页。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强调：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一定的社会意识，当然社会意识对社会历史也具有一定的反作用。马克思看到了人们改造自然的物质能力与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结成的社会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他用形象的词汇描述这个抽象的道理。人类社会如同一座宏伟大厦，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牢固的基础始终是上层大厦挺立的前提，上层建筑也影响着它的基础，它总是赋予更多基础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还强调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变革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抛弃了英雄史观，历史不是若干“英雄”“天才”在推动，历史长河是由广大人民群众构成和推动的，而每一时代的历史人物则始终站在河流最前端。

###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时代精神的生成

十八大报告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sup>1</sup>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历经 60 多年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不同历史阶段，生长出许多中国版和现代版的时代精神，革命时期的延安精神、沂蒙精神与西柏坡精神，建设时期的雷锋精神、铁人精神、抗洪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无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实践中生成的，无不饱含着马克思主义政党与人民大众创

---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 年。

新、奋斗的精神内涵。

## 1. 马克思主义统领下传统精神的赓续

18 世纪德国哲学家、“民族精神之父”赫尔德曾说：“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它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一切，理解一切。”<sup>1</sup>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也走了一条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路子。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必须立足于具体历史与现实，在具体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实践自己的理想，如果“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sup>2</sup>。马克思主义也特别强调要立足于传统，去开创新的历史和新的境界。马克思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sup>3</sup>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中国人民接受，也因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有许多与马克思主义相融的契合点。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主张的“民为邦本”，老子所说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墨、法诸家都具有的重民思想，这些君舟民水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都具有许多共同的价值取向。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厚实文化土壤。

但传统文化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有

---

1 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在其《另一种历史哲学》书中，从“一般精神”引申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参见赵杰：《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中国民族报，2011 年 7 月 8 日。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第 130—131 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84 页。

时代的局限性。正如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与匡亚明谈论孔子时指出：“孔子的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他思想中有消极的东西，也有积极的东西，只能当作历史遗产，批判地继承和发扬。对当前革命运动来说，它是属于第二位的東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导革命运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sup>1</sup>而且传统文化也不应拒绝任何世界文明的先进思想和理论武器。中国执政党素来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毛泽东在1941年5月《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就指出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sup>2</sup>他也很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营养，强调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sup>3</sup>1943年，党就明确总结说：“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sup>4</sup>事实上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经典理论。

“实事求是”是中国古老的哲学智慧，毛泽东以此概括为党的思想路线；传统文化中“敬德保民”“民贵君轻”“君舟民水”等民本思想，都成为毛泽东建构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的宝贵思想来源。至于“独立自主”更与中国悠久的爱国传统、自强不息的精

1 参见匡亚明：《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年，第474页。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795页。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1页。

神相关。中国当前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美丽中国”和谐发展的社会理念，就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精神结合的创新产物。

## 2.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精神与建设精神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表现为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也表现为对中国革命精神的塑造。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艰苦卓绝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执着坚定的中国革命精神。中国革命精神的生成与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进程相一致。可以说，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沂蒙精神等，构成了探索中国革命的精神系列。中国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中形成的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基石。长征宣告着中国共产党人不屈的革命斗志和乐观主义精神，“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种子沿途“播种”，在中国这片东方土地上结出丰硕的果实。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运筹帷幄，自力更生，成为延安精神的真实写照。在中国人的记忆中，西柏坡这个小村庄是与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村庄里，中国共产党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特有的革命魄力——我们不仅要破坏旧世界，还要创造新世界，开启新的革命征程。<sup>1</sup>

中国的革命精神，源于中华悠久的民族精神，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对真善美的追求。理论造福人民，人民自觉融入革命，正是因为有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引导，才确保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

---

1 在河北西柏坡村，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组织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蓝图。

革命精神的积累创新。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人民真正翻身成为国家主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思想信仰的力量激发着中国人民的建设精神和活力。人们以高昂的爱国热情工作，为新中国的建设做着积极奉献。

“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言壮语，表达了石油工人把工作与爱国情感结合在一起的时代精神，也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人的心声和精神面貌。“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既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前景的概括，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乐观主义精神的当代言说。毛泽东预见性地描绘了我们今日“行走的空间”，无论太空还是海洋，都有中国人创造的奇迹与奋斗的身影。

中国改革开放的建设实践，也在中国执政党的理论建构中表现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社会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建设中的落地生根，并且由此萌生出中国现代社会中丰富的精神和品格。

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sup>1</sup> 在中国精神传承与创新的道路上，马克思主义一直处于文化价值的统领地位，在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中，也一直发挥着思想灵魂的功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价值结构中的灵魂地位，保证着我们建设事业的本质与方向。十八大报告因此再次申明：“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

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sup>1</sup>向世界宣告了中国的旗帜与道路选择。报告还表达了共产党对未来的执政信念：“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sup>2</sup>

### 3.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理念和精神品质

十八大报告中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论述，再次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信仰与根本宗旨，“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sup>3</sup>。这是在承担人民重托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执政党向人民、向世界的言说与承诺。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同于许多其他政党。美国人用象与驴来隐喻政党之间的纷争<sup>4</sup>，政党的自利性似乎已成人们对政治现象的共识。马克思主义政党除了社会政治诉求外，还有明确的德性诉求，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身的内在性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明确宣示为人类大众求解放，“没有任何自我的利益”，这也就使得在全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政治品质与道德自律相统一的政党。

---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

2 同上。

3 同上。

4 1828年，杰克逊竞选美国第七任总统，对手批评他是“笨驴”，讽刺他主张“让人民统治”。杰克逊当选后，驴子绰号一直与他民主党相随。19世纪70年代，政治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在美国的《哈泼斯周刊》上分别以长耳朵的驴和长鼻子的象比拟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自此驴和象渐成美国两大党象征，两党也分别以驴、象作为党徽的标记。驴象之争就成了美国政治竞选的形象描绘。参见韩常代：《美国“驴象之争”的由来》，海内与海外，2003年第4期。

马克思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反对制造压迫和不平等的制度,宣示为全世界劳苦大众谋利益。《共产党宣言》庄严宣布:“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sup>1</sup>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言行中,我们可看到其人民立场与德性诉求。“以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sup>2</sup>,马克思将“实践”作为自己的理论之基,而实践活动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者深知,理论一旦掌握群众,便会发挥无穷的力量。

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有标志,十八大提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建设”,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的再次重申。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才能使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对自己提出道德要求的政党,它也为自我合法性和纯洁性提供了严格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道德追求,落在新的历史时期,就要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执政目的上,代表人民并且为人民执政,最终落实在“以人为本”上,这包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传递着重要的价值原则。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时起就十分重视自己的政治目的和道德诉求。革命队伍是来源于人民的,它的建立、发展、壮大离不开人民的支持。伴随着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1页。

解放战争进一步的升华，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认同。人民群众的拥护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也是中国建设的精神动力。时至今日，“我们总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正反两方面经验，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sup>1</sup>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先进性、纯洁性，能在中国特色政治文明发展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证明。

---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是中国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

库恩认为，“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变迁，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一次变迁。”他说，中国是在一个急流险滩上高速运行中的国家。他主张中国应该拒绝不加分析地借鉴和照搬西方的民主和自由的制度和标准。

——库恩

---

回首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摘自十八大报告

罗曼·罗兰曾说,“一种理想就是一种力量”。“理想信念,是一个政党治国理政的旗帜,是一个民族奋力前行的向导。”<sup>1</sup>执政党文献也断言,“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sup>2</sup>在当前全球化和“E时代”条件下,不同国家如何确立自身在多极格局变动中的位置,怎样坚持并走好自己的历史发展道路,如何坚守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价值,是每个国家必须深思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十八大报告总结说,“回首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sup>3</sup>为此,我们应对“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更好的建构与诠释,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与自信,发挥“共同理想”的凝聚功能和力量优势。

## 一、“十月革命”吹响社会主义号角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sup>4</sup>(毛泽东语)十月革命犹如茫茫长夜中的一盏明灯,唤醒了欧洲,点燃了希望,焕发了全世界革命的热情,改变了世界历史前进的方向,成为20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分水岭,也开辟了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1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636页。

2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6页。

3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

4 杨信礼:《重读〈实践论〉〈矛盾论〉》,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4页。

的新时代。

## 1.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开启人类新纪元

今天的涅瓦河水依然静静流淌，仿佛默默述说着日渐远去却彪炳史册的壮举。涅瓦河畔，历经百年沧桑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静静地停靠，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然而，若没有那一场震撼世界的革命，没有“十月革命”的勋章，她的名字不会被多少人知晓。正是传奇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一声“怒吼”，打响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炮，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她不仅击碎了俄国的旧世界，激励人民在新社会建设中奋勇向前，也给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和世界其他受压迫的国家和民族带来新的希望。

登上“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可遥望涅瓦河对岸的冬宫。在“阿芙乐尔”巡洋舰甲板前，至今仍摆放着一门大炮，炮身上有一块铜牌：1917年10月25日（俄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根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用这门152毫米口径的炮发出了攻打冬宫的信号。

1917年11月7日夜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所在地斯莫尔尼宫灯火通明，呈现决战前的紧张局面：装甲车隆隆作响，赤卫队战士、海水兵、军团士兵整装待命，21时45分列宁站起来激动地注视着手中的怀表。刹那间，一声惊雷震天动地，“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吹响了攻占冬宫的号角。“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也成为十月革命的象征，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7日晚，攻占冬宫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开幕了。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农民书》，正式宣布临时政府被推翻，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向全世界宣告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由理想变为了现实。“阿芙乐尔”在古罗马神话中指司晨的女神，有“黎明”或者“曙光”的意思，而“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代表的正是一个新世纪的黎明。

十月革命爆发当天，刘镜人（中国驻俄公使）在致外交部的电报中说：“近俄内讧益烈，广义派势力益张，要求操政权，主和议，并以暴动相挟制。政府力弱，镇压为难，恐变在旦夕。”<sup>1</sup>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在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就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临时政府已推翻”的大字标题，报道了“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翻克伦斯基政府”的消息。同一天的上海《申报》也报道了相关消息，虽然当时中国报刊关于十月革命的报道是零星的，但从此，国内开始宣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其中宣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最积极的代表之一是李大钊。他重点分析革命原因与意义，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等系列文章，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此时内外不稳局势使中国也急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指导。1917年，中国宣布对德国、奥地利宣战，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打倒北洋军阀专政的虚假共和，重新建立新生共和的民主法统，进行了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斗争，人民处于水深火热当中，而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

---

1 见李兴耕：《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是怎样传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5期。

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sup>1</sup>

## 2. 苏联解体之历史洞察

然而就在 1991 年，苏联这一社会主义大厦轰然倒塌，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唯物史观认为，重大历史事变必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sup>2</sup> 像苏联解体这一影响整个 20 世纪的历史事变，也必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伟大的红色国家建立伊始，列宁把这艘巨轮的航标完全对准了社会主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使苏联经济发展迅速，但最后还是偏离了轨道。斯大林开始掌控这艘巨轮时，其动力系统就慢慢出现了故障，二元经济发展要求与一元的政治体系发生了冲撞，经济逐步震荡于“民进国退”和“国进民退”之间。如法国学者托尼·安德烈阿尼指出：“建立在高度集中管理上的国家社会主义——斯大林模式隐藏着危机。现实社会主义阵营曾相当强大，足以改变其发展道路。但五六十年代的一切改革都羞羞答答，受到旧制度的束缚。教条主义、怀疑主义、宗派主义、体制弊病都与高度集权的体制密切相关，这种体制窒息了人们的思想和首创精神。”<sup>3</sup> 源于列宁时期，形成于斯大林时期的“官僚特权阶层”，经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官僚特权阶层”更加蔓延，人们极力用手中权力获取利益，社会各种矛盾也激化升温。等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这艘大船已彻底远离了社会主义航道，最终沉没。透过历史云烟看苏联解体的整个过程，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联邦

1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303 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92 页。

3 [法] 托尼·安德烈阿尼：《法国学者安德烈阿尼谈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顾锦屏摘译，国外理论动态，1998 年第 10 期。

制国家结构相矛盾，并且传统体制与社会生产力相冲突。

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芙，著有《自上而下的革命——苏联制度的解体》，作者用6年的时间探寻苏联解体的原因，作者曾概括指出：“社会主义的苏联解体了，这并不说明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也不证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优越。相反，要把一个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工业化社会，最优越的制度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这已为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历史所证实。人民选择社会主义，不仅在于更有利于社会发展，而且在于这个制度有利于实现最大范围和最高程度的社会公正。”<sup>1</sup>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确实存在诸多曲折甚至是历史的震荡，苏联解体了，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体制对于苏联的发展也体现了许多奇迹和优势，苏联仅用10年时间即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水平仅次于美国，据西方估计，1928—1940年，苏联年均增长5.8%，1950年苏联实现工业化，直到1975年，一直比美国的发展速度快，这期间苏联的年平均增长率是4.8%，而美国只有3.3%。可以说苏联用10年的时间走完了美国将近100年才完成的工业化发展路程，这种经济发展的奇迹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真正实现。

苏联还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展形势下，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胜利，这一胜利使得社会主义阵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并不断扩大，极大促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大卫·科芙还分析道：“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我这里指的是大约10万人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正是这个‘精英集团’想实行资本主义，以便他们

---

1 [美]大卫·科芙：《一位美国学者对苏联解体的分析》，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7期。

享有更大的权力，拥有更多的财富。”<sup>1</sup> 据美国学者莱斯利·霍姆斯所认为的，苏联前期建立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基本上适合了它由一个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型，但因这种体制和意识形态只有实现现代化的能力，而没有走向后现代阶段的能力，致使苏联在向现代性（以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为标志）国家转型过程中，原来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并没有与时俱进，而是愈来愈僵化和保守，所以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并最终无法解决，从而导致了它的崩溃。

同时，苏联解体也有外部力量的敌意干涉，因为从十月革命胜利和苏联诞生的那天起，资本主义国家就把搞垮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作为它们的重要战略目标，战前采取武装颠覆的“扼杀”战略，战后实行“遏制”战略与和平演变战略，阻止苏联和共产主义思想在世界扩大影响。所以说，苏联解体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

### 3. 苏东剧变之省思

1989年的“东欧剧变”，使东欧所有在“二战”后由苏联老大哥一手扶持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崩溃。社会主义的红色故乡，执政74载，93年党史，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超级航母折戟沉沙。国旗上的金色镰刀斧头图形化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问号：这个当年在世界上幅员最辽阔、综合实力最雄厚、敢于和美国对抗的大国为什么轰然倒塌？苏东剧变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为何发生？

---

1 [美] 大卫·科美：《一位美国学者对苏联解体的分析》，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7期。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其中重要原因即为它们依循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具有高度的同质性。新经济政策作为一种过渡，并不是一种稳定的社会形态，“二元经济和一元政治”的矛盾将导致社会运行极度不畅，市场经济体制冲击下经济震荡于“民进国退”和“国进民退”之间，当维系震荡的社会财富消耗殆尽时，社会形态必然发生改变，导致愈发严重的贫富差距、公正缺失、贪污腐化、执政党异化等。同时，集权统治的政治体制为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提供了土壤，俄国学者符拉基米尔·科伦泰认为，苏维埃制度一方面为俄罗斯的发展做了不少事情，如使它变成了世界主要工业国之一，使居民受到良好的教育等；另一方面，这些进步又都是在极权强制下实现的<sup>1</sup>。长期的集权统治使苏联早已失去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离社会主义要求越来越远。权力的高度集中，权力执行不受约束，权力资源分配不均，同时又缺乏完善的党内监督和社会监督。除了经济模式，政治体制偏离了社会主义，文化上苏联同样遭遇价值观的变迁，失去了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与信念，思想不统一，民心涣散，必会酿成苏联模式的日渐式微。

正因为苏联将这一模式毫无保留地移植给了东欧各国，当上述弊端不断淤积达到一定程度时，苏东剧变也就在所难免。据大卫·科芙分析：1990年前后，许多西方国家在苏联进行多次民意测验，结果显示高达80%的人民都希望坚持社会主义，支持实行资本主义的人在5%~20%之间。而美国一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做了一个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调查对象是掌握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分析结果是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

---

1 王佳菲：《国外学者关于苏联模式和社会主义前途的思考》，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2期。

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实现民主化；76.7%认为应实行资本主义。集权体制下精英集团，特权阶层的思想渗透，对苏联解体产生了重要影响。东欧国家没有摆脱集权统治下的阴霾，纷纷宣告解体，有的改宗社会民主党，组织分裂，有的思想涣散，迷失方向。但正如上文所言，苏联解体最终并不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的长足发展必须使人民当家作主，让人民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

哈贝马斯对此曾指出，从苏东剧变中得出社会主义观念已经破产的结论是不正确的。美国经济学家乔治认为：“苏联作为一个将马克思主义付诸实践的国家，却没有很好地遵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是一整套包括产品和劳务社会生产在内的综合性的体系，最终决定一切社会、政治以至思想领域的关系。但是苏联采用的生产方式——运用中央计划、集体农庄、国有制和生产分配集权管理，却造就了大多数人的贫困和少数特权阶层的富裕，形成官僚体制。这样的体制导致经济的失败，不能人尽其才，选拔人才的标准是温顺、服从、意识形态正确无误，而不是一个人的才能。体制的疾瘤不断增长最终断送了这一体制本身。”<sup>1</sup> 美国学者保罗也认为，苏东剧变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因为在马克思逝世后，列宁—斯大林主义虽然与马克思主义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马克思的思想已被变形，并在极权的官僚体制国家中发展到顶点。马克思理论的灵活性、人道主义和对自由的关注不复存在，反而代之以僵化、形式化、教条化的体制。<sup>2</sup>

1 转引自王佳菲：《国外学者关于苏联模式和社会主义前途的思考》，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2期。

2 Paul Paolucci, “The Discursive Transformation of Marx’s Communism into Soviet Diamat”, Critical Sociology, 2004, Vol. 30 Issue 3.

## 4. 百年激荡改变不了社会主义发展轨迹

从繁荣到危机，从危机到变革，从变革到崩溃，苏东剧变事件始终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各种争论和分歧也不曾尘埃落定，人们从不同视角，出于各种目的，站在各自立场解读着这场社会剧变。英国学者蒙蒂·约翰斯通认为，苏联模式的结果和经验已证明资本主义经济从根本上优越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观点，忽略了以下几点：第一，若干有利的历史条件——依靠这些条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才极大地维持住了自身的经济优势；第二，在所谓“共产主义崩溃”之前，资本主义强国在一定程度上被迫作出的让步——其部分目的是要抵消意识到的来自东方的政治挑战；第三，资本主义固有的人剥削人的制度和环境；第四，在苏联向资本主义迈进的道路上，当今人们看到的生产与生活水平的灾难性下降。<sup>1</sup>所以说，无法证明资本主义必然优越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失败，是因为苏联的发展逐渐脱离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者曼瑟尔·奥尔森，用其经济理论对苏联权力模式进行独特阐释，并和马里兰大学教授姆瑞尔提出解释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兴衰的“三段论”，认为中央计划经济一般经历相容利益主导期、分利集团发展期和体制僵化期三个阶段。在分利集团发展期，“苏联模式计划经济的体制是如此地逆市场而行，甚至高层官员们——或者特别是这些高层官员们——不得不违反规则和计划，以期完成下达给他们的任务目标。也就是说，违背市场规律的行为经常成为完成某些体制内目标的障碍”<sup>2</sup>，而在体制僵化期，“强势领袖去世，相容利益被一批高层干部的狭隘利益所取代。没有人拥

1 [英]蒙蒂·约翰斯通：《吉登斯“社会主义已经死亡论”的错误》，张光明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6期。

2 [美]曼瑟尔·奥尔森：《权力与繁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5页。

有社会，没有人关心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这一时期的经济表现越来越差，贪污、腐败盛行，是计划经济的没落期。经济体制不是崩溃就是面临根本的改变”<sup>1</sup>。因此，苏联模式仅是证明了其体制的失败、模式的失灵和航向的偏离，而无法证明社会主义体制本身的失败。

从实践中分析，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确实不够完善，尤其是过于僵化、保守、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已然成为苏联前进的束缚，没有能够继续实践而解体终结。但不可否认，它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并曾经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苏联共产党执政时间仅 74 年，但苏联一度成为世界位居第二的超级大国，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在 30 年代大危机中也曾一枝独秀，建立了属于自己国家的文化和教育。可以说，苏联模式自身逐步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疏远了马克思主义，抛弃了既定的航道，转向了资本主义。这一历史长河中的震荡证明了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复杂性、长期性和曲折性。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新生社会制度代替陈旧制度，必然要经过长期激烈的反复斗争，如英国于 1640 年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历经近两个世纪的内战、动荡与反复；法国从 1789 年资产阶级大革命到 1870 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诞生，同样经历了多次封建王朝的复辟。同是私有制的相互替代尚且如此反复与波折，何况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必然会经历更多的挫折、反复和考验。因此，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与未来前景，要具备历史眼光，不能因为一时的挫折，就丧失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如邓小平指出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

---

1 吴自聪：《在个人理性与政府权力之间》，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年 12 月，第 83—84 页。

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sup>1</sup>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样尖锐地提出: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sup>2</sup>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代言人所期盼的那样趋于消失,反而在更广的范围内引起世界人民的更广泛的兴趣,在西方国家,马克思多次被评为“千年伟人”,在2008年西方国家备受冲击的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资本论》热销和一波又一波的“马克思热”现象,更说明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持久生命力。

## 5. 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与发展的历史“困途”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社会顽疾与发展桎梏已严重影响其前进的步伐。特别是近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种种乱象和困境表明:西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再次浮现,经济危机,社会动荡。如金融危机海啸中,英国爆发大规模街头骚乱,美国信用评级首次遭下调,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恶化等问题不断涌现。

“现在,马克思又成为了时尚。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现在马克思的书非常热销,我们预计到了今年年底,销量还会增加很多。因为很多人都会选择这本书(《资本论》)做圣诞节的礼物”,柏林卡尔—迪茨出版社社长尤尔根·施特隆普在2008年10月时激动地告诉记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3页。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页。

者。为什么“马克思又成为了时髦人物”？为什么《资本论》又变成“打榜作品”？为什么《资本论》销售量比1900年提高百倍之多？已数月没睡安稳觉的德国财长施泰因·布吕克为什么开始阅读《资本论》，甚至成了马克思的粉丝？根本原因是华尔街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使得资本主义走进死胡同，而批判资本主义，预测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的历史巨著《资本论》再次成为时代的指南书。《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分析预测的准确性，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和永久魅力。说明资本主义发展尽管百年来出现诸多变化，但周期性发生金融危机的本质始终没有逃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预言。《资本论》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揭示，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论证，为社会危机的爆发所印证，人们再次领略马克思理论的智慧 and 魅力。只要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

“我们是99%”，“1%对99%宣战”，“4477 = 99%”，这些数字是出现在2011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标语。“占领华尔街”是一连串主要发生在美国的集会活动，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试图占领华尔街。运动以2008年金融海啸为背景，以美国巨大的失业率为导火索，参与抗议者的诉求以反对华尔街无节制的贪婪、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弊病的延续、政府和监管当局的放纵为主。示威者自称属于99%的社会民众，4477代表美军在伊拉克死亡的人数，他们抗议1%的富豪资本家的无止境的“贪婪”，指责政府救助少数金融机构而使多数人陷入经济困境。“华尔街风暴”是金融危机的恶果，是华尔街金融大鳄们的罪责。美国政府为挽救金融危机下的美国经济，不惜财政血本，拆东墙补西墙。从布法罗市赶来华盛顿参加抗议活动的心理咨询师艾莉森·施文奇勒对《环

球时报》记者说：“美国现在不是为人民所统治，而是为大公司所统治。共和党与民主党都代表大公司的利益，在竞选中都接受大公司的政治献金，两党本质上是一样的。”<sup>1</sup>英国约克大学经济学家博维克讲：“‘占领华尔街’活动说明在欧美国家，贫富差距已成为社会癌症，如果坐视不理，癌细胞就会不断扩散。”<sup>2</sup>美国前总统卡特讲：占领华尔街就是要求财富能够更多分配给贫穷家庭。可以说，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正在不断显现，资本剥削的秘密不断被揭露，贫富差距、社会不公、体制不公的事实不断凸显。尽管当前资本主义仍然保持着一定活力，但是其发展遇到了历史的瓶颈，处于发展的“困途”之中。

2011年8月发生在英国伦敦的暴力骚乱事件，严重体现了英国社会的病态发展。《每日电讯报》于8月12日以《我们的病态社会》的大标题作为封面，重点报道这些原本该属于“主流人群”的暴徒，他们中有百万富豪的女儿、正在舞蹈学院学习芭蕾的高材生、受人尊敬的音乐家和歌剧演员，而且他们中的好些人相当年轻。首相卡梅伦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社会中有的某些人群不仅是破裂，而且老实说，是病态！这部分人完全不负责任，他们觉得世界欠他们的”，“看到那些年轻人在街上砸破抢夺，还脸带笑容，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管教不周、缺乏教养、没有道德，这是我们需要改变的”。<sup>3</sup>其中BBC列举了造成暴乱的十大原因：长期依赖社会福利、社会排斥、单亲家庭缺少父亲做榜样、裁减开支、警力薄弱、种族歧视、流行文化助长暴力、消费主义、机会主义和社交网站<sup>4</sup>。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政府执政方式才是直接诱因，值得深刻反省。政治与公共政策

1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10/2090151.html>。

2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10/2090151.html>。

3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1/08-14/3256095.shtml>。

4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1/08-14/3256095\\_2.shtml](http://www.chinanews.com/gj/2011/08-14/3256095_2.shtml)。

学家邓利维说，事件凸显了英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脆弱性。正如西方某些媒体所说，“真正的根源更为隐蔽”。贫富分化和不平等才是骚乱的深层次原因。有媒体说，今天，英国在工资、财富和机遇等方面比任何时候都要不平等。当一个国家财富分配严重不公，两极分化明显，社会管理相应缺失，暴力和骚乱滋生就有了丰厚的土壤。而贫富两极分化等问题是迄今为止各国时常面对而又竭力避免的，难怪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刊文诘问道：“群体骚乱，今天是英国，明天会是美国吗？”

所以，尽管自200年前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资本主义一路风光无限，物质财富极大发展，使芸芸众生摆脱了赤贫，并自我陶醉在自己编织的梦里，殊不知新的时代背景及其内在基本矛盾对其发展道路提出了种种挑战，资本主义国家“挫折沮丧”感与日俱增。随着世界战争、生态污染、金融动荡、医疗问题、贫富不均、环境破坏等问题持续恶化，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机制依然陷入机能停滞，再过几十年，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出路也许看起来就不会像现在看到的那么安全。如世界问题研究专家所言：资本主义病得很重，西方急着为它诊脉，却开不出良方，活不好，死不了，是它目前的状态<sup>1</sup>。

## 二、共同理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沃尔特·惠特曼）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各族人

---

1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4/02/c\\_122921461.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4/02/c_122921461.htm)。



民的共同理想，是在 1986 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决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sup>1</sup>。邓小平指出：“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sup>2</sup> 十八大报告也强调：“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强调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sup>3</sup>

## 1. 沉舟侧畔：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如十八大报告所言：“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极为艰巨的任务”<sup>4</sup>，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170 年的慷慨悲歌、风雨历程与凤凰涅槃，一个甲子的艰辛探寻，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沉舟侧畔与柳暗花明都已验证：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而毛泽东早在 1956 年就正式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新中国建立初，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 27 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 2/3，粮食产量只有 1.13 亿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经断言，共产党解决不了吃饭问题。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且发展成就如雄浑而又

1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1178 页。

2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192 页。

3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 年。

4 同上。

绚丽多彩的画卷，展现在世界面前。20 世纪末期，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低谷之时，中国依然坚定经受住了各种考验，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哈萨克斯坦社会党主席叶尔蒂斯耶夫说，中国用最壮观的经济奇迹“拯救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威望”，挽救了要失事的社会主义大船。一位美国学者也曾讲：“中国令人震惊的经济增长史无前例，中国以独特的方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改变了世界。”古巴教授胡利巴斯克斯说：“从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到现在，60 年过去了，这句话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贴近现实。”他指出：“未来 50 年，更将见证中国的再次崛起。”

2010 年我国 GDP 近 40 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二，比 1978 年的世界第 10 位上升了 8 位，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从 1978 年的 1.8% 上升到 2007 年的近 6%。30 年间 GDP 年均增长 9.8%，较之世界经济平均增速 3.0% 快了 2 倍多。并在世界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中，显示出应对各种风险的强大能力。如邓小平所概括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sup>1</sup> 正因为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办事情，我们才能成功战胜洪灾、非典、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沉着应对 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与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应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及其成就，从根本上“挽救”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航船，并展现了发展的勃勃生机。

## 2.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 19 世纪工人运动实践基础上创立的理论体系。然而马克思主义一旦走出书斋，落脚现实世界，成

---

1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6 页。

为一个民族的理论思想和行动纲领，就必须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的实际问题。把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地运用到中国社会，一定会“水土不服”。正确的做法是结合中国国情，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用马列主义这根“矢”，去射中国革命实践这个“的”，“有的放矢”。毛泽东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sup>1</sup>而中国共产党“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sup>2</sup>，“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sup>3</sup>。现时代我们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共同理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十八大报告指出：“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sup>4</sup>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着的富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与理论，是几代共产党人集体智慧与共同努力的结晶，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被注入新鲜的血液，深刻体现着历史发展进程与辩证思维创新的统一。

1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41页。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3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41页。

4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

恩格斯在 1887 年致弗·开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sup>1</sup> 同样，中国特色理论也在发展和完善之中。1982 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1987 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强调我们应《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92 年，十四大报告的题目就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7 年，十五大报告再次强调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重申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 2007 年的十七大报告再次重申我们应《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12 年 11 月 8 日，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上作《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社会主义从“建设小康”和“建成小康”，中国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不断向前。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作了深度的、明确的诠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尽管每一历史阶段内的表现形态不同，但是其思想宗旨都是一脉相承、层层推进的，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其中，邓小平理论是本源，初步框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体系，回答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62 页。

观是递进理论，重点回答如何解决初步发展起来以后出现的新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总结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新鲜经验，注重探索和回答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上都作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它们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体现了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性体系、阶段性成果和发展性要求的内在统一。”<sup>1</sup>唯有高度重视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与时俱进品质，凸显理论体系对社会和谐的引导功能，整合社会思潮，才能切实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公众认同力与社会认同度，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 3. 社会主义与先进生产力和共同富裕

1992年1月，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一系列具有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的重要讲话，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理论精神，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sup>2</sup>。明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命题。“南方谈话”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凝聚各种力量，打开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开启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进程。

当历史车轮驶进21世纪，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剧变，新的战略机遇和严峻挑战并存。走过80多个春秋的中国共产党，经过深

1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44页。

2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51页。

思熟虑，于2000年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国在新时期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指明了新的方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一脉相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讲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因此，社会主义政党只有反映社会生产力特别是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才能顺应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成为社会的先进部分和领导力量。在这一方向引领下，社会主义的长足发展，改革目标的真正实现，挫折矛盾的根本解决，社会震荡的消除根本在于生产力的发展。

在当前“五位一体”社会总布局中，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但无论怎样改，都应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创新改革观念与改革路径，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模式，把社会主义发展推向新的阶段。

社会共同理想作为一种民族精神，时代信念与爱国情怀的融合，是每一个民族前进的不竭动力。在古老的华夏文明中，我们有儒家、道家等不同的社会共同理想，如孔子的“大同世界”，老子的“小国寡民”，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小康社会等理想。现阶段，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实现共同富裕，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986年9月2日，邓小平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电视节目的采访，当记者迈克·华莱士不解地问道：“你们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个致富光荣的口号，我们西方人感到很惊讶，致富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呢？”邓小平简洁而明确地答道：“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

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sup>1</sup>这段话深刻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党的十八大报告又再次强调了共同富裕的重要性，认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sup>2</sup>

回首历史，反思现在，特别是在全世界经济技术飞速发展、多种文化相互激荡、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如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当前中国发展的实际契合起来，把社会共同理想与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普遍利益结合起来，是我们探寻与实现的目标。而共同富裕理念充分体现着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真实反映着最广大人民的愿望；用共同富裕理念团结人民群众，凝聚社会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步的特性体现。

#### 4. 中国与世界之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着眼于中国的长足发展，并且着眼世界和未来，把握中国社会主义的生存与发展脉搏。面对全球化背景复杂的世界，为更好获得世界认同与影响力，我国把文化发展放在了突出位置，十八大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强国”思路，这意味着不但要开放包容地把世界新文明“请进来”，也要使中国文化“走出去”，要在全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如在多国设立中国文化中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2页。

2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

心，举行中国文化节，建立孔子学院等等，向全球展示华夏文明的丰厚文化底蕴。同时也要积极促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知呈正面良性互动效应，对某些外媒不实或歪曲的言论报道，也要注意及时批驳，化解各类误解和攻击，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世界的影响效力。

邓小平曾讲：“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sup>1</sup>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因此要有着眼大局的宽阔胸襟。但中国也要“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如在面临“社会主义体系的国家动乱”时，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应以不变应万变，以“中国不乱”“中国不倒”等姿态来稳定态势。乱对中国不利，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态势同样不利。同样，江泽民访美期间在得克萨斯州大学城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演讲时强调：“中国越发展、越开放，与世界的联系越紧密，就越需要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sup>2</sup> 而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稳定对于世界局势至关重要。胡锦涛讲“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sup>3</sup> 正如十八大明示的，“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要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0页。

2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10页。

3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世界。”<sup>1</sup>

胡锦涛曾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一个音符无法表达出优美的旋律，一种颜色难以描绘出多彩的画卷。世界是一座丰富多彩的艺术殿堂，各国人民创造的独特文化都是这座殿堂里的瑰宝。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往往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sup>2</sup>可以说，中国要用海纳百川的眼光与胸怀对待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同时也要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基础上，积极努力相洽于世界。

### 三、中国特色“特”在哪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习近平）党的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了明确表述，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

2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31页。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sup>1</sup>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想取得长足发展，保持持久生命力，就应高度重视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关系，在实践中不断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与“特”性。

## 1. 中国特色发展模式与中国“亚细亚”历史道路

经典作家们在论及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历史进程时，认为东、西方曾经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即以古代希腊为代表的“古典的古代”和以古代东方国家为代表的“亚细亚的古代”。侯外庐先生曾作了如下的精辟概括：“如果用恩格斯家族、私产、国家三项作为文明路径的指标，那么，‘古典的古代’就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而亚细亚的古代则是从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就是所谓的社稷。”<sup>2</sup> 具体说来，“‘古典的古代’发展道路是从氏族到私产再到国家，个体私有制冲破了氏族组织，国家代替了氏族。‘亚细亚古代’则是在没有摧毁原始氏族组织的情况下，直接进入奴隶制国家，血缘氏族制同国家的组织形式相结合。”<sup>3</sup> 由此可见，“亚细亚古代”由于从氏族直接过渡到国家，就使整个社会结构有了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遗制。这是理解中国古代生产方式、社会制度、思想文化的关键，尤其是研究中国历史思想形成及其特点的重要社会历史根据。

带有氏族遗制血缘组织的“亚细亚古代”国家，就不可避免地

在统治方式上沿用氏族组织的道德治理方式。儒家引发出一整套天

---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

2 陈谷嘉：《打开中国历史的秘密——侯外庐关于古代中国文明路径说及其价值》，光明日报，2011年7月11日。

3 葛晨虹：《儒家德性思想的血缘根基》，史学集刊，1996年第2期。

人合德、德性天赋，以及仁礼治世的思想，形成了儒家独特的以仁义道德为价值核心的德性思想体系。可以说，孔子创立的学说并不是儒家思想家杜撰的一种政治理想，而是对古代中国氏族（宗法）国家现实存在的一种理论反映，是“亚细亚”的历史道路在思想领域的另一种延展。中国古代以血缘为根基的“亚细亚”历史道路，是理解中国古代氏族国家宗法社会的关键，也是解开古代思想产生及在中国宗法社会有强大生命力之谜的钥匙。

西方“古典的古代”走了不同于东方的历史道路，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国家是在打破血缘氏族体制之后建立的。如雅典在克利斯梯尼改革中，用划分地区的原则取代了氏族制度的血缘关系原则，这一划分彻底打破了氏族社会的血缘组织关系，不同氏族不同血缘的人们被重新组织在地区不同的城邦里。按地区划分城邦是一次改革，在改革背后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相对发达的古希腊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使氏族成员彼此间不再受制于血缘等级的制约，而成为相对平等自由的经济个体。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sup>1</sup>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传统并不意味着静态的过去，文化传统不仅肇始于过去，而且融合于现在并预示着未来的趋势和存在。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个首要特色，即中国既有的历史道路和传统文化。

---

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9页。

## 2. 社会主义体制优势和集体主义价值优势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以下基本要求，并使之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信念，即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sup>1</sup>八个必须深刻诠释与集中凸显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体制优势和中国特色。邓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sup>2</sup>江泽民同志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不断创造伟大的业绩。”<sup>3</sup>胡锦涛同志强调：“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国家的显著政治优势。”<sup>4</sup>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确保民族团结，凝聚国人力量，举全国之力确保思想统一，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公有制度与共同富裕，力求实现成果共享。十八大在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分别强调应该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一系列的核心价值理念，正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有的体制优势与价值优势的全面提炼。

---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页。

3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8页。

4 胡锦涛：《在庆祝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页。

社会主义体制优势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坚持集体主义价值原则。东方文化素有群体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的集体主义也包含了浓厚的传统文化精髓。中国传统的仁爱要求人们相亲相爱，从爱亲出发，发散到爱一切人，反过来，又在对一切人的爱中，投射了“中国式”的亲情之爱。

集体主义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生活中必须具有的道德责任的彼此承诺，更是社会主义价值原则与和谐社会组织机体必然要求的反映。这种价值原则不仅体现在“共同富裕”的制度和大致方针取向中，也具现在抗震救灾、奥运等举国活动中。当重大灾害来临，中国速举全国之力投入救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种举国动员、组织、调度的能力，以及强大的团结互助精神，令每一个中国人都体会到国家和社会整体的力量，也令世界惊叹。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在集体主义理念优势支撑下，往往被更充分地发挥出来。

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奉行个人主义价值原则。如美国，其生产力居世界前列，人均国民收入高达 4.6 万美元，不仅能保证温饱，还足以令民众过上富足的生活。但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心态，却影响美国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公平状态。收入不均程度已达历史最高点，但富人们却宣称自己不需要对其他国民负责，他们不愿扶助贫困阶层，而且尽可能地为减税政策辩护。所有人都在抱怨，所有人都将社会长远利益和推己及人的理念抛诸脑后。2010 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接受采访时说了一些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当今世界有两种思想在交锋：第一种就是重视个人的人权思想，也就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面对笛卡尔，中国的意识形态更加主张境遇主义。个人已融入宇宙空间、家庭，而非我们从

希腊人那里发现的侵害他人权利的思想。”<sup>1</sup> 法国电力集团执行副总裁马识路欣赏中国的理念，他说：“植根于一神论的西方在建构一种有关人与社会关系的个人主义观念时，中国却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发展了社群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理念。”<sup>2</sup> 这种集体主义、整体主义的理念、在非典、抗震救灾，奥运会，特别是关系到民生建设的事件中得到真实体现，从而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 3. 社会主义与以人为本的宗旨特色

十八大报告强调：“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sup>3</sup> 实现人民根本利益，发挥人民集体力量和鼓励人民政治参与是实现民主化的不可忽视力量，是实现人民福祉的必要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优势，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要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坚持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好保障人民权益，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sup>4</sup>。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人民”两个字出现了145次，“人民利益”“人民信任”“人民福祉”“人民幸福”“人民满意”“人民主体”“人民民主”“人民精神”“人民权益”“人

---

1 [http://opinion.m4.cn/1160742\\_4.shtml](http://opinion.m4.cn/1160742_4.shtml)。

2 <http://www.12371.gov.cn/html/djbl/llqy/2012/04/05/135935162448.html>。

3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

4 同上。

民共享”“人民主人翁”“人民创造性”“人民安居乐业”“人民当家作主”“人民首创精神”“人民平等参与”“人民监督权力”“顺应人民意愿”“增加居民收入”等一系列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无不体现民本理念与执政宗旨，体现马克思政党所特有的人人平等、消灭剥削、人民作主的宗旨。

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足发展，不仅要树立好坚定的以民为本信念，更重要的是加强执行力，加强执政为民的贯彻落实。因为在“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sup>1</sup>。当然，具体落实和执行起来还有不少问题。亨廷顿在比较发展中国家与欧洲和北美国家现代化之间的差别时指出：“欧洲和北美的现代化进程延续了几个世纪，大体来说，每次只解决一个问题或对付一种危机。但是，除了西方，世界其他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福利等等，不是依次而至，而是同时发生。”现在我们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拐点上，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后的攻坚时期与社会矛盾激发的凸显时期。相随而来的，比如贫富差距、失信、贪婪、不公、道德失落，以及民众的安全感、幸福感与认同感等，不是能够仅通过 GDP 来解决的。面临现实发展瓶颈与重要战略机遇期，十八大报告对发展目标还是做了具体规划，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扩大人民民主，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在具体规划和措施保障中更体现了执政党为民服务的政治决心和战略勇气。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 年。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执政为民理念与执政为民行为的统一，国家在权力制约与监督、加强反腐力度、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社会管理机制等方面做了专项论述与重点部署。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必须增强宗旨意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sup>1</sup>

####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特点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稳健发展。如果说以前我们的发展更多地依靠人口、面积和开放优势，那么今天，身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我们更多是利用制度、道路、人民和理论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优势与特色，最重要的是通过实践来检验和总结。

##### （1）“摸着石头过河”与渐进改革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之一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模式”正是采取这种探索渐进方式，稳步推进改革。新加坡国立大学

---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 年。



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一座房子不管盖得好与坏,都有自己的模式,模式不一定意味着完美,模式是可以不断更新与演化的。”可以说,“中国模式”是“以一种循序渐进、摸索和积累的方式,从易到难进行改革,并吸取中外一切优秀的思想和经验”的过程<sup>1</sup>。英国学者罗德·黑格、马丁·哈罗普在其撰写的国际流行政治学教科书《比较政府与政治导论》中说:“人们广泛相信,中国应当能够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以自己的方式实现发展,而不必移植西方的模式。”

从1978年至201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9.8%,实现了30年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奇迹”,其背后的原因与中国实行渐进改革的发展方式密切相关,且“摸着石头过河”的循序渐进方式可以大大减少改革的风险与阻力,并可以逐渐调动人民群众的智慧 and 创造力,快速、稳妥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

## (2) 社会主义的民本特色与群众优势

我们讲“思想离开了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而这个“利益”归根结底一定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sup>2</sup>,任何理论的生命力都来自于其对人民利益的关注如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本质特征,就在于其彰显民本特色与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党的十八大报告因此也强调,“顺应人民共同愿望”,维护人民共同利益,发挥广大群众优势,党和国家目前必须要有这种自觉意识。

1 张维为:《中国触动全球——邓小平资深翻译走访四国之后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8年。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9页。

民本思想古已有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在汲取传统滋养的基础上，奠定了民本的基本路线。早在商周时代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安邦治国，必得民心，凡能以此为戒者必兴，否则必亡”之理。孟子更是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与“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的道理。荀子也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为君，以为民也”，“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义理。顾炎武也指出“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孙中山更是把以民为本作为一以贯之的思想，其所创立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在传统民本基础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以人为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等思想，正是对以民为本的升华。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讲话说：“我们要适应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新特点新要求，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始终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要从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sup>1</sup>

### （3）海纳百川的姿态与“和而不同”的精神

“中国模式”在坚持自我发展特色的同时，并没有排挤或抵触外来社会模式，而是审时度势，在多元价值取向中采取兼容并蓄方式，不断借鉴、吸收和利用他国文明的优秀成果，为自我完善与提升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和新鲜活力，并以开放、奋进、自信与包容的姿态和精神前行，以促进世界各国对中国模式与发展道路的认知和肯定。

---

1 [http://news.xinhuanet.com/2012-11/19/c\\_123967017.htm](http://news.xinhuanet.com/2012-11/19/c_123967017.htm)。

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断言，“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人类的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sup>1</sup>

#### （4）“天下太平、协和万邦”的宏伟气度

“中国模式”立足于中国实际，又着眼于世界和平发展。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看，很多大国崛起后都会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如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血泪辛酸或战争灾难。中国虽在历史上饱受侵略之苦，但是没有走掠夺他国、对外扩张的道路，一直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之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太平、协和万邦”的传统思想更是强化了“中国模式”对世界和平的向往和追求。温家宝在一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上灾难太深重了。这就培育了它忧患的意识、生存意志和追求和平与发展的愿望。我们这个国家太大，问题太多、太复杂，这就要求我们这个民族，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坚定信心，永远奋斗！

综上所述，我们不回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的缺陷与不足，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念、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寻找契机，为未来的中国发展积蓄力量。如十八大报告所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

1 [英]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94页。

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sup>1</sup>

## 四、“中国模式”的魅力

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经济实现年均增幅高达 9.8% 的发展速度，GDP 跃升世界第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率先回暖，创造了“中国奇迹”。系列成就使“中国模式”与“中国之谜”讨论在世界范围广泛流传，中国受到了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与重视，更有西方舆论认为“全球重心已经向中国转移”。

### 1. “中国模式”触动全球神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要改变自己多年来贫穷落后的状态，重新调整改革方案与发展路径，还要奋力追赶世界。但中国人自强不息，不畏艰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日内瓦现代亚洲研究中心一位资深研究员于 2006 年 11 月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题为《中国模式的魅力》文章说，仅仅在 30 年前，中国和马拉维一样贫穷，而今天的马拉维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扩大了九倍。有的外国人还说，中国就在西方国家午餐后小酣的瞬间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顺便让一半中国人摆脱了贫困。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造就了 20 世纪最壮观的经济奇迹”，“显示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扭转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威望”，“挽救了要失事的社会主义大船”。<sup>2</sup>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 年。

2 肖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挫折”与“新局面”》，当代世界，1999 年第 11 期。

特别是近些年来，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汶川地震后国家凝聚力与团结力的深刻显现，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风景这边独好”的态势，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光辉成就的展示，都深刻证实了中国发展道路的优越性。约瑟夫·奈对此也曾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在此发展情势与国际语境之下，人们都在思考和总结，为什么中国能够在短时间内卸下沉重的历史包袱？如何实现长达 30 年的 9.8% 年均增率的“经济奇迹”？如何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崛起，重回世界大国行列？其背后的推力与缘由何在？关于“中国模式”问题以及“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关系问题成为了世界焦点话题。

## 2. “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尽管目前国内学者对“中国模式”概念的理解还存在分歧，但“中国模式”是在适应国际发展背景与全球语境下的客观表述，与“苏联模式”“印度模式”“拉美模式”“欧美模式”和“美国模式”等相区分而共同存在，本书对“中国模式”不做概念本身的研究，而是在全球语境下探求其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实质而言，“中国模式”作为新的表达路数而逐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另一种称谓和诠释，成为国外学者对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社会发生迅速变革的深刻解读。“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联系密切，具有相同的发展阶段与形成过程，都源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模式的内在实践，面临共同的历史境遇和挑战，具有相同的民族生长谱系和时代发展特色。“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来自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坚守与遵循，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谈论“中国模式”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执政党认识到，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必须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此意识下，中国人坚持自力更生、勇于创新的民族与时代精神，在实践中摸索出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体现世界文明发展方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中国模式”正是建立在此根基之上的成果展现。

### 3. “拉美模式”给我们的警示

“拉美模式”是指拉美国家在保持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患有“依附发展综合征”、贫富差距拉大、各种社会矛盾逐渐凸显和激化、民族精神严重扭曲丧失的社会发展模式。相当多的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几乎陷入停滞，比如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发生货币危机，2001年阿根廷发生债务危机，有学者将拉美改革造成的后果称为“拉美化陷阱”。

“拉美化陷阱”是指“拉美模式”的“依附发展综合征”给政府带来了沉重的压力，逐步导致外债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严重，金融潜伏危机，甚至发生动荡的状况。以阿根廷为例，阿根廷曾一度以拉美新自由主义的“成功样板”为典型而长期充斥于西方报端，自从1999年开始，阿根廷经济不断暴露出衰败的迹象，并出现种种败绩，几经努力仍然难挽狂澜于既倒，国家危机发生以后，导致多年的经济成就毁于一旦，使阿根廷的人均年收入从8000

美元跌到 2000 美元左右。拉美新自由主义“成功样板”的坍塌不仅使阿根廷人震惊，同样也让整个拉美国家为之深刻反思，由此“拉美化陷阱”作为新的发展现象备受关注。以此为警示，“中国模式”在其发展过程中，应以“拉美模式”为警示，坚持在自己国情基础上走自己的特色道路。

#### 4. “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指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根据 20 世纪 80 年代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提出来并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是“华盛顿共识”的“经典之作”。20 世纪末以来，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一直呼吁走出“华盛顿共识”并“超越华盛顿共识”。而国际学术界对“华盛顿共识”理论和政策的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后华盛顿共识”“欧洲价值观”和“中国的渐进转型观”，而对“渐进转轨”持肯定看法的占主流，中国等转型国家二十多年的转型成就，是渐进转型所带来的结果和典范。2004 年 5 月，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清华大学教授、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莫（Joshua Cooper Ramo）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题为《中国已发展自己的经济共识》的论文，并正式提出了“中国模式”的概念，以此为标志，“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普遍关注和热议，并吸引了各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们相继从不同的研究视角进一步解读中国模式的特色所在，探寻发展之谜。

随着“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超越和取代“华盛顿共识”，

实际上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全新解释与肯定，切实体现了西方人士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关注和认可。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曾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的中华民族。”<sup>1</sup>而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集会巴黎，提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从孔子那里吸取智慧。中国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与优秀成果值得全人类借鉴，现阶段，在全球经济萎靡不振的情形下，中国在全球率先战胜国际金融危机而实现经济回升向好，一枝独秀的局面，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与顽强活力。并且，这一席卷全世界的全球金融危机也将西方国家长期视为执政经典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以致命性打击，不管是新自由主义也好，个人主义理论也罢，还是其他资本主义理论派别，在金融危机面前都显得不堪一击。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富有生命力。马克思的《资本论》得到畅销，其中对世界危机的预言得到一一验证，而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成功交出圆满答卷。尽管2009年成为新世纪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而促使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最为艰难的一年，中国始终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发展经济的首要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果断实施有力政策，保持经济平稳发展态势。

## 5.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模式”

历史已向世人表明，任何历史盲从都不会找到新的出路与跨越，不同国家都会基于各自不同的历史境遇与发展环境而探索适合本国

---

1 [日]山本新，[英]汤因比：《论中国传统文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5页。



的模式，不可能有统一的发展样式。当前及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发展模式有“苏联模式”“印度模式”“拉美模式”“欧美模式”与“美国模式”等。而“中国模式”是在中国的民生建设进程中，从特殊的国情民情出发，独立地探索出的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与模式。据《人民论坛》网上调查显示：74.55%的受调查者认可“中国模式”，其中60.25%的受调查者认为“中国模式”还是在探索中的一种发展模式<sup>1</sup>。我们在探寻自身发展模式的同时，深刻比较不同国家的发展模式，可以加深对“中国模式”的理性认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曾照抄照搬过“苏联模式”，历史证明其模式无法契合中国的特殊实际，只能尽快摆脱其束缚，自寻出路，而“苏联模式”也最终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走上“全盘西化”的道路，但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时却逐步崛起，比如从1992年1月1日起，俄罗斯全面铺开以休克疗法为模式的改革，而改革的失败使俄罗斯GDP几乎减少了一半，1989年是我国的2倍强，而10年后仅为我国GDP的1/3，历史充分证明苏联模式的倒退；“印度模式”同样选择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就目前来看，印度模式的优势并没有显现，该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饥饿国家”“文盲国家”“疾病国家”和“亚洲最大的贪腐国家”的称号，并且其中蕴藏着严重的“阴暗面”，国家整体呈现一幅四分五裂的画面：在新德里和孟买活跃着现代繁荣与荣盛的同时，田野中人们以3000年不变的姿势赶着耕牛犁地，可以说一边是代表21世纪的现代高科技，而另一边又恍若停留在中世纪的贫困。正如财政部部长亚什万特·辛哈所言，印度存在三种经济。由现代信息技术所代表的“信息经济”、泥浆和砖瓦为代表的“旧经济”和以老牛车为代表的更陈旧的经济。“拉美化陷阱”

1 人民论坛《千人问卷》调查组：74.55%民众认可“中国模式”，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8年12月25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0/49152/8580443.html>。

更是“拉美模式”下遇到的发展瓶颈。与相对成熟的“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比较，“中国模式”还处在学习与探索过程中，深刻体现“中国模式”的成长性与学习性，但“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正因其成熟的发展背景与辉煌的历史成就而显得颐指气使与飞扬跋扈，并没有起到示范作用。“中国模式”是基于中国特殊的发展实际而进行的初步探索与尝试，不同于世界其他发展模式，而深刻比较不同地区或国家的发展模式，可以加深对“中国模式”的探索与认知，体现“中国模式”更强劲的比较优势与发展后劲。

1989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并在其著作《历史的终结》一书中写道：“人类在接近新千年的终点时，威权主义政治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充分显出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败相”，“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乃是地球上不同地区和文化共同拥有的唯一一致的愿望”。<sup>1</sup>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就如福山所描述的那样真的终结了吗？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真的是历史的最终形态吗？事实上，资本主义展现和带来的不过是“半张面孔”，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发展下的西方社会所面临的贫富两极分化、南北差距的拉大，无不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公平公正的缺失在这一体制下都无法解决。

实质而言，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贯穿始终的是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特别是在价值体系层面，认为只有西方的意识形态是普遍有效的，而非西方的意识形态都是狭隘片面的。但是当今最为有

---

1 转引自赵琰：《历史的终结还是超越的起点？——从福山〈历史的终结〉谈起》，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力的挑战和证明莫过于金融危机对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也就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内在矛盾和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真相，也证实了“历史终结论”的理论根基无法成立。“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生机制，驳斥了福山的‘内在矛盾’消失论；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两极分化，驳斥了福山的资本主义平等观；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的金融垄断掠夺本质，驳斥了福山的自由民主‘完美’论；危机凸显了世界人民对于资本主义价值理念的怀疑，驳斥了福山过于乐观的‘认同’论。”<sup>1</sup>

## 6. 中国模式宣告“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依此说法，中国除非采用西方式的经济与民主形式，否则不可能长远发展，而中国的发展道路使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不攻自破。“9·11”之后，福山的老师、右翼知识分子代表亨廷顿被问及：你是不是相信福山的结论“西方文明将传布到全世界”是正确的？他断然回答道：我当然宁愿相信如此，但这不会发生。亨廷顿的理由是：虽然美国仍将是唯一最强大的国家，西方仍将是首要的文明，但世界其他强大的本土力量正在诉求地方传统、价值和习俗，它们拒绝西方的傲慢和在在他看来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东西；人类的本性并没有发生变化，所有物质福利方面的改善都没有改变文明之间的差异。<sup>2</sup> 弗朗西斯·福山在新书《出乎意料》中预测未来世界可能发生的七大“战略意外”中有一项是：“人们将许多不平等现象归咎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全世界对这些不平等现象的不满，可能会将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模式，从而

1 刘仁营，袁白莲：《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红旗文稿，2009年第18期。

2 同上。

结束美国的霸权地位。”他在 2009 年 1 月初接受日本《中央公论》的记者专访时，不得不承认“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不是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的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世界需要在多元基础上实现新的融合”。<sup>1</sup>福山的论述是对“历史终结论”的自我否定，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重新认识与赞赏肯定，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仅不会灭亡，反而具有更旺盛的生命力与活力，中国独有的发展范式为历经磨难的社会主义注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与新鲜血液，有效改变了世界范围内“资强社弱”的压倒态势，而日益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中国模式”深深触动了全球的神经系统，撼动世界，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更使弗朗西斯·福山深受触动。可以说“中国模式”根本上超越了所谓“历史终结论”。

## 7. “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

“中国模式”发展的世界意义一直受国际关注，西方诸多媒体争先报道中国的发展，美国《新闻周刊》管中国叫“亚洲的庞然大物”，法国《回声报》副主编伊兹拉莱维奇发表了一部名为《当中国改变世界的时候》的著作，立即上了畅销书排名榜，“德国之声”电台在预测 2050 年世界经济形势时将中国形容为“旗舰”，拉丁美洲第一大周刊的巴西《请看》杂志则在一篇长达 78 页的文章中称中国为“正在上升中的帝国”。而在形容中国的众多新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时代》周刊的“一个新王朝的开始”。尽管夸张迥异的表述方式并不贴切，但是折射出中国发展给世界国家带来的震动和影响。汤因比曾提到：中国在“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

---

1 徐崇温：《国外近期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动向》，红旗文稿，2010 年第 17 期。

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sup>1</sup>。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国情备忘录》，对“中国之谜”也做了深刻分析和总结。

伴随“中国模式”的日趋成熟，“中国模式”世界意义得到凸显，在很多地区产生了示范效应。2008年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秘鲁会议指出：“‘中国模式’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榜样”<sup>2</sup>，无疑是对“中国模式”蕴含世界意义的充分肯定。约瑟夫曾在2007年对媒体说：

“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sup>3</sup>据世界银行统计，过去25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约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可以说，“中国模式”的发展完善，不仅使中国自身走上稳定发展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中国模式”的示范效应也从侧面深刻启发后发展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一定要坚持自己国家的发展特色，决不能完全迷信或盲从于他国模式，否则容易遗失原有发展特色而走弯路。

“中国模式”已展现特有魅力，但我们还应理性地认识到，“中

1 [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295页。

2 李玉东：《“中国模式”正在当今世界引起广泛关注》，光明日报，2009年第8期。

3 胡伟：《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的经验——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国模式”或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尚不完善，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如《国情备忘录》所总结的：这是一个越来越融入世界大潮，却又相伴着许多难题的中国；这是一个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但又始终顽强地向上生长的中国；这是个全社会深深地被各种欲望搅动，但同时又发自内心地渴望和谐、正义与幸福的中国。

## 第四章

### 民族精神与 时代精神是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

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

——陆 游

---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马克思

---

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摘自十八大报告



中华民族精神以爱国主义传统为核心,讲求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和自强不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与以爱国主义传统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

## 一、中华民族与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积淀而成的,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风貌和气质品质的凝结。

### 1. 中华民族的“名”与“实”

“中华民族”这个称谓不是自古就有的,它的出现仅百余年历史。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首次提及“中华民族”之称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1912年,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首倡“五族共和”:“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强调民族之统一。是年,黄兴等人成立了“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不久便更名为“中华民族大同会”。“中华民族”这个响亮的名称从此流传开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占中国东北,扶植傀儡政权,开始全面侵华。正是在外族入侵、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中国各族人民共御外敌、团结救国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对不分你我的“中华民族”

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在当时，有一组脍炙人口的《流亡三部曲》曾被万众传唱，里面的歌词这样写道：“说什么你的、我的，分什么穷的、富的。敌人杀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看！火光又起了，不知多少财产毁灭！听！炮声又响了，不知多少生命死亡！哪还有个人幸福？哪还有个人安康？谁使我们流浪？谁使我们逃亡？谁使我们国土沦丧？谁要我们民族灭亡？来，来，来！来，来，来！我们休为自己打算，我们休顾个人逃亡。我们应当团结一致，走上战场誓死抵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

所以，作为一个“多元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觉意识是在近代逐步形成的。“非我族类”的异族入侵导致并加速了这种民族意识的形成过程，由“外力”迫使中华民族产生了“内向”的民族凝聚力和高度的民族认同感。也正是在这种“外力”的作用下，中华民族开始从“他族文明”的优势上反观自身的不足和缺陷，在民族内部不断追求维新与革命，先是维器物、“长技”之新，尔后则是革制度、文化之命。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中华民族”是先有其名，后存其实呢？当然不是。在历史上，没有哪个族类是先有了名称，然后才有民族实体。就中华民族而言，倘若没有千百年来各民族间深度的交流与融合，即便是在民族的危难之际，仅仅靠“中华民族”这个称谓，是不足以把当时的四万万同胞聚合在一起的。对此，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sup>1</sup>

---

1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问题上，现代的民族学研究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作为人类四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绵至今，首先得益于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古埃及、古印度和古希腊的地理条件不同，中国的北部是人烟稀少的荒漠和戈壁，东南临海，西部靠山，中部才是广阔的、适于耕作的平原。在这样一个有着天然屏障的地理环境之中，古代中国基本上没有遭遇过外族的侵略。历史上，除了月氏、乌孙、匈奴、突厥等民族的一部分因战事不得已迁居他国之外，绝大多数民族都长期共同生活在这片相对封闭的土地上，自成一体。事实上，若不是近代航海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是打不过来的。

## 2. 政治一统与文化一统

这类自然的条件不仅给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一个客观的环境，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华民族自成特色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政权形式。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就认为，中国的团结也“出自于自然力量的驱使”。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黄仁宇通过对土壤、风向和雨量等地区自然条件的分析，得出结论说：“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职体系。而纷扰的战国能为秦所统一，无疑，它们也是幕后的重要功臣。”<sup>1</sup> 简言之，在中华大地上，面对强大的自然力量，古代的民众只有形成高度团结的社会组织形式才能生存下去，而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正是保障这种社会组织形

---

1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第21页。

式牢靠的政权形式。这里所说的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其实也就是所谓的政治大一统。

一般认为，古代的“大一统”观念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政权政治之大一统，二是思想文化之大一统。前者是“大一统”观念在政治体制上的反映，即政治大一统。后者则是“大一统”观念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体现，即文化大一统。虽然据可考的文献资料记载，“大一统”观念早在春秋时代就已出现<sup>1</sup>，但政治大一统和文化大一统由观念到现实的确立则发生在秦汉时期。秦灭六国统一中华而定中央集权之政治大一统。汉随秦制，在政治大一统的基础上又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文化大一统。从此以后，政治大一统和文化大一统相辅相成，互相维系，逐渐形成了中华文明自成特色的政教合一模式。

历史地看，文化大一统是为政治大一统服务的，政治大一统发生在先，文化大一统紧随其后。但是，文化大一统一旦落定，它对政治大一统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涉及“统一”的诸多问题上，文化大一统甚至会发挥比政治大一统更为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即便是在政治分裂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内的统一意识却从未间断过。不仅如此，它反过来还推动着政治上的统一。比如三国时期，魏、蜀、吴虽然都是割据政权，但都自称是汉室正统，要统一中国。南北朝时，北朝史官把南朝称作“岛夷”，南朝史官则称北朝是“索虏”。它们都认定自家政权才是中华之正宗，

---

1 《春秋公羊传》：“元年春王正月。元年何者？君之始年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而对方只能是被统治和驯服的对象。虽然“岛夷”“索虏”这些字眼都是蔑称，但却反映出了内在的统一意识。

尤其是这里所说的正统或正宗，主要是指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正统或正宗。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家眼中，王权的政治合法性体现在思想文化之宗统中。与西方世界强调“君权神授”的政教合一观念不同，在古代中国，只有继承中华文化之大统的政权，才可师出有名，才能定邦有理。所以，政教合一中的“教”在中国古代政治社会中的含义并不是指西方意义上的宗教，而是指思想文化教化之“教”，目的在于“传”思想文化之宗统。这个宗统不是别的，正是自汉代以来被大多数王权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或文化，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也称之为“儒教”。

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中的宗统地位及其对政治大一统的影响毋庸多言。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历代帝王尊儒崇孔的举动就可见一斑。不仅是汉族政权，少数民族当政中国的时候也概莫能外。以清朝政府为例，据学者研究统计：“从清代春秋祭拜文庙中，我们看到在满洲贵族中，皇帝直接参拜者多达 34 人次，亲、郡王、皇子参拜者 78 人次，满洲大学士品级参拜者 156 人次，尚书品级参拜者 18 人次，共计 286 人次……从满、汉参拜总比例看，满族人在 504 人次中占 57%，汉族占 43%。”<sup>1</sup>

可以说，正是在这种“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下，团结统一的思想意识不断深入人心。千百年来，经过无数次文化一统和政治一统的洗礼与积淀，团结统一的思想观念逐渐凝结成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股精神气质。正是这种精神气质，推动着历代中国各民族间的交

1 腾绍箴：《论清代满洲贵族认同中原文化之管见》，满学论丛，2011 年第 1 辑。

流与融合；正是这种精神气质，鼓舞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之际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事实上，这种精神气质已然成为我们民族一种矢志不渝的民族精神。

### 3. “和”字里面有乾坤

如果说团结或统一的意思可以通俗地理解为把不同的人或群体聚合在一起，那么，这些不同的人或群体为什么要聚合在一起？如果仔细推敲“团”或“统”这两个概念背后所隐藏的含义，不难发现，它们都有“分”的意思在里面。换句话说，正因为有“分”的格局，才会有“团”或“统”的必要。有“分”必有“和”，“和”才是“团”或“统”的意义所在。虽然“和”里面的确也有“团”或“统”的意思，但“和”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里还有比后两者更为深刻的含义。

在早期的甲骨文中，“和”字就已出现，写作“龠”（音“禾”）。左边是个“龠”字（音“越”），指古代的一种乐器，也叫“编管”，笙的前身。右边是个“禾”字（音“禾”），意为“龠”这种乐器发出的“禾禾”声。在古代，“龠”在奏乐时的功用是“和众声”，即协调众音，它发出的“禾禾”声，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和弦音。所以，“和”字在出现时就有配合、协调的含义。这与《说文解字》中把“和”释为“相应”是一致的。

在音律中，“和”的作用是柔和各种声音以体现旋律之美，因此，“和”不是要把所有的声音变成同一个声音。也就是说，“和”不等于“同”，是“和而不同”。所以，“和”不仅讲求多样性的统一，更讲求统一的内在秩序。换句话说，“和”的作用是协调各种声音，目的却是声音组合的内在秩序：旋律。

其实,“和”在音律中体现的哲理同样适用于人伦关系。《论语》中就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在这里,为“和”而“和”也不是“和”,是否符合体现一定社会秩序的“礼”才是“和”的标准与目的。所以,“和”音意在旋律,“和”人伦意在“复礼”,继而“和”天下则意在“太平”。《中庸》里讲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从根本上说也是这个道理。

在中国,无论是在国家、民族层面的政治生活中,还是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和”的观念对社会的影响无处不在,历来如是。历史上,虽然国家统一往往需要借助战争,但对中国人来说,打仗从来就不是目的,天下太平、国泰民安才是最终归宿。所以,讲求“协和万邦”的中国人,历来是爱好和平的。对此,英国哲学家罗素先生就曾说过:“他们(指中国人——引者注)统治别人的欲望明显要比白人弱得多。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尽管中国发生过很多次战争,中国人天生的面貌仍是非常和平的。”<sup>1</sup>

自秦汉以后,中国基本上是统一的国家,民族融合是历史的大趋势,政治分裂和民族斗争只是暂时现象。如果细心翻看中国历代疆域图,或许不难发现,每经历一次国家分裂或民族冲突,统一后的政治版图就会比前期扩大许多。从这个意义上讲,分裂或斗争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只是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一个方面。往往是斗争终止的时候,融合也就完成了。对此,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在当时,作为敌对的民族和国家,经常残酷地进行过斗争,今天看来,

1 何兆武、柳卸林主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6页。

却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sup>1</sup> 那些如今只有在历史教科书中才听说过的民族，像匈奴、鲜卑、契丹、突厥、柔然等，它们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消亡，它们民族的一部分其实已经融入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中去了。所以，费孝通先生说：“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发生混合、交杂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说是‘纯种’。”<sup>2</sup>

话说回来，“和”的观念在国家、民族政治生活层面上发挥作用的那个内在秩序，其实就是政治大一统中的集权制和文化大一统内的儒家礼制。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不再赘述。此外，“和”的观念对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影响也十分深远，只要想想那些耳熟能详的关于“和”的成语，如一团和气、和睦相处、心平气和、和气生财、民和年丰等，便可知一二。限于篇幅，这里也就不细说了。总而言之，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不到非不得已，不会与人争斗。千百年来，“和”的观念已然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处世智慧之一，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精神气质和高贵品质。所以，虽然中国人会在“和气”中讲求与人宽容、与人为善，但却和而有度，和而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讲，“爱好和平”在中国人这里不仅是一种人生智慧的结晶，也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怀，更是一种大爱无疆的民族精神。

#### 4. 勤而能勇者，自强不息

如果说“团结统一”“爱好和平”都是用来协调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的价值取向，那么，“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则是体现在个体身上的民族品格和精神气质。

1 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2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很早以前，“勤”和“勇”便是古人自励笃行的道德品质。《尚书·蔡仲之命》最早提及“克勤无怠，以垂宪乃后”，告诫王者要“勤政”，使法令得到垂范。《左传》中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认为百姓只要尽力劳作，就不会缺衣少食。《诗·召南·江有汜》的序中又说“勤而无怨”，后人把这里的“勤”则解释成“心企望之”。不难看出，“勤”的本意就是费力地“做”，政治家要费力地“做”政务，才可能上行下效，老百姓要费力地“做”劳务，才可能丰衣足食。如果说在刚开始的时候，“只要勤于某事，就会带来怎样的好处”这些道理是明君先哲用来劝诫后世的，是对后人依之行效的外在要求，那么，一旦人们懂得并认同这个道理，自然也就会自觉地、用心地卖力去“做”。这样一来，“勤”这个外在要求就会逐渐转变成“心企望之”的内在要求，变成自我勉励、自觉笃行的“德”。所以，“勤”这种“德”就不仅是指尽力，还有“用心”的意思在里面，即尽心尽力地“做”。一旦达到这个程度，即便结果不尽如人意，也无须怨悔。尽到努力，顺其自然，也就会“勤而无怨”。

“勤”是如此，“勇”亦如此。“勤”和“勇”中都有个“力”字，都表示要花费气力。但是，“勇”和“勤”不同，这个“力”不使在对内的方向上，也就是说，它不是向着“勤己”说的，而是要求人在与外界对抗的过程中表现出果敢大胆的气力，即勇气、勇敢。不过，与“勤”一样的是，真正的“勇”也不仅仅是指向外使力，不然，那就是匹夫之勇，是“莽”。“勇”也讲求“有心”，这个心在“勇”那里就是“胆”，一种来自于“德”的“胆”。《论语》里说“仁者必有勇”，就是这个意思。一个有德之人，必然有孟子所说的那种“浩然正气”，这种正气就是“勇”的底气，就是无所畏惧的“胆”。那么，如果说“勇”是一种体现“德”的“胆”，这个“德”是从哪里来的呢？《荀

子》说：“勇果而亡礼，君子所憎恶也。”可见，这个“德”是古代的“礼”所规定的“德”，所以，若不是依礼而勇，就不是真“勇”。现在看来，尽管我们不需要把“勇”完全建立在古代礼制的基础上，但古人对有德而勇的理解的确是鞭辟入里的，值得效行。

古人历来看重“勤劳”和“勇敢”这两种美德，或许并非偶然。我们通常说“业精于勤”，“勤于业”不但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还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艺，甚至起到“勤能补拙”的效果。所以我们说，“勤”是一种可以不断提升内在能力的“德”。相应地，“勇”也是一种可以不断壮实内在、磨砺意志的“德”，只不过，它是在个体与外界的抗争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德”。不难看出，无论是内向地勤而精进，还是外向地勇而果敢，勤而能勇者，会不断地追求卓越，使自己变得强大，这就是“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语出《周易大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说的是一种刚健有为、奋发向上、不断进取、百折不挠的精神气质和意志品质。自强不息就是不断地追求自我卓越和自我完善，它不是强调某一方面的卓越和完善，而是要求自我在体魄、学识、技能、道德上全面地完善。更为可贵的是，中国人讲自强不息，不会恃强凌弱，目的不是优胜劣汰。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自强不息力求使人在比较中相互激励，而不是让人在竞争中互相淘汰。这就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厚德精神，它就像脉动生命的血液一样，无时无刻、永不停歇地灌注在我们的民族性格之中。

总之，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是独一无二的。在我们所承继的民族精神里，既有深邃的人生智慧，也有高尚的道德情怀。它们不是生硬的杂合，而是相得益彰，是彻底的融合。

## 二、位卑未敢忘忧国：民族精神的不变语境

在中国人的民族精神里，始终激荡着一种民族情怀，这就是爱国主义。

### 1. 爱国主义的两个概念

《史记》中有个“渑池之会”的故事，赵惠文王应秦王之约在渑池相会。席间，秦王百般刁难，试图羞辱赵惠文王。幸而有机智果敢的蔺相如挺身而出，帮助赵惠文王破解重重困难，最终全身而退。其实，在“渑池之会”这个大故事里还套着一个发生在“会前”的小故事，或许鲜为人知。当时，秦王要约赵惠文王的同时已兵临赵国，“渑池之会”其实是个鸿门宴。若不是在廉颇和蔺相如的鼓动与谋划下，赵惠文王原本是不想赴约的。当廉颇把赵惠文王和蔺相如送至边境即将分别的时候，《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王许之。遂与秦王会渑池。”在这个小故事里，蔺相如随赵惠文王涉险赴约，勇气可嘉，自不待说。廉颇提到要“立太子为王”，是臣在替君考虑身后之事，此等直言直语，感人肺腑。而赵王不但不怒，反而欣然“许之”，也实乃大度。君臣三人在临别之际，考虑的全然不是个人安危，而是赵国的江山社稷，这种以大局为重的爱国情怀的确感人至深。

自古以来，这种爱国精神不仅王侯将相有之，寒素之士也有之。宋朝诗人陆游被免官后曾患病多日，痊愈后写下《病起书怀》两首，其中有句“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的话传颂至今。诗人感慨自己一生屡遭挫折，已近迟暮之年仍壮志难酬。尽管如此，

诗人依然对前途充满希望，告诫自己即便身份卑微，也要时刻心怀国事民生，但愿有朝一日还能实现报国之志。从此，“位卑未敢忘忧国”便成为忧国忧民的寒素之士自勉自励的箴言。后来，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更是写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豪言壮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渐渐被看作每个老百姓责无旁贷的历史担当。由此可见，爱国主义历来就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心声，是历久弥新的民族传统。

说到爱国主义，有一个问题或许无法回避，这就是：“怎样才算爱国？”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认为，爱国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本能的爱国心”，一种是“理智的爱国主义”。本能的爱国心是“来自那种把人心同其出生地联系起来的直觉的、无私的和难以界说的感情。这种本能的爱国心混杂着很多成分，其中既有对古老习惯的爱好，又有对祖先的尊敬和对过去的留恋”<sup>1</sup>。相比之下，理智的爱国主义“虽然可能不够豪爽和热情，但非常坚定和非常持久。它来自真正的理解，并在法律的帮助下成长。”<sup>2</sup>托克维尔推崇理智的爱国主义，因为本能的爱国心“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它不做任何推理，只凭信仰和感情行事。有些这样的民族以某种方式把国家人格化，认为君主就是国家的化身。因此，他们把爱国主义所包含的情感一部分转化为忠君的热情，为君主的胜利而自豪，为君主的强大而骄傲。”<sup>3</sup>所以，“同所有的轻率的激情一样，这种爱国心虽能暂时地激起强大的干劲，但不能使干劲持久。他把国家从危机中拯救出来以后，往往便任其于安宁中衰亡。”<sup>4</sup>而在理智的爱国主义中，“一个人应当理解国家的福利对他个人的福利具有影响，应当知道

1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02—303页。

2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03页。

3 同上。

4 同上。

法律要求他对国家的福利做出贡献。他之所以关心本国的繁荣，首先是因为这是一件对己有利的事情，其次是因为其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劳。”<sup>1</sup>

## 2. 爱国的“情”与“理”

托克维尔所说的两种形式的爱国主义只不过是爱国主义的两个要素：一个是本能地爱国的“情”，一个是明智地爱国的“理”。所以，真正的、完整的爱国主义应当是一种“情理”，是一种把热爱祖国的激情与合理的爱国理由结合起来的“情理”。但也不是托克维尔说的那样，爱国的“情”只属于“君主国的本能的爱国主义”，少有“理”在；而在“共和国的理智的爱国主义”中，只有关于功利算计的“理”，少有“情”在。其实，在爱国主义中，“情”和“理”的关系是随着历史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的，许多问题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中国人讲的道理，都有个“情”字在里面。这是我们民族的传统，也是民族的特色，爱国主义自然也不例外。从表面上看，在传统社会，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爱国大致都是和忠君联系在一起的，忠于君主就是爱国。但实际上，与西方有所不同的是，在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爱国就是忠君，是因为其中有个“家”作为纽带和桥梁。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家国同构”秩序造成的。在这个社会框架内，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家与国在组织结构上是相通的，全靠血缘宗法关系维系，实行父权家长制。所以，就像《墨子·尚同下》中说“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一样，家是什么样，国大致就是什么样，齐家和治国往往被看作一回事。

1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03页。

不难想象，在父权家长制下，最重要的道德原则一定是“孝父”。血缘关系不仅给“孝父”提供了天经地义的道德理由，同时也给这个理由奠定了天然的情感基础。如果说国是放大的家，那么君主无疑就是这个“大家”之父，所以“孝君”自然就成了“孝父”的延伸，从而，换个说法，“忠君”也就成了相似意义上的“孝父”。这样一来，爱国的“情”和“理”也就自然而然地可以从“孝父”转移到“忠君”上。

爱国即忠君的“情理”归根结底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在封建社会，它是维系和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的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当这种历史合理性不再有时，强调忠君爱国无疑就是迂腐和倒退。历史上的张勋复辟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在那些依然忠于清廷的人看来，张勋带着“辫子军”对抗革命军、以调解“府院之争”为名入京策划清帝复辟，这些肯定都是“爱国”的“壮举”。但是，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已经敲响了封建体制的丧钟，当清朝政府的存在已经成为民族独立的羁绊，当民主共和已经成为势不可当的历史潮流，若再把爱国和忠君联系在一起，就必定会成为历史进步的逆流，上演一出出历史的悲剧和闹剧。

可见，在爱国主义的“情理”中，“理”是随着历史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着的。这个“理”并非个人自以为正确就一定会是正确的道理，只有符合历史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民族利益的“理”，才是真正的爱国的理由。这个“理”若是对了，爱国情感的抒发才是正当的、合理的，若不然，爱国的激情就会使错方向，结果适得其反。至于那些假借爱国之名泄个人私愤之实的劣行，是根本就不配称作爱国主义的。这似乎说明，在爱国主义的“情理”中，爱国的理由才是关键所在，才是评判爱国是否正当的最终标准。

### 3. 现代社会的爱国“情理”

那么，是不是像托克维尔说的那样，在现代社会，爱国主义只谈功利算计的“理”，不讲感情呢？其实，托克维尔的说法尽管听起来难以接受，但的确是有一定根据的。

在传统的自然经济社会，绝大多数人都依附于村庄共同体生活，一辈子生于斯长于斯，与外界少有往来，相对比较隔绝。靠血缘宗法关系维系的古代村落，既是满足个体生存需要的生产单位，也是满足个体生活需要的社会单位。在这个“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圈子里，亲情是天然的人际纽带，是人与人之间保持较高信任度的天然基础。所以，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心理上，个体对村庄共同体的依赖程度都非常高，个体很容易对村庄共同体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就是生于斯长于斯所以情寄于斯的缘由。

大约在 16 世纪的时候，商品经济开始取代自然经济，渐渐成为社会经济的根本形式。传统的自然经济主要是农耕经济，个体依附于土地过活，靠天吃饭，自给自足。商品经济则不同，它打破了原先画地为牢、各自顾各自的生产格局，统一交由市场来安排社会生产并协调供需关系。这样一来，个体就从依附于土地转而开始依附于市场。更重要的是，个体作为劳动力的所有者，作为生产要素，也是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对象。他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在市场的指使下、在更大的活动区域内自由流动。一旦社会迈出了这一步，个体也就从传统的熟人社会走进了现代的生人社会。也就是说，人们脱离了靠血缘亲疏原则维系的小共同体，进入了主要是靠平等互利原则维系的大共同体。很显然，由于社会交往原则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人们确实无法将原来对小共同体的那份特殊感情移植到大共

同体上。相反，在这个大共同体内，每个人或许都感觉自己只是微小的一员，微小到往往无法感知大共同体的边界究竟在哪里。于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成分渐渐地淡了，而利益的考量越来越浓了。久而久之，人们对共同体那种归属感就没有了着落，没有了依附。结果是，除了关心个人得失之外，其余的东西反而成了负累。我们说，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才会出现托克维尔讲的那种理智的爱国主义，一种少有感情成分、主要靠功利算计的爱国主义。

这似乎说明，在现代社会，在精明算计的“理”之外，或许很难培养出爱国主义的“情”。但是，很难培养是否就意味着无法培养呢？难道在现代社会，人们就找不到一种合情合理、有情有义的爱国主义吗？实际上，问题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其实，从社会必要性的角度来看，爱国主义是一种价值取向，是用来协调个体与社会共同体之间关系的道德价值取向。人们是否会接受或认同某种道德价值，形成某种道德意识，关键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情”和“理”往往是相互交织、并行不悖的。

美国心理学家科尔伯格认为，在个体身上，道德意识的发展会经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处在前习俗水平：个体最初以自我为中心，但渐渐地也会顾及他人的利益。第二个阶段是习俗水平：个体学会按照社会规则的要求行事，并开始从规则的角度评判他人的行为。第三个阶段是后习俗水平：个体在驾驭社会规则的基础上，形成一套自认为是正确的行事原则，这就是原则化了的良心。科尔伯格认为，这就是道德的理性推理过程，同时也就是道德意识的形成过程。但现代情感科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这个过程中，不只是理性在发挥作用，情感的成分也如影随形。在人类道德意识形成的每一个阶段和层次上，总是或多或少地结合着天然的人类情感。就算是自私自



利的行为，其中也是有感情成分的，那就是自爱。所以，问题就不是道德意识在形成过程中有没有情感，而是如何用合理的情感取代不合理的情感。其实，即便是在道德理性主义的近代鼻祖——德国哲学家康德的道德理论中，情感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尽管康德把理性的道德律看得至高无上，但还是提醒人们：对道德律的“敬重感”才是个体行事道德的前提。他说，“为了义务”的行为不是真正的道德行为，因为那是为了义务而义务。只有“出于义务”的行为才是真正的道德行为，因为它是建立在既有理解又怀敬重的基础上的。其实，这就是一种关于道德的“情理”。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爱国主义，我们发现，“爱国”有两个阶段：一开始是“国家”对“国民”的要求，相对于“国民”来说，这是外在的要求。另一个是“国民”对自己的要求，也就是自觉自愿地爱国。在前一个阶段，爱国的理由大概只能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大道理”，个体盘算的或许多是爱国的种种好处，难有对国家的切身之爱。但在第二个阶段，一旦爱国成为念由心生的自觉要求，那就会是一种有情有理的爱国主义，才会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其实，从“情理”的角度理解爱国主义并非难事，关键在于，在现代社会，如何才能培养出真正的爱国主义呢？或者换句话说，如何才能把外在的“要爱国”转化为内在的“我爱国”呢？

#### 4. 从“要爱国”到“我爱国”

从“要爱国”到“我爱国”的转变，取决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对国家的认同，一个是参与共同体活动。这两个条件是彼此联系、互为表里的。

一般说来，只有当个体感觉自己真正属于某个共同体，是这个共同体当中的一份子时，他才会真正热爱这个共同体。换句话说，爱国其实来源于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不是凭空建立的，它是在国民参与和国家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共同体活动中逐渐养成的。奥运赛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当你身临其境地观摩有中国体育健儿参赛的现场，当你揪心着每一个中国运动员的场上表现，当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缓缓升起迎风飘扬的时候，你或许会忘情地呐喊，会激动得落泪。在这一刻，每一个关心中国奥运成绩的人，他的心都和祖国在一起，都会在参与奥运的过程中感受到自己是国家和民族的一分子。这种爱国的情感是本能的、发自内心的，它会在一瞬间把个人和国家紧密地融为一体，使每个参与进来的人都会对祖国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这种由“我参与”带来的“我爱国”，还体现在两会期间国民的参政议政热中。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民开始关注两会期间的动态，不仅关心那些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举措，也关心和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议案。民主政治生活的不断扩大和透明，关系到每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不断完善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会不断增强国民的主人翁意识。国民会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是由自己做主，是人民自己在当家作主。从这个角度上说，要提高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就要让老百姓更深入地参与到和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决策中去。国民参与社会公共决策的程度越高，个人的意志就会和国家的意志联系得更加紧密。在这种参与活动中带来的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会是持久而稳固的。

当然，参与奥运也好，热议两会也好，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这种国家层面的集体活动其实并不多见。所以，我们有时经常会碰

到“三分钟热度”的现象。也就是说，国家层面的集体活动虽然会一时引起人们的关注，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但热度一过，这种情感似乎就会渐渐淡去。那么，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如何还能保持一颗爱国心呢？其实，爱国行动也可以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前面已经提到，爱国主义是一种用来协调个体与社会共同体之间关系的道德价值取向。它会让我们更加看重集体利益，超越自己的私利，使社会变得更加团结、和谐。所以，从根本上讲，爱国主义最终是为了培养一种超越一己私利的道德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在本质上是一回事。只不过，在集体主义中，国家就是最大的集体。

爱国主义不仅和集体主义有关，还和社会主义相连。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我们今天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民族在战火纷争的时代浴血奋战而来的。中国选择了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是我们民族自己的选择。所以，如果说爱国就是用行动建设这个国家的话，那么爱国也就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说，爱国主义和爱社会主义是一致的。其实，社会主义并不是离我们很远的乌托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理想，它不仅和人类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也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并不是什么神秘而遥远的东西，它的根本目的只不过是让每个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用实际行动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是对爱国主义最好的诠释。

当然，爱国也不能走向极端，不能走向狭隘的爱国主义。一味地放大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抽象爱意，容易滋生民族主义。这是把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极端放大的做法，是不正确的。爱自己的祖国并不意味着要敌视或轻视其他的国家和民族。一个民族，它可以

因为自己对人类作出的贡献而备感自豪，但这一定不是所谓的民族优越感的来源。民族和国家之间的联系应当建立在民族自信和自爱的基础上，和平共处。这才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正确关系。

### 三、我们为何需要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中积极健康价值观的集中表现，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积淀下来的文化精华和民族主体意识，凝聚着一个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价值取向、生存方式，体现着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个性和精神特质，并通过特定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文化、道德精神气质、个性心理等方方面面展现出来。特定历史现实创造了特定的民族精神，最终也一定要被民族发展的历史所选择；反过来说，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形成一定的民族精神文化，或者失落了它的民族精神，它就不可能是一个持久发展的民族。民族精神对一个民族的存在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1. 构筑民族精神家园

人类是必须有家园的，一个民族除了必须有栖息生活的自然家园外，还必须拥有它的精神家园。自然家园对于任何民族都十分重要。缺乏自然地域家园的民族，必将在世界上四处漂泊而最终在历史进程中消亡。然而精神家园对一个民族也是至关重要的。失落精神家园的民族，民族的精神灵魂同样会居无定所漂泊遗落，民族文化会因为没有个性特质而萎缩直至销声匿迹，而没有精神灵魂、没有民族文化的民族最终也必将走向衰亡。人类、民族就是这样，永远必

须生活在自然的、精神的双重家园之中。

建立“双重家园”基础上的家园感是人类普遍的需要，当然不同民族精神家园的构筑和依托形式有可能不同。比如，西方人是到上帝、天堂那里寻找精神寄托和归宿，而中国文化没有自生出典型意义上的彼岸宗教，中国人往往会在人伦亲情（血缘亲情根基的延展）和理想人格处落实精神归宿。民族精神及其文化传统就是一个民族栖息本质自我的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获得精神支柱和不竭发展动力的终极所在。

一个人活着要有精神支柱，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更离不开民族精神的支撑，可以说精神支柱就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生命存在方式。所以任何一个真正自觉的民族，都会非常重视本民族的精神文化的发展。历史发展到今天，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文化多元的存在，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走上了民族文化自觉的道路。中华民族过去很重视人的精神的高扬，今天的社会发展依然离不开民族精神文化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对此曾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们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依靠革命精神取得了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大力发扬这种精神。

总之，民族精神家园是一定民族的精神归属所在和民族理想追求的永久寄托所在。一个民族的自然地域家园可以有大有小，但精神家园容不得片刻的荒芜或失落。对于我们民族而言，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已成为我们民族凝聚力的灵魂和源泉，成为促使我们民族生生不息、前进发展的精神动力，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家

园。所以，守望建造民族精神家园，弘扬培育民族精神，既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也是时代的要求。

## 2. 增进民族认同

人类学家告诉我们，民族认同是民族成员对本民族价值信念、民族归属以及民族身份的认可确定。民族认同可以在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及形成的所有结果中发生。民族的共同利益、民族文化的价值信仰、民族心理、民族生活方式，以及民族的血缘、语言、地域、历史等，都能够成为民族认同的基础和识别特征。民族认同往往表现为对内维护族群凝聚的自我认同及对外区分我族群与他族群的相互认同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一个民族所有成员对自己民族的自觉认可和自觉归属。具体表现在：一是对自己所属民族的血缘、语言、种族、地域、历史的认同；二是对所属的民族国家和政治组织及其共同利益目的的认同，即认可民族国家统治的合法性；三是对所属民族的价值信仰、习俗文化的认可。可见民族认同不但是对民族国家身份的认同，对地域、血缘、历史的认同，也表现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血缘种族认同、国家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可能相互交叉，也可能相互涵盖。对于民族认同而言，文化认同可能是一个比血缘种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更为宽泛也更为复杂的概念。

相对来说，民族国家认同和民族文化认同有联系也有区别，国家认同更多地依赖于物质利益和政治利益方面的共同目标，而民族文化认同则更多地依赖于思想意识和精神心理等方面的因素。民族国家的认同离不开物质利益的基础，但更需要思想意识层面和精神

心理层面的基础，真正能够带来民族认同的是民族文化的认同。如果民族成员对该民族所有的文化形态、价值理念、精神追求等因素不认可，就谈不上真正的民族认同。民族精神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理念和灵魂支撑，它能够强化该民族在文化、价值信仰、心理习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共同性，由此产生出一种对本民族的内在感召和纽带连接，促使该民族成员产生向心力和民族认同感。比如说，海内外华人可能分属于不同国家，但由于具有永远抹不去的同宗血缘关系，而且具有同一民族文化的认同背景，所以，海内外华人被宗族和文化纽带紧紧连接在一起。

与此相关，积极正面的民族认同会使民族成员追随并维护本民族的共同事业和价值信仰，会对自己所属民族产生自豪感和优越感。当我们在世界面前大声说出“我是中国人”时，我们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就完全显示了出来；相反，消极负面的民族认同则使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文化及身份没有自信。每一个民族的发展无不是在认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欲进行民族分裂活动的人，也总是先在文化形态及其文化认同方面做文章。

第二个方面，民族认同还包括对外区分自我民族以及与他民族相互认同。一定民族以其所具有的历史、血缘、语言、精神文化及共同利益，作为自我民族的确定及与其他民族相互区别的识别标志。民族认同在凝聚本民族成员的同时，也会对其他民族产生一定的排他性。所以，民族的自我认同必须与对其他民族的认同相结合，自我民族认同如果绝对化，就有可能走向狭隘民族主义。我们强调民族认同，但绝不走向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强调文化认同，但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民族自我认同与对其他民族的认同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在弘扬民族文化、强化民族认同的过程中，这一问题应该得到

充分的理性把握。

### 3. 凝聚民族力量

民族精神对民族的凝聚整合力量，首先来自于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和灵魂，民族精神既是民族文化中的核心内容和精华部分，又是民族历史过程的一种浓缩。它生于民族历史发展长河中，又在长期的民族共同生活中影响、浸润、塑造着该民族的共同价值信念、心理思维和生活方式，民族精神实质上是表达一定民族形成的共同价值取向和所认同的核心理念。真正的民族精神必然凝聚着广大民众的共同利益和理想追求，表达显现着一定民族的公共意志。

民族精神之所以会产生凝聚整合力量，还在于民族精神可以凝聚人心、传达民族共识、汇聚民族信念。文化方面的共性能够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与内在聚合，而文化的差异在分裂人们的意识时也会分裂人们的心理距离和内在聚合。民族精神可以把所有民族成员的价值倾向和精神意志统一起来，为实现共同的民族利益和目标而奋斗，甚至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能够把千千万万民族民众团结凝聚起来，动员起来，从而捍卫本民族的尊严和利益。比如，爱国主义精神是许多民族精神中的重要内容，这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用爱民族、爱国家的精神去整合凝聚民众。很难想象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会倡导人们不爱自己的民族，不爱自己的国家，会倡导与爱国主义精神相悖的其他精神。历史经验已向我们昭示：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爱国主义等民族精神一旦衰落，就会导致国家精神的崩溃。古罗马帝国盛世之后的衰败、大清帝国的没落，都和民族精神的衰落相关。而犹太民族在失去自然地域家



园凝聚纽带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团结凝聚，不懈地为民族国家的复兴而奋斗，最终实现了复兴民族国家的任务，这与犹太民族精神文化的牢固分不开。

民族精神强调的是与民族的共同性的一面，它能够使民族成员认识到自己是所在民族群体的一员，这种民族归属感能够激发起人们对民族作出贡献的情感和责任感，从而自觉维护民族利益。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出现了许多民族英雄的经典事迹，如“张骞出使西域”“苏武牧羊”，他们之所以能够克服许多艰难险阻，忠心不变，最终回归到自己的民族国家怀抱，都在于他们在精神上、心灵中始终不渝地存有强烈的民族归属召唤。民族共同利益和血缘、文化纽带基础上形成的民族精神，往往还会在民族处于巨大变革和危难的关键时刻，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和向心力。可见，民族精神是一种能够召唤、激发民族成员为民族的共同事业而奋斗的精神，它可以对人们产生亲和力，使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产生向心力。民族精神的共同价值理念和共同利益目标以及共同的文化心理，可以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意志整合起来，为民族的共同利益而奋斗。一个民族只有真正地以文化自觉的意识来认识把握自己的民族精神，大力弘扬培育自己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才可能产生真正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 4. 展示民族形象

民族精神对内发挥民族认同、民族凝聚的功能，对外则起着展示民族形象的作用。一个民族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民族，在于该民族有一系列富有独特个性的识别特征和标识。这些识别标识包含代表的一定民族所特有的文化价值信仰、生活习俗、思维模式、血缘、

语言、生活地域等，在诸多民族特征标识中，文化标识是最主要的识别参照系。而民族精神作为民族文化价值系统和民族认同意识的核心，对于形成民族特质和确定民族界限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民族识别和民族形象展示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民族精神可以看作是展示民族形象的重要标识，也是塑造民族形象的决定因素。一个民族所存在的民族意识，一方面表现为对自我民族的自觉认识和认同，另一方面表现为这个民族的形象自觉意识。任何一个有自觉意识的民族，其所具有的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都会促使自己民族积极塑造展示民族形象，都会努力把损害自己民族形象的任何因素降到最低程度。相反，对自己民族形象塑造展示的意识不到位或不强烈，大多是因为这个民族没有达到真正的自觉和觉醒，那么这个民族就不可能持久富强地发展下去。

任何民族文化都存在着良莠程度不同的内容成分，一个自尊、自信、自觉的民族一定会时常反省自己民族的不足方面，改变自己民族的劣根性，培育积极健康的民族精神。法兰西民族、德意志民族、日本民族、韩国民族等许多国家民族，都在民族和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对自己的民族性、国民性进行过这样或那样的改造。中华民族也不例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一直伴随着民族个性的发展和民族个性的改造。在中国近代，国民性的进一步自觉以及对国民性的改造，几乎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晚清启蒙学者以及孙中山、鲁迅等人，都在国民性改造以及中华民族形象塑造方面，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民族形象的树立在一定意义上是在打造国家品牌和民族品牌，与民族、国家的竞争力相关。比如，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许多民

族发展出了非常优秀的民族品质，诚实守信就是其中的一种。在世界的各民族交往中，如果哪个民族在诚实守信方面出了问题，一定会受到其他民族的鄙夷和远离甚至抛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来重视诚信品质，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在今天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一些人目光短浅，唯利是图，忽略甚至抛却了最重要的市场诚信资本。诚信形象的萎缩，给中华民族形象的塑造带来了污损，同时也加大了我国参加国际竞争的成本和困难。社会信誉环境的好坏，是我国国际形象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参加国际竞争的瓶颈所在。所以，弘扬培育积极健康的民族精神，展示良好的民族形象，不仅仅是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要求，而且是增强民族竞争力，使民族走向自强的必然要求。

## 5. 推动民族发展

民族精神不但可以使一个民族产生凝聚力，而且能够使一个民族具有创造力和发展力，推动民族发展。哲学告诉我们，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间接促进物质力量发展，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精神的力量可以直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人要有点精神，一个民族也要有自己的精神。一个民族无论遇到多少灾难和坎坷，只要有振奋的民族精神和高尚的品格，始终保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就一定能百折不挠，成就民族伟业，为人类进步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人类历史证明：没有强大的物质力量，一个民族不可能自尊、自立、自强；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一个民族同样也不可能自尊、自立、自强。民族精神作为一种精神成果，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而且使物质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

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已表明，国家的强大与发展，往往是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分不开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说民族精神是衡量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民族要想在当今时代增强自己国家的综合国力，实现民族新的复兴，就必须注重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及其优秀传统文化。

民族精神对民族发展的推动作用，一方面表现在它能够凝聚整合民族力量，具有增强壮大民族实力的重要功能。民族精神及民族素质已成为当今国际竞争的第一实力资源，可见民族精神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及其国家的国际竞争实力。任何一个民族，只有大力发展民族精神，弘扬培育民族精神，树立充分的民族自信与民族自尊品质，才可能推动民族事业和民族国家的久远发展。另一方面，民族精神中蕴含的那种健康向上的、积极进取的精神因素，直接就是民族事业发展开拓创新的力量源泉。比如，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推动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进取奋进，创造出了优秀灿烂的历史和文化，也创造了今天走向世界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民族精神不仅包含着一定民族的价值取向的精华，也包含着该民族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思维智慧，东方民族“天人合一”、真善美统一的文化精髓，对于当今世界特别是未来世界而言，很可能是一种超前的对世界的本质领悟。研究科技史的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对此就认为，东方孔夫子哲学智慧像是现代科学的一种先觉，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困境和危机，都可以从中国文化所包含的伟大的德性精神中得到解答，中国文化

将天人看作一个整体的观念，以德性、理性统领真善美的文化价值体系，给陷入唯物质文化和唯科技文化怪圈中的西方世界提供了一种古老而又现代的智慧。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所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也从精神文化与社会发展的角度，总结探讨了改革后的宗教精神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推动作用。

总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民族精神作为一定民族的优秀文化积淀，都凝结了该民族世世代代的创造和智慧，都能够为该民族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可见，民族精神中所蕴含的才智精华，是指引推动各民族甚至人类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重要智慧资源。

此外，民族精神还通过对民族自尊心的确立，推动民族及其国家的发展。任何一个民族，只有弘扬民族精神，树立民族自尊自信意识和品质，才可能使自己的民族立于不败之地，推动民族事业的长久发展。因此，我们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民族自尊心的培育，邓小平同志曾再三强调：“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必要出于对民族传统文化中某些弊病的厌恶而作践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也没必要因对发达民族科技文明的倾慕而盲目向往发达民族的精神文化。民族传统文化毕竟是民族历史发展中世代相传的部分，它把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紧紧地联系起来，显示出自己民族在其发展中的同一性和个性，已成为我们民族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今天，民族自信与自尊已成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健康发展的一种重要动力资源。

## 四、时代精神如是说

每一个民族都会发展着自己的历史，诠释着不同的时代；每一个时代都会把自己呈现在历史面前，等待着世人的评说。

### 1. 时代问题与时代精神

一般认为，时代精神就是身处那个时代的人们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但每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却总是各自言殊，莫衷一是。所以，在谈论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之前，或许应当仔细地琢磨一下“时代精神”这个扑朔迷离的概念到底是什么。

存在着一种左右一切时代的精神实体吗？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就认为，每个时代的时代精神都是“绝对精神”的化身。“绝对精神”就是左右一切时代的精神实体，而每个时代具体的时代精神只是“绝对精神”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表现形式。但实际上，这种精神实体并不存在。每个时代的时代精神都是那个时代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决定的。背景和条件发生了变化，时代精神也必定随之改变。所以，从大尺度的历史时期来看，每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大致都是相对独立的。雅典时代的时代精神肯定不同于罗马时代，中世纪时期的时代精神肯定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工业革命时期的时代精神肯定不同于现在的全球化时代。这似乎说明，时代精神是个历史概念，“历史”在这里的意思是：时代精神是变化发展着的，根本没有一个从一而终、永恒不变的精神实体。如果说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时代精神之间还有什么相似之处的话，那只能说它们都叫“时代精神”。

存在着普天之下世人公认的时代精神吗？比方说，有不少人就

认为，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和发展趋势，所以，在全球化条件下，一定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找到举世公认的时代精神。它可以跨越不同地域、民族、国家和社会，成为人们共同享有的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实际上，这种时代精神也不存在。因为时代精神不仅是个历史概念，也是个社会概念。“社会”在这里的意思是：生活在不同社会中的人们，由于社会体制、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和心理特征的不同，在同一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精神状况往往大不相同。就拿全球化来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和立场就不完全一致。发达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盈利能力和文化输出问题。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问题可能是：在借助国外资本和技术经验发展国内经济的同时，如何有效地抵制垄断控制和文化殖民。可见，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社会反映出来的问题往往是不同的。所以，面对着不同问题的人们在认识和处理各自问题的时候所采取的方式必定各不相同，从而，他们在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就一定会有很大的差别。

那么，如果时代精神因时因地而异，我们如何才能把握它？对于这个问题，青年马克思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道：“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sup>1</sup>

其实，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并不是人们在头脑中凭空想出来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的，而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从行动中做出来的，是他们在解决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时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换句话说，只有找到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才能真正理解那个时代的精神实质究竟是什么。

## 2. 革命时代与革命精神

从 1840 年开始的鸦片战争到 1949 年的新中国成立，中国的近代史经历了百余年。在这一百多年的沧桑岁月里，那个公开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如何才能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可以说，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中华民族用自己的血肉和行动不断回答这个问题的历史。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国人走过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鸦片战争后，一些较为开明的地方当权派曾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认为只要学会了西方人的先进技术，兴办实业，就能富国强兵，抵御外辱。但是，洋务运动并没有改变中国人落后挨打的局面，也没有实现它富国强兵的初衷。因为它的最终目的还是维护清朝政府的统治，以为只要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加进一些西洋的技术手段，修修补补就能万事大吉。这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都在甲午战争中现了形。

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仅仅在“器物”和“长技”上求新是不够的，改良运动治标不治本。要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就要革旧制度的命，就要推翻腐朽的清廷，结束两千多年来封建王权的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讲，1911 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对中国近代史上那个“支配一切个人”的迫切问题的第



一次正面回答，是真正推动时代进步的历史答案。但是，辛亥革命并不彻底。帝国列强仍然在中国横行，封建王权的流毒尚未清除干净，官僚资本主义却又粉墨登场。历史证明，靠有产阶级“小众”发动的政治革命无法在根本上解决那个“支配一切个人”的迫切问题，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关系劳苦“大众”的切身利益和自身命运，只有依靠无产阶级“大众”的力量，才能找到时代问题的真正答案。五四运动以后，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开始领导中国革命。人民大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彻底地回答了那个时代“支配一切个人”的迫切问题。

现在看来，只有理解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迫切性，我们才能理解在那样一个革命的年代，中国人是如何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又是如何在这些行动中体现自己的精神气质与价值取向的，也就能理解辛亥革命主张的“民主共和”，新文化运动倡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就能理解抗战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等等。这些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就是先进的中国人对时代迫切问题的历史诠释。

### 3. 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那个公开的、“支配一切个人”的问题开始从革命立国转向了建设兴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强国。在这个大问题下，围绕着这个大问题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中国人进行了60多年的积极探索。石油会战中的大庆精神应对的是国家建设中能源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应对的是国家建设中的思想道德问题；无私奉献协同创新的两弹一星精

神应对的是国家建设中的安全问题，等等。这些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不是别的，正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在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时，用自己的身体力行作出的答案，而时代精神就体现在这些答案中，就是这些答案本身。正是在这些时代精神的激励和鼓舞下，先进的中国人才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排除万难，勇往直前，才会在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迎头赶上，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成就。

当然，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曾一度受到负面影响。这正好说明，当反映时代特质的迫切问题发生了变化，若还是沿用原来的旧思路，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适得其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实际上又回到了如何建设兴国这个大问题上。面对这一个问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先进的中国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引进外资，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文化知识，改革旧的不合时宜的东西，发展新的具有生命力的东西，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久而久之我们发现，可以学习发达国家的一般技术，却学不来人家的核心技术，因为核心技术带来的利润是现代资本盈利的主要来源，若不是花费巨大的代价，别人是不会把看家本领和盘托出的。我们可以学习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但若完全按照西式的管理模式，就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在科学研究领域，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我们一方面要国际化，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又不能跟着别人的屁股后头跑，不能照着别人的问题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所有的一切都说明，我们需要在改革中不断进行自主创新，也就是革除旧东西、创造出

新的适合自己发展的东西。

30 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每一步成就都见证着改革创新步伐。2004 年，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曾发表一篇调查论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在库珀看来，中国的成功在于把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同时勇于实践，大胆地进行改革，并用自己的影响力对抗外来霸权。不难看出，“北京共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验的总结，恰恰就是对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总结。近些年来，中国在基础科学、应用科学等方面的自主创新发展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是，改革创新的发展过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不仅要注重科技创新，同时也要并重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改革创新一定是回答中国当代最迫切问题的最好的行动方案。在改革的实践中，中国人一定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体现属于自己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 4. 民族发展与中国时代精神

中国人在每个时代用自己的行动回答时代提出的迫切问题时，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在里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时代精神只不过是民族精神在时代发展中新的表现形式。正是由于每个时代都是那个民族的时代，是那个民族面对自己的迫切问题不断回答的时代，所以，所有的时代精神都带有民族性。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不可分割。比较而言，民族精神强调的是历史传承，它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和源头。时代精神讲求的是改革创新，它是文化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民族精

神和时代精神是相辅相成的。

总之，每个时代都会以问题的形式呈现诸多现象，有些表现为结果，有些表现为趋势。每个国家、民族对这些现象的看法都是不尽相同的。所以，它们对这些现象做出的反应自然也就各不相同。如果把握准了，可能会抓住机遇使民族得到发展，如果没把握住，就可能会错失良机，停滞不前。由于不同的国家在同一个时代中所处的地位往往不同，而民族文化间的差异也会反映在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上，所以，每个时代从每个民族身上可能折射出来的时代精神往往是不同的。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应当在民族发展的基础上体现出自己特有的时代精神——中国的时代精神。所以，一方面，我们不应追求那种所谓的对一切民族发展都起着同样作用的时代价值，实际上，那并不是在寻求所谓的普世价值，而是在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另一方面，每个民族都有每个民族在自己的时代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正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才能找到属于自己民族的时代价值，体现我们民族的时代精神。

## 五、守望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块温暖而柔软的地方，在那儿的时候就感到温馨，充满了力量；不在那儿时候，就特别地眷恋和向往。这就是人们魂牵梦萦的精神家园，是心灵得以慰藉、精神得以寄托的地方。

### 1. 诗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1938年，抗战爆发。诗人艾青满怀着对祖国的挚爱和对日本侵

略者的仇恨，写下了这首家喻户晓的抒情诗《我爱这土地》：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诗人笔下的小鸟虽然微不足道，但在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时刻，即便耗尽自己全部的生命，也要用嘶哑的喉咙发出不屈的声音，奋力抗争。诗文最后两句感人至深，抒发了作者对祖国刻骨铭心、至死不渝的挚爱之情，在那个苦难的年代，道出了所有中国人内心的情愫。

艾青是“土地”的歌者。在他的诗中，“土地”象征着生他养他的祖国。而那只小鸟，就好比每个心系祖国命运的中国人，无论飞到哪里，无论飞得多远，总是舍不得离开祖国这片土地。这是中国人对土地特有的一种情结，它深埋在我们的民族血脉之中，与生俱来。

有时候，“土地”就是祖国。对于那些身处异国他乡的人来说，无论身在何处，最后总想叶落归根。有时候，“土地”也是家乡，

无论你走到哪里，心里总是牵挂着那个地方。有时候，中国人对“土地”的这种眷恋会化作一股浓浓的乡愁，它就像台湾诗人余光中在《乡愁》里写的那样：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乡愁是对家乡的一种眷恋之情。对中国人来说，这种思乡之情是和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个乡土社会。绝大多数人一生都靠土地过活，双脚陷在泥里，自然也把对家乡的深情和不舍扎根在乡土里。在现代社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口流动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人的思乡之情似乎更加的浓烈了。

对那些进城闯天下的民工来说，那种源自土地的乡愁至今仍弥漫在他们心头。虽然他们如今不全靠土地过活，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也不在村里，不在家人身边，但心中无时无刻不眷恋着自己的“老家”。打工诗人郑小琼就曾写道：“夜晚的乡愁添加着我们的记忆 / 亲情 / 它里面交叉着重叠着百味 / 它在我的身体里安置了故乡的灯火。”而对于那些一直生活在城里或是从农村搬到城里居住的人来说，似乎还有一种别样的乡愁。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是城市“移民”，是在异乡落户的他乡客。他们的出生地、求学地、工作地或许都不在一个地方。他们对家的感觉自然也不同于以往。

所以说，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由于人口流动规模的空间扩大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当代中国人的乡愁情结或许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愈加浓烈。不过，这种乡愁和以往有所不同，它是一种“双重”的乡愁。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有个“老家”，而这个“老家”又不是自己“常在的家”。有时候，这两个不在一起的“家”会带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当你在“老家”待久了，或许会感到不习惯，不时地想回自己“常在的家”。而当你在“常在的家”待久了的时候，心里又会不时地恋想“老家”。这双重的家的感觉，无疑会带来“双重”的乡愁。有时候，你或许会问自己：我的家乡究竟在哪里？

在传统社会，除非战乱和饥荒，人口的流动性都非常小，绝大多数人一生都生活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地方，少有迁徙。若是异地落户，就是背井离乡。所以，对那时的中国人来说，常在的家与精神上的家是重合在一起的。但在现代社会，这两种家开始分离了。常在的家是日常的生活场所，大多是工作的地方，但往往不能给人落地生根的感觉。老家似乎更让人感觉亲切，但又不是提供更好生活的地方，所以也不是归宿。显然，生活在当代的中国人并不缺少生活的家，

但是，心灵可以寄托的那个家究竟在哪里呢？

所以，当我们说现代中国人的乡愁是一种别样的乡愁时，我们是在说，这种乡愁不全是或主要不是对土地的依恋，而是在找寻一种家的感觉。它是一种文化乡愁。这种乡愁并不是回趟老家待上几天就可以排遣的，因为传统的乡土“老家”给不了城市里的现代生活。当然，这种乡愁也不是现代的城市生活可以消解的，因为现代的“新家”给不了血脉里的历史渊源。这是当代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文化乡愁。实际上，它是人们对自身精神家园的一种守望和寄托，是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碰撞的结果。

## 2. 民族的文化乡愁与现代文明

十八大报告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小到一个人，大到整个民族，都希望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因为，只有待在自己的家里，才有那种自由、安稳、惬意、舒心的感觉，才能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有时候，即便是离家久了或一时忘了回家的路，那种想要回家的感觉却会不时地涌上心头，就像一股莫名的冲动，牵引着心系的方向。这就是一种民族的文化乡愁。

说到这里，或许人们不禁要问：如果精神家园是如此重要，那中国人可以守望的精神家园在哪里呢？其实，任何民族的精神家园都有不同的布置和装点，所以它们看上去总是形象各异、千差万别。但从总体上说，每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大致都会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传统文化，一是时代文明。对当代中国人来说，传统文化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时代文明主要是指现代的西方文化。所以，



要讨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问题，是绕不开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的。

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有两股此消彼长的情结由来已久，那就是怀旧情结和实用情结。中国人的怀旧情结里夹杂着对自己民族悠久传统的自豪感，感觉自己有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血统赋予的历史身份，在一个充满着可能性的世界中，辉煌过去似乎意味着一个必将再次辉煌的未来。不过，许多中国人大概并不真的知道民族的悠久传统到底赋予了自己什么内容，这些内容又在发挥什么作用，或者到底有没有作用？毕竟，人都是活在当下的人，都是需要面对现实生活的人，尤其是面对现实的现代生活的人。相比之下，实用情结就会更加贴近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在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现代科技和管理经验的同时，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所以，在实用情结的作用下，在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化问题变得扑朔迷离的情况下，人们似乎更加青睐大行其道的西方文化。传统的东西似乎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供人欣赏，与如此现代的社会来说，总是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如果是这样，那对于当代的中国人来说，是活在历史的穿越剧里好呢，还是在格式化历史后跳入全新的3.0时代呢？

在西方人写给西方人看的一本《东方哲学的故事》中，作者在扉页上记下了一段非常有趣却又发人深省的话：“一位中国长者曾对身为西方人的作者说过：‘在你们西方人眼中，用一小时而不是三天时间到达某个地方是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而我们东方人所关心的是你到那儿要干什么。’”显然，这位畅销书作家是在反思西方文明的立场上引述这段话的。他想说的是，过分偏执于技术理性的西方文化，应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学习和借鉴价值理性。同样是这

段话，中国人却可以这样理解：我们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但不可深陷在西方文化的技术理性当中。或者再进一步说，我们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中就有可以安身立命的价值理性，就有构筑中国人自己精神家园的一亩三分地。

如今，有不少西方人开始反思他们一贯引以为豪的“双效”技术理性（重效率、讲效果），更有人甚至认为，驾驭西方文化这头烈马的缰绳，只有攥在东方文化的手中才能驶向新的文明起点。中国的民族文化必将是未来世界的时代精神。如此说来，是否就能以为，我们的民族文化一定就是拯救西方文化的济世良药吗？一定会是未来的人类文明的指南针吗？显然，我们不能报以如此盲目乐观的态度，但这至少说明，我们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关注还不够，我们还不是那么有自信，我们还需要在别人的夸赞中才会反过来承认自己。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说，洋务运动时提出的“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如今是适用的。中华民族在近百年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找到了自己要走的道路和未来要实现的理想。这些都是明确的。我们可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也就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理性，永远只有在自己的民族精神中才能找到。

### 3. 民族精神与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有时候，尽管我们一时说不清那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的确能感受到我们之所以把自己称作中国人所特有的那些东西。这些东西融在我们的民族风俗、文

化性格和精神气质当中，是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延续在我们民族血脉中的文化基因。我们的精神家园不在别处，恰恰就在我们与生俱来的民族精神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弘扬民族精神和守望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其实是一回事。不过，我们需要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做出一番解释。

以往的相关教育告诉我们：一定要弘扬民族精神，把它发扬光大；要把民族精神融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让中国人活出中国人的样来。这些当然不错，但有时会给人留有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民族精神高高在上，离我们很远。我们需要不断地迎合民族精神，才能弘扬和传承民族精神。

其实，民族精神说到底是为民族发展服务的。弘扬民族精神并不是为了刻意地追求某些民族价值或光耀民族形象，而是要发挥民族精神的社会功能，延续和传承我们的民族文化，让每个中国人都活在自家的精神世界里。历史地看，民族精神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变化发展着的。我们的民族之所以能延续几千年，至今不绝，这恰恰说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有文化生命力的。而民族精神的这种文化生命力之所以能“活”到今天，肯定不是因为它听起来有多崇高和伟大，一定是因为它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紧密联系。所以，民族精神其实并不在高处，也不在口头上，而是在我们生活的周遭，在我们特有的习俗里，在我们民族的处世智慧和文化心理之中。

简言之，社会生活中民族精神是无处不在的。甚至可以说，离开了民族精神，我们是无法刻画和形容中国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会指引着每个中国人如何成己成人，

如何追求社会大同，如何找到自身幸福，如何实现自我价值，等等。所以，民族精神既是民族的精神气质，也是民族的人生智慧。我们不用为了弘扬民族精神而弘扬民族精神，我们是要生活在自家的精神世界里，生活在民族文化的精神家园里。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为了我们的民族也为了我们自己，努力地去解决时代的迫切问题和我们自身的迫切问题。这样，我们就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我们这个时代表现出我们自己的时代精神，我们这个民族的时代精神。如果这样做下去，那么，民族的复兴和强盛就一定会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

## 第五章

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基础

尊严是荣誉的别名。

——西方哲人论荣辱本质

---

还有比生命更重大的，就是荣誉。

——席勒

---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担心，在生活和工作中缺乏传统道德，会令社会变得非常地粗鄙。现在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在一个市场经济环境下，建立水平较高的道德体系。<sup>1</sup>

——美国投资战略家库恩

---

1 库恩谈中共新领导人五大任务，《环球人物》专访，<http://news.sina.com.cn/c/sd/2012-12-05/150525737546.shtml>。

“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这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一个关键性的任务就是要坚持以德治国，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弘扬真善美，贬斥假丑恶，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就荣辱观培育而言，值得深思的问题是，我们该留下什么样的名声，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成就我们的荣誉，如何去通过对道德底线的坚守和对共同价值的维护，来重建一个有高度道德感的社会。

## 一、荣辱：道德感之维

追求荣誉、避免耻辱是人之常情，但是，一个人如果不懂得荣辱与人格的关系，不明白道德是荣辱评价的根本标准，就很难避免耻辱，也难以得到真正的荣誉；一个国家中如果有相当数量的人不理解这个道理，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就必然是混乱的。思考荣誉的道德基础问题，关注荣辱的标准问题，对于形成公民基本的价值共识、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念，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 1. 荣、辱、耻

2011年9月20日，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举办的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颁奖典礼——《德耀中华》在北京举行。颁奖大会表彰了郭明义、阿尼帕·阿力马洪等54位道德楷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出席颁奖典礼，并为全国道德模范颁奖。

2012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11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著名加速器物理学家谢家麟和著名建筑与城乡规划学家吴良镛荣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为他们颁奖。

国家最高科技奖是我国成就极其卓越的科学家获得的巨大荣誉，全国道德楷模评选表达的也是全社会上下对道德奉献者的充分敬意，鲜花、掌声和荣誉证书，庄重的仪式现场，颁奖者的国家领导人身份，无不昭示着荣誉的巨大与非凡。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国家级别的崇高荣誉，但是，每个人都会珍惜和追求荣誉。俗语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这个“名”，这个“声”，指的是“好名声”“好名声”就是荣誉。“荣”的原意是指草木的茂盛，如陶渊明诗里说的“木欣欣以向荣”，白居易诗中说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等。“荣”的意义后来引申为事业的兴盛、地位的显赫、良好的名声。我们所说的荣誉是指来自于社会组织、社会群体、社会舆论，以及个人的肯定性评价，让人产生愉快、自信、进取等积极的情绪反应。荣誉是人的社会需要，每个人需要来自他人的尊重，需要社会群体对自己的肯定评价。

与荣誉相对的是耻辱，它是来自于社会组织、社会群体、社会舆论或者个人的否定性评价，会使人产生的自卑、自贬、压抑等痛苦的情绪体验。“耻”与“辱”是近义词，有时可以相互解释，但又有一定的差别。“耻”是内在的，是因个体自身缺憾，如能力不高、收入不多、级别不高、做了错事等，而产生羞愧、悔恨、沮丧、自卑、自我怀疑、自我贬损等情绪体验。卢梭在《忏悔录》中回忆自己当仆人时，明明是自己偷了主人家的东西，却硬是要嫁祸于人，



对一位女仆进行诬陷，这件坏良心的事情让他痛悔终生。“辱”是外在的，它的原意是黑色，后引申为不干净、玷污、污秽、侮辱等，是指来自组织、他人等外部力量，通过言语或行动对人的的人格贬损。如韩信所受的来自于屠夫的“胯下之辱”，司马迁所受的来自于汉武帝的“宫刑之辱”等。

人们常因外在的辱，生内心的耻。“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对于军人而言最大的羞耻来自于战败之辱。如当年楚汉之争中的项羽，垓下兵败，不肯东渡乌江逃生，能够洗刷战败耻辱的仿佛只有自己的血水。他在自刎之前感慨：“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sup>1</sup>反常的情况是，有极个别的人，虽然有外来的侮辱，但在其内心却没有产生多么深的耻感。鲁迅讲过一个无耻乞丐的故事，乡下有个阔佬，许多人都想攀附他，以同他谈过话为荣。一天，一个乞丐喜形于色，说是阔佬同他讲话了。许多人围住他，追问究竟。他说“我站在门口，阔佬出来了。他对我说：‘滚开去！’”这个乞丐就是缺乏基本的耻感，甚至以耻为荣了。

## 2. “羞恶之心，人皆有之”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一位弟子在家里遇到一个盗贼，他对盗贼讲了一番老师关于“致良知”的道理，说无论圣人还是盗贼，人人都有良知，满街都是圣人。盗贼纳闷，不解地问道：“贼还有什么良知？我的良知在哪里呢？”王阳明的这位弟子并不急于作答，却要求盗贼把衣服脱下来。贼虽不明白，但还是脱了。当脱到最后一件时，他犹豫了，明显有些不好意思。这时候，王阳明的弟子便告诉他：“这就是你的良知。”

1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

关于盗贼的良知，王阳明这样说道：“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知不当为盗，唤他做贼，他还忸怩。”<sup>1</sup> 王阳明和他的弟子在告诉人们，即使是为人所不齿的盗贼，也有良知，也有羞耻心，更何况其他的人呢？

的确，追求荣誉、避免耻辱是人的自然性情，是人之常情。在权力、财富、才智、道德、声誉等方面达到理想的高度，得到社会的承认和赞许，是人生追求的重要目标；同时，人们又在尽力避免被否定、被责备、被羞辱的境地。

儒家对于人的“好荣恶辱”本性表示高度的认同。一方面，关于对荣誉的追求，儒家认为人们都希望有好的名声，君子尤其如此，希望通过“立德”“立功”“立言”来追求不朽的声誉。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sup>2</sup> 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到死还没有一个好名声，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另一方面，关于避免耻辱，儒家强调“愧耻”“有耻”“羞恶之心”，重在发掘、培育人的知耻之心达到良好社会秩序的实现。孟子认为人都有“羞恶之心”，这是一种人性本能，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外部力量强加于人的。追求荣誉、避免耻辱是人的自然性情在荀子那里被表述为“好荣恶辱”，无论君子还是小人，都是一样的。

说到荣辱，就不能不说“脸面”。有人说，中国人是活在自己的“脸面”里的，“脸面”意识是支配中国人社会生活世界的一个核心观念。“脸”代表的是一个人的道德名声，“面”代表的是一个人的社会成就。“脸”是社会对一个人的道德声誉的要求，关系到个人

1 王阳明：《传习录》。

2 《论语·卫灵公》。

的道德人格。“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一个人若是没了“脸”，就意味着这个人没有起码的羞耻感，会为人们所不齿，就难以在人群里立足。而“面子”代表的是一个人的声誉、威信，是社会个体凭借其权利、财富、才学等社会成就而赢得的名声，体现了社会对个体的认同与肯定。“脸”是“面”的前提，因为道德是做人的基础，有了做人的道德底线，在这个基础上建功立业、有所作为，那就是“锦上添花”，一个人就会赢得众人的尊敬，就会很有“面子”了。

### 3. “仁则荣，不仁则辱”

既然人人都追求荣誉，那么，如何才能如愿以偿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搞清楚荣誉的基础究竟是什么。

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sup>1</sup>即如果不具备仁爱的美德，君子就不可能成就其美名。孟子更为明确地说：“仁则荣，不仁则辱。”<sup>2</sup>康德认为，人生的荣誉只有一种，那就是对道德律的尊重。三位哲人的思考如此惊人相似，再明白不过地告诉我们，荣誉必须以道德为基础。

《左传》记载，主管鲁国外交的叔孙豹出使晋国时，晋国执政范宣子问他，说自己的宗族自尧舜以来一直香火不断，而且代代做大官，这算不算古人所说的“死而不朽”？叔孙豹回答，世代都是贵族，子孙都做高官，这只能叫作“世禄”，不能叫作“不朽”，真正的“不朽”是“立德”“立功”“立言”。他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sup>3</sup>“三不朽”与美德、才能、

1 《论语·里仁》。

2 《孟子·公孙丑下》。

3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知识有极为密切的关联，即以仁“立德”，以才“立功”，以知“立言”。叔孙豹的“三不朽”之说，就是主张把荣誉评价建立在内在的美德、才能、知识基础之上，而不是外在的金钱、权势、出身等。

关于荣誉的基础问题，荀子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他认为荣辱可以分为内在和外在两方面，内在的荣辱即“义荣”“义辱”，外在的荣辱即“势荣”“势辱”。荀子主张做君子就要追求“义荣”，注重自身内在的意志、品德和智慧；同时不能有“义辱”，不能贪婪、淫邪、无礼、傲慢。“势荣”是指来自外部的功名利禄，“势辱”是指外在力量对于个人的身心打击。“义荣”“义辱”完全可以由个人的修养和意志所能把握和决定，而“势荣”“势辱”不是完全由个人的修养和意志所能把握和决定的。君子应当以“义荣”为荣，以“义辱”为耻；而不必以“势荣”为荣，也不必以“势辱”为耻。

古人思想对于我们的启示是，要追求“义荣”，即以美德、才能、知识等为荣，美德、才能、知识等能够促使人的内涵更加丰富、更加完善，其境界或高度主要是依靠个人自身的修养、学习、磨炼来达到的，与外在的金钱、权势、出身等因素没有必然联系。而“势荣”是不值得崇尚的，因为财富、权势、出身等因素是外在于人的，与美德、才能、知识没有必然关联，不具备充足的道德价值。

出将入相、金玉满堂、树碑立传者都不是“不朽”声誉的标准，能够称为“不朽”的，是那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sup>1</sup>的人，是那些“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是那些“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的人，是那些“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1 张载：《张子语录》。

## 4. 荣辱观：一种价值共识

荣辱问题说到底价值评判、价值选择问题，这就是说，价值观对荣辱观有决定作用，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荣辱观。从个人层面上讲，一个人引以为荣的，就是其认为有正面价值的；一个人引以为耻的，就是其认为有负面价值的。从社会层面上讲，社会给予某个人或者某个组织以荣誉，说明该个人或者组织的思想、言行符合社会的主导价值；如果社会给予某个人或者某个组织以贬斥甚至惩罚，说明该个人或者组织的思想、言行与社会的主导价值背道而驰。

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必然有其主导的价值标准，个体价值观念与社会主导价值标准之间的契合度就是衡量社会稳定程度、社会道德秩序的重要指标。二者之间的契合度越高，表明这个社会越成熟、越稳定，道德秩序越好。

我们尊重价值选择的多样性，但这绝不等同于任由各种价值观杂乱无序地发展。“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这是系统论揭示的一个基本原理。社会也是如此，“人多力量大”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这个群体的成员有共同的信仰和目标，这种共同价值观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软力量”，是社会的“凝固剂”，是人们的“精神支柱”，它能够对于社会关系和人们的行为进行有效调节，把处在分散的、相互竞争甚至分裂状态的个体或部分凝聚在一起，增进情感，弥合伤痛，统一意志，共同行动。相反，一个组织，如果人人怀异志，各自为阵，那就是一盘散沙，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即使人数众多，也不会形成什么正能量，相反倒会因为内在张力或矛盾消解组织力量。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当今在中国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念，其基本内容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之一，社会主义荣辱观贯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是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也体现了家庭生活、职业生活、社会公共生活中公民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是从总体上对社会主义社会主导价值体系的生动表述。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价值整合功能，为全体国民提出了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构建了具体的坐标参照，社会、个人都应该把“八荣”“八耻”作为一种最基本的价值共识，以此来区分最基本的是非、善恶、美丑界限，逐步实现对多样价值的整合，矫正紊乱、错位的社会价值观，规范道德行为，增强社会凝聚，引领社会风尚，促进社会和谐与文明发展。

## 二、“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

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千姿百态，古今中外的荣辱文化也呈现出不同的文化色彩。扫描东西方的荣辱文化，我们会发现，东方的“耻感文化”具有不同于西方“罪感文化”的特色。

## 1. 骑士精神与绅士风度

“职责、荣誉、国家”，这是美国西点军校校训。这则校训里的“荣誉”渗透着西方军人群体的职业崇高感，而这种崇高感的背后是西方社会自古就有的一种挥之不去的理性精神，这种精神在古希腊表现为公民对城邦的效忠，在欧洲中世纪演化为骑士美德，在资本主义时代则升华为绅士风度。

古希腊文明是欧洲文化的摇篮，是人类轴心文明时代盛开的一朵灿烂的文明之花。古希腊人的荣誉观念是人类在奴隶制时代产生的，其核心精神是维护城邦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利益，城邦利益是古希腊荣誉观念的基础。古希腊道德教育的最高标准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为国捐躯、无上光荣。在希腊人的心目中，每个公民的崇高职责就是顽强训练、提高本领、英勇作战、效忠城邦。雅典人满18岁时所做的公民宣誓中有这样的内容：“我决不使神圣的武器受到侮辱，我决不在战斗中抛弃同伴，无论是一个人，还是和许多人在一起，我都要保卫一切神圣的与崇高的事务，我将不是削弱而是扩大祖国的威力与荣誉。”古希腊政治家、“七贤”之一梭伦把战死疆场的英雄泰洛斯看作最幸福的人，雅典人在他阵亡的地点给他举行了国葬，并给了他很大的荣誉。

古希腊人崇尚人体的健美，认为健美的人体是大自然中最美的形象。他们认为理想的人物不仅在精神上要善于思考、意志坚定、感觉灵敏，而且在身体上要血统纯正、发育良好、体格匀称、身手矫捷。古希腊人欣赏追求发达的肌肉、匀称的体型和优异的身体素质，以及从这种健美之躯内迸发出来的巨大力量。古希腊人将肌肉松弛和虚弱多病的人视为缺乏高级精神生活的人，身体肥胖的人被认为是

缺乏教养，甚至被耻笑为“自己肚子的奴隶”。为此，他们崇尚体育运动，几乎每个自由的公民都到练身场去接受训练，尤其是那些贵族，他们认为只有到练身场去受过训练的人，才算是有教养的人，否则就要将他们归入做手艺和出身低微的人的行列。

古希腊人对于他们的战争中的英雄以及竞技会上的优胜者非常崇敬，认为他们是宙斯喜欢的勇士，是城邦强大力量的象征。古代奥运会上的优胜者在他所属的城邦以至整个希腊都享有崇高的声誉，角逐的胜利被视为城邦精神的最高体现，这种荣耀甚至不亚于战争的胜利，人们为英雄献上野橄榄枝编成的花冠，诗人欣然为城邦的英雄写下颂歌，人们建造“胜利门”和“凯旋街”欢迎英雄们荣归故里。而对于战场上临阵脱逃或者缴械投降的行为被视为奇耻大辱，有一种由斯巴达女子表演的歌舞，就是用来讽刺挖苦这些懦夫的。

欧洲中世纪是以骑士为标志的英雄时代，骑士是社会的精英，骑士制度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状况。骑士能够以马匹装备为封主参战并接受册封，他们自于来自贵族和富裕农民，拥有军事采邑。要想成为一名骑士，需要接受骑术、剑术、投枪、狩猎、游泳、吟诗、弈棋等多方面的技艺训练，需要经过多重严格的考验。因此，获得骑士称号本身就是一种荣誉，一个人成为了骑士，全家人都会感到光荣。许多国王都以成为骑士而自豪，如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德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等。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著的《英语国家史略》中说，在十字军征战中，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以国王的身份在骑士的队前冲锋陷阵，为上帝所赞同的光荣事业而奋斗，这一切都使他扬扬得意、自我陶醉。

骑士作为军人，被视为“上帝在世间的战士”，他们为基督教



会而战，为国王或领主而战，为获得崇高荣誉而战。骑士提升自己声誉的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在战斗中战胜对手，对手是其获得荣誉的必要手段。骑士视荣誉高于生命，他们不惜以决斗方式来维护自己的荣誉。中世纪的一部文学作品中这样写道：“我是一名骑士，骑马出行，寻找一个男子，像我一样武装起来，愿与我格斗。他要是能打倒我，就会提高他的声誉；我要是能战胜他，就会被看作英雄，我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尊敬。”在《罗兰之歌》这部歌颂骑士精神的名著中，罗兰宣誓为光荣而生，不愿屈辱而生。

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充满侠气的骑士渐渐隐退，风度翩翩的绅士文明登场。一提到绅士，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英国，因为绅士的起源在英国，英国的男士最有绅士风度。绅士的礼帽、燕尾服、文明棍代替了骑士的头盔、铠甲和刀剑，实现了欧洲男性的“文明转身”，但在贵族精神的延续上，骑士与绅士是一脉相承的，绅士们身上有着难以抹去的骑士精神，上帝是二者不可动摇的共同信仰，贵族气质是二者共有的生命底色，刚毅坚韧、尊重女性、保护弱者等是他们共同的卓越品质。就对荣誉的珍爱程度而言，绅士虽然不再像骑士那样会为荣誉而与对手决斗，但他们对于荣誉的追求并不逊色于前朝的骑士。在英国的绅士文化中，“一个为留下好名声而勤奋做事的人”，是完全可以被视为绅士的。

绅士的荣誉来自出身和品质两个方面。绅士属于社会上流阶层，显赫的出身是一种荣誉，但拥有骑士精神品质更是一种荣誉。在《韦氏在线大辞典》中，“绅士”一词有四种解释，即指“出身高贵的男士”“拥有田产的贵族男士”“出身高贵又有骑士风度的男士”“无须为生活劳碌奔波的闲汉”等。19世纪以后，人们不再根据财产、血统、所佩戴的徽章来确认一个人是否是绅士，绅士的荣誉主要来

自其精神特质，其精神特质表现为绅士风度，即优秀男士所表现出的卓越品质与高雅气度。现代社会所理解的绅士是指那些衣着得体、谈吐高雅、为人谦和、彬彬有礼、含蓄深沉、宽容大度的人。在1852年出版的《大学理念》一书中，作者约翰·亨利·纽曼把绅士定义为“从来不会给别人带来痛苦和麻烦的人”，认为真正的绅士总是会关注所有同伴，和蔼地对待害羞者，温和地对待陌生人，仁慈地对待可笑之人。

## 2. 《忏悔录》的启示

“罪恶是丑陋的，我却爱它，我爱堕落，我爱我的缺点，不是爱缺点的根源，而是爱缺点本身。我这个丑陋的灵魂，挣脱你的扶持而自趋灭亡，不是在耻辱中追求什么，而是追求耻辱本身。”<sup>1</sup> 这一段文字是古罗马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在上帝面前的自我拷问，他留给后人的《忏悔录》已经成为西方罪感文化的象征。

在希伯来语中，“罪”的原意是“未中靶子”“超越界限”“违背”等。在基督教文化中，“罪”的意思是逃避上帝，与上帝相疏离，偏离了对上帝的信仰，把低等欲望的追求提升到终极关怀的高度。罪感文化的思想根源是人性恶，在基督教看来，从人的本性上讲，每个人都是有缺陷的，只有上帝是完美的。在人性之中的低等欲望的支配下，为世俗名利、享乐所诱惑，人以自我为中心，滥用自我意志，把自己当作神，顺从自己的私欲，逾越神的地位，违背上帝规定的戒律，对上帝表现出冒犯与不敬，这便是对上帝犯下的罪行。基督教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的观念是“生而有罪”，这一观念源自《圣经》的“创世纪”。根据上帝创世说，亚当和夏娃是人的始祖，在

1 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9—30页。

一条蛇的引诱下，他们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违背上帝的旨意，对上帝犯下罪行，被逐出伊甸园。这就是与生俱来的“原罪”，即人的始祖有罪，世世代代、子子孙孙便“遗传”了此罪。除了“原罪”，人还有“本罪”。奥古斯丁认为，“本罪”就是“现犯罪”，是人实际做出的犯罪行为，包括邪恶、贪婪、嫉妒、诡诈、争竞等。

无论是“原罪”还是“本罪”，基督教文化都认为结果必然是害人、害己、害上帝。既然有了罪，人就应该对自己的罪行感到羞耻，就要对上帝表示真诚的忏悔；罪人只有“良心发现”，并向上帝发出内心的忏悔，才能得到上帝的怜悯和宽恕，在上帝的恩典中获得救赎。《圣经》中说：“假如我们说自己没有罪，那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假如我们承认自己有罪，上帝是公正的，他必宽恕我们的罪过，洗清我们的一切罪过。”<sup>1</sup>《圣经》中还说：“遮掩自己罪过的人，必不成功。无论是谁忏悔和放弃罪过，都将得到宽恕。”<sup>2</sup>忏悔既是“悔过”也是“自新”，是人在懊悔、自责的同时，寻求走向理想自我的希望。

由此，西方文化在基督教文化熏陶下，自然就产生了深厚的“赎罪”理念。赎罪成为了一种绝对的必要，成了人的最大的甚至全部的使命，成为不可推卸的责任。人生的价值在于赎罪，一个人所赎的罪越多，就越有价值，就会成为上帝的“选民”，享有品德高贵的荣耀。

上帝其实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是社会道德规范以及其他社会规范的神化形式，是潜藏于人内心之中的良知的一种外化。所谓罪

1 《圣经·约翰一书》。

2 《圣经旧约·箴言》。

感，其实是把人彻底地、永久性地置于基于有罪而决定的谦卑状态，依据良知不断地忏悔与自省。

罪感文化的前提是，将自己实际做过的一切行为，不论事实上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均视为自己自由意志的结果。基督教文化也讲人的罪过，认为人生来就有罪，在有罪这一点上，人是无可选择的，是不自由的。在上帝面前，人是没有能力凭自己的本性来审判自己并净化自己心灵的。当然，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同理性主义的负疚意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罪感”。宗教“罪感”是他律的，理性人性论的“罪感”是自律的。

### 3. 日本武士的牙签

2008年9月，日本毒大米事件曝光，举国为之震惊。日本农林水产省发表的声明称，三笠食品公司将制造工业胶水的含有高致癌性物质的有害米当作食用米来出售。时隔不久，三笠食品公司的代理商中川昭一在家中自杀。据查自杀的原因是他所经营的公司曾将50吨问题大米卖给了奈良县两家点心公司。中川昭一的自杀，可看作是日本耻感文化的某种写照。

日本国民普遍极端自尊，在乎名誉，害怕受人侮辱、被人嘲笑。德川幕府时代，日本武士为了维护自身的“体面”，即使到了要靠借债度日的程度，也不得从事生产和商业活动；即使缺衣少粮，更没钱买肉吃，也一定要在嘴边叼一根牙签，告诉人们自己是属于“食肉者”阶层，这便有“武士饿肚子也要叼根牙签”的谚语。武士剖腹自杀是日本耻感文化的极端表现，武士如果战败，或者做了其他特别对不起主人的事情，就会以剖腹自杀来洗涤自己的耻辱，从而

维护作为一个武士的尊严。如果被领主赐予剖腹，则是一种荣耀，因为比起被处决而死，这种死亡的方式是体面的、有尊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海军的一艘军舰受到鱼雷攻击，官兵不得不弃舰时，他们不是仓皇蹿跳，而是以最标准、最出色的姿势转移到救生艇上，这样做是为了不被耻笑，因为他们必须具有和武士精神匹配的风度。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日本文化带有鲜明的耻感特征。在《菊花与刀》一书中，她说：“耻感在日本伦理中权威的地位与西方伦理中的‘纯洁良心’‘笃信上帝’和‘回避罪恶’的地位相等。”<sup>1</sup>如果说“罪感文化”依靠内心的罪恶感来规范人的行为，“耻感文化”则是外在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在这种文化环境中，人们都很在意世人对其行为的评价，“别人的评价”是其人格塑造的主要动力，一个人的生存价值取决于他人的承认、群体的肯定、权威的赞赏；知耻是最高的德行，羞耻是道德的原动力，它源自于破坏规矩而造成的内心的失衡感。

一般说来，日本人做错了一件事情，如果没有“东窗事发”，他就没有感到羞耻，也就等于没有做错事，不必坦白和忏悔；如果错事被众人知道，被“千夫所指”，他才会感到羞耻。日本人耻辱感，常常并不是因为自己做了不光彩的事情，而是因为自己所属的团队出了丑闻，或者自己给自己所属的利益团体带来了不光彩的丑闻。1912年的泰坦尼克沉船事件中，一个名叫细田正文的日本男性乘客假扮成女性，混在一群妇孺之中，捡回一条性命。上岸之后，无法掩饰自己性别的他被记者盯上了，于是，他的“事迹”举世皆知，整个日本也知道了他的丑闻。他让自己的民族感到耻辱，自己的“幸

1 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吕万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55页。

运”成了国家的悲哀。回到日本之后，谴责信如雪花般飞来，武士身份被取消，他也被解雇，在无尽的耻辱中度过余生。

日本文化的耻感不同于中国文化以“仁义”为基础的道德“自省”。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认为，在日本文化中，善人不是指追求崇高理想、为改善人类生活而不懈奋斗的人，而是指那些顺应秩序、服从权威、拘泥于世风和义理的人。本尼迪克特认为，通观日本历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辨认恶的能力，或者他们不想解决恶这个问题。可以说，在日本人的道德观念中，是非原则、善恶区分是模糊的，而对于名誉的追求则凸显出来。为了名誉，人们可以不顾事实，可以不辨善恶，可以不择手段。

日本文化的耻感也不同于基督教文化以忏悔为标志的灵魂“拷问”。本尼迪克特说：“有的民族中，名誉的含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这里，即使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有罪恶感。”<sup>1</sup>日本人则不是这样，在他们的观念中，一个有了过错的人，即使是当众认错，或者表示忏悔，都不会得到解脱，只不过是自寻烦恼而已。据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书分析，在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战败的15年中，作为个人，日本没有一个战争责任者，即如果有错，大家都有错；一亿日本人有错，每个人的过错就是一亿分之一，也就无所谓有过错，也就不必去忏悔。这样就可以理解，德国总理能够在波兰“二战”被屠杀的犹太人墓碑前下跪，而日本则通过“修订”历史教科书等方式屡屡掩盖其历史上的战争罪行。

日本人的耻辱感在于落后，在于战败，在于不如他人先进发达。

---

1 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吕万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54页。

“强者为王”，对于曾经给自己带来耻辱的强国，日本人能够放下自尊，转而向“施辱者”强国学习，把失败的耻辱转化为追赶以至超越的动力。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日本在与唐朝军队的白江口之战中战败后的“唐朝化”，也能够理解日本近代被美国炮舰轰开国门后的“美国化”。

相对于西方的“罪感文化”，一些研究者认定中国文化从一个侧面看也带有“耻感文化”特征。中国传统文化的性善理论已从根本上确定了人本质上是善良高尚的，这就排除了人的真正根本的负罪意识。中国文化中少有西方那样的罪感，也就是说，德性人性文化使人无从产生真正的“罪感”，道德约束力往往不像西方理性人性文化传统那样，强调依靠理性内在自律的力量。本心是道德的，而不道德的行为往往来自外在干扰或自己的“不小心”。在人们内心深处，性善论教给人们的是自信，“人人可以为尧舜”的论断，人皆有一个好本质，那么罪错从何而来？从外在。性善论者主张“君子慎其独”，每日“三省吾身”，都是指要注意排除一切不由自主的邪念，防“心中贼”。同时，东方特有的“熟人社会”环境也给每个个体施加了诸多“群体”目光和舆论压力，人们承受不了生活于其中的“群体”嘲笑或鄙视的重负。总之，西方“罪感文化”中的道德反省，和中国“耻感文化”中的群体生活的道德约束，基本路数是有所不同的。可以说，中国性善论和群体生活基础上的道德约束力，更多的来自外在群体环境而不是内心自责。

### 三、行为的底线在哪里

人们呼唤社会的良性秩序，而良性秩序的实现，一方面靠的是

人们对于崇高道德的敬仰，另一方面靠的是人们对于道德底线的坚守。如果为官者不把清廉作为准则，腐败、不作为、乱作为，这样的官员就丧失了底线；如果经营者不思产业报国的使命，敢于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大肆污染环境，绞尽脑汁去偷税漏税，这样的商家就丧失了社会责任的底线。面对诸多社会乱象，我们不禁要问：行为的底线在哪里？如何才能守住社会的道德底线呢？

## 1. 价值错位之种种

有调查表明，在当今中国虽已呈现出价值错位的诸多社会现象，但还不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还远没泛滥成灾。但即使如此，也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归纳起来，林林总总价值错位现象主要是三类，即善恶不辨、美丑不分、是非不明。

扬善抑恶历来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如今却出现了一些善恶不辨的现象。一类是不讲道德，置善恶于度外。个别文人斯文扫地，争论问题不是相互尊重，以理服人，而是公然在网上“约骂”以至“约架”，如某学者与某记者，“不择词汇”地打“嘴仗”觉得不够解恨，还升级为“约架”，双方大打出手，实在让人觉得其形象和“学者”“记者”等有文化的身份完全不符。另一类是“嘲笑道德”的现象，一些人贬低道德的价值，甚至认为道德毫无价值。讲道德本是一种善的要求，但当讲道德的人成了被嘲笑的对象时，这说明嘲笑者已是善恶不辨了。如郭明义曾被人嘲笑为“郭傻子”，因为他自己工资并不高，却把钱捐给别人；矿上几度福利分房，他一次申请都没有提交过，总是把机会让给别人。还有一类现象是“斥责道德”。当人们用道德的舆论力量对不道德的社会现象进行批判的时候，有人会反过来倒打一耙，指责批判者是站在“道德高地”



之上任意挥舞“道德大棒”的“道德伪君子”。

有人说，这是一个“审丑”时代，谁最能丑态百出，谁就最能吸引眼球。一些人为了出名不择手段，甚至做出一些无良不雅之事，但常常人气不降反升。这种怪现状被称为“审丑”。以公关公司炒红网络名人作为例，“审丑”游戏是这样玩的：首先要有丑闻，没有丑闻就要主动制造丑闻，如网上频频出现的主动或被动“走光”事件。他们信奉的原则是，“不怕坏新闻，就怕没新闻，不怕有人骂，就怕没人理”。媒体在“扬丑”的过程中，有更多的丑闻被制造出来，有更多热衷于追星逐臭的媒体加入进来，有无数的“热情”公众五花八门的“热议”，把丑闻炒热。当丑闻主角因为臭名远扬而成为“公众人物”、成为大众眼球吸引者的时候，嗅觉敏锐的商家立刻明白，“臭名也是名”，“丑角”们身上有值得开发的巨大“名人效应”和商业价值。许多丑名主角参加商业活动的出场率和出场费会因为丑名而身价倍增。对此，有人比照诗人北岛的那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发出了“丑闻是丑闻制造者的通行证”的感叹。在此，人们看到的是美丑观念的扭曲。无论是“丑角”还是围绕“丑角”的包装团队，出名是硬道理，出了名就有一切。越丑越臭，就越吸引“眼球”，就越有身价。在此强烈的出名冲动、发财冲动之下，“审丑”游戏的参与者们美丑不分，以丑为美，道德的底线一次次地被轻易突破。

比上述善恶不辨、美丑不分现象更让人忧虑的是，部分人的是非观念出现了问题。穷凶极恶的公安部A级通缉犯周某在网络上会被个别人昵称为“爆头哥”。汶川大地震中，正在上课的某中学教师在地震危险来临之际，置课堂上学生生命于不顾，自己最先逃之夭夭。事后该教师不仅没有为自己行为感到羞耻，反在网上为自己

行为辩解，称自己对此“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社会舆论对这种违背职责的现象表达了谴责，但也有一些言论表示理解，甚至反对对这种恶劣行为进行道德批评。与个别人的善恶不明相比，个别组织的是非不辨更值得让人关注。2011年，某县相关部门花费数十万元为当年的日本“开拓团”立碑树传，实在是匪夷所思。种种此类，都表现出社会中有一些人美丑、善恶、是非不明不辨，表现了某种社会价值观的错位。

## 2. 价值观漂移或扭曲的根源

市场运行中有一种现象叫“劣币驱逐良币”，当一个国家同时流通两种实际价值不同而法定比价不变的货币时，实际价值高的货币总是被熔化、收藏或输出而退出流通领域，实际价值低的货币则充斥市场。此法则所揭示的实际上就是价值扭曲现象，即社会生活领域中价值不高的东西往往会把价值较高的东西排挤出局。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认为，在一个人人都偷窃的国家里，唯一不去偷窃的人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这叫“坏人驱逐好人”。在一个腐败盛行的官场上，洁身自好、独善其身的官员总是处于被排挤、受打压的境况，使得廉吏越来越少，污吏越来越多，这是“清官淘汰规律”。在公交车候车点，不守规矩、捷足先登的人往往能够抢得到座位，而遵守秩序、排队上车的人甚至连上车的机会都可能丧失掉，久之，规矩排队上车的人会越来越少，争先恐后抢先上车的人会越来越多。同样，如果追求道德荣誉的人得不到现实社会的荣誉肯定，而那些爱慕虚荣，甚至不讲廉耻的人却能够在世俗社会博位“出名”，如果社会不扬善抑恶，如果人们丑不丑，恶不恶，是非善恶混淆，没有社会道德底线，长此以往，追求真善美荣誉的人

就会越来越少，由此造成荣誉与耻辱的“二律背反”。

“劣币驱逐良币”之类的荣辱悖论，虽然不是现实生活的主流，却是实实在在的危险，反映出价值观上某种程度的混乱，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价值观出现的问题和我国社会的巨大转型背景相关，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发生了长期的、深刻的，甚至是剧烈的社会转型，包括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专制制度到民主制度的转型等，与此相适应，文化形态、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也在不断变化。转型就意味着不确定、不稳定、不成熟，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和巩固，其间必然会存在和产生很多发展中的价值观“过程”紊乱状态。物理学上的“熵原理”给我们的启示是，处于变动中的事物，因为“熵增”“熵减”的变化，事物会有一个从有序到无序，又从无序到新的有序的过程。比利时物理学家普利高津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就专门对事物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过程做了说明。按照普利高津的这种系统论看，社会价值观从无序向新的有序发展，不是一蹴而就，一定需要有一个过程。

在一个世纪的历程中，我国发生的根本性道德变革有三次：第一次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文化、新道德对于旧文化、旧道德的批判；第二次是无产阶级道德代替以往剥削阶级的落后道德而成为道德观念的主导；第三次是市场经济新价值观对于原有道德观念的冲击。改革开放过程中，原有传统价值观被打破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道德价值观还在构建中，各种思潮如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物质主义、唯利是图等各行其道。社群主义

代表泰勒指出，现代性发展带来的隐忧有三个方面：一是个人主义价值观扩张，人们遵循个人利益至上的原则，不再接受超越于他们之上的所谓神圣秩序，不再依照神圣价值的要求行事；二是物质主义价值观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生活的真正价值被物质所遮蔽；三是由于技术主义价值观的蔓延，人被嵌入技术化的社会结构之中，人们处于公共事务的兴趣和能力在下降，人成为了“封闭在自己心中的单子”。

越是在社会转型期，我们就越要重视对人们荣辱观念的引导。中国古代春秋末期是社会制度剧烈变革的时期，“礼坏乐崩”是当时基本的社会现实，甚至出现“臣弑君”“子弑父”等现象，是一幅“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图景。孔子就生活在那个时代，他倡导“克己复礼”，希望社会回到遵守周礼的秩序之中。在大致与孔子同时代的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对雅典造成了巨大灾难，人们曾经推崇的道德观念也发生了动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混乱和危机，传统道德以惊人的速度走向堕落。苏格拉底质问道：“你是一名雅典人，属于这个因其智慧和力量而著称于世的最伟大的城市。你只注意尽力获得金钱，以及名声和荣誉，而不注意或思考真理、理智和灵魂的完善，难道你们不感到可耻吗？”<sup>1</sup>他在雅典到处找人谈话，启迪人们的智慧，引导人们追求美德。

中国社会近30年来经历了重大的转型，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闭关锁国走向对外开放，人们的道德观念在许多方面表现出进步的特征，也在一些方面出现了令人忧虑的状况，如信仰危机、诚信缺失、贪污腐败、追求享乐等，一些人的荣辱观念模糊，甚至以丑为美，以耻为荣。因此，在中国社会迅速发

---

1 [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1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页。

展并发生巨大转折的时期，我们应该特别重视人们思想道德观念的转变，深入学习并切实实践正确的荣辱观念。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永远保持对于道德价值的诚敬。对某些基本价值心存敬畏，是践行社会荣辱观的一种前提。忠于人民和祖国、尊崇法律和道德等，都应是我们所追求的基本价值，是我国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准则。我们社会提出的“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等，就是对这些基本价值的确认。需要关注的是，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市场经济发展，一些人的信仰出现“空场”，社会核心价值在他们心中已无任何神圣性，心态浮躁，行为粗野，贪婪追逐个人利益和个人享乐，为此不惜践踏法律与道德，不惜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重新塑造人们的精神信仰，树立基本的荣辱与是非观念，使人们对道德价值心存敬意，以自己的行动维护社会核心价值，将此视为人生的荣耀，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必须而艰巨的任务。

### 3. 道德底线何以必要

德国哲学家康德有句名言：“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sup>1</sup>人必须有所敬畏，“头上的星空”是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心中的道德律”是对于良知的敬畏，就是对于道德底线的坚守。

所谓道德底线，就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不得逾越的行为界限，

---

1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0页。

表现为“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因为是“底线”，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角度出发，其规定就常以否定性的句式、命题来表达，如“不偷盗”“不欺人”“以危害祖国为耻”“以好逸恶劳为耻”等。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关于“八耻”的规定，就是当今这个社会每一个国民应当固守的道德底线，我们不得危害祖国的利益，不能有背离人民的倾向，不能停留在愚昧无知的状态，不能养成好逸恶劳、骄奢淫逸的恶习，不能做利忘义、损人利己、违法乱纪的事情。

底线道德所确立的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它不要求每个人都达到圣人、君子的道德高度，不要求人人都要有“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尧舜境界。底线的标准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都应当做到的。比如，我们不要求每一个出租车司机都像于凯师傅那样免费为福利院的孩子服务，但不拒载、不绕道宰客、不在灾害天气漫天开价等，这是起码的道德要求，也是基本的职责要求。我们不要求每个制药企业都像同仁堂那样有着至仁至爱的天下情怀，但是，保证药品质量、不危害人的生命健康是其道德底线，如果使用“毒胶囊”，制造假药劣药，那就完全超越了制药企业的底线，不要说道德谴责，法律也不允许如此跌破底线了。

道德底线是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最后防线，如果得不到遵守，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首先，对于一个人而言，没有底线就会没有良知、没有敬畏心，即使做错事、恶事也不会产生羞耻心和负罪感，这样的人会因远离基本德性而丧失“人之为人”的社会本质和社会品质。超越底线的行为一般来说也是违背法律的行为，在受到道德谴责的同时，往往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其次，对于公共生活而言，没有底线就没有秩序和安全。跌破道德底线的行为，会对他人利益、公共利益造成危害，正常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就会受到破坏。如果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受到部分人的破坏，即使这部分人是人群中的一少部分，其对社会秩序的破坏程度都会很大。它可以给他人和社会带来直接的利益损害，还会降低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度，使整个社会陷入规范秩序的混乱。

再次，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如果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得不到社会多数成员的遵守，这个社会任由丛林规则来支配，就必然陷入野蛮对抗和激烈冲突之中。那么，国家的整合，民族的凝聚，国际竞争的软实力，都会大受其损。从历史角度看，无论这个国家、民族曾经如何辉煌、如何繁荣，最终的衰落、败亡都是不可避免的，古罗马帝国的覆灭与其道德上的沦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坚守道德底线，需要每一个公民从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出发，从自我的基本人性品质出发，从最基本的事情做起，不做缺德人、缺德事，尊重并遵守社会道德规范。除了每个公民的自觉遵守，在全社会也要构建让缺德事“无路可行”的规范机制环境，形成对缺德人“人人责之”的舆论氛围。社会如此扬善抑恶，道德底线才会牢固，社会秩序、生活质量和国家发展才会更有保证。

#### 四、道德的人：荣辱观的个体构建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任务，要求“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风俗之美，在养民之耻。”没有

每个社会个体内在因素的作用，没有追求荣誉的冲动，没有知耻之心的养成，一个充满道德感的社会是不可能形成的。

## 1. 追寻美德，彰显“最美精神”

当代英国著名思想家麦金泰尔在其《追寻美德》一书中认为，随着近代以来社会的变迁，西方道德传统中的亚里士多德美德伦理已经中断，使得当今时代的道德处于严重的无序状态，为此，他呼吁要“回归亚里士多德”，“追寻美德伦理”。

当代的思想家为什么会呼吁要回归至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那里？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古希腊哲学和伦理学的集大成者。马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称他是古代的黑格尔。亚里士多德对人的德性品质做了极高定位，认为，一切德性都使其拥有者处于一种良好状态，它是人获得幸福的保证；人的伦理德性主要有勇敢、节制、慷慨、自重、温和、忠实、友善等，这些德性是在行动之中获得的，一个人不是先成为有德性的人之后再去去做体现德性的事，而是在做有德性的事的过程中成为有德性的人。

可以说，美德就是社会道德的内化，当良心、羞耻心、责任心在人性中扎根，一个人便有了美德，有了人之为人的资质。一个人如果知道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也理解遵守规矩的必要，但他不去自觉而且持久地践行，这些规矩对他来说永远是外在的，转化不成其内在的品德，这个人就不具有美德人性。更严重的问题是，“道不远人，而人自远之”，个别人不相信善，对道德的有效性、可靠性失去信任，缺乏道德责任感，这就是道德信仰的缺失，这样的人



与美德的距离更远。而社会中若远离美德成为普遍现象，则社会紊乱和衰败就不久远了。

美德的遵守往往意味着对于自身欲望的克制。当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发生矛盾时，美德要求每个人都克制自我欲望，不做唯利是图之徒，至少，决不能做损人利己的“缺德”之事。关于物质财富的欲望，孔子认为君子也有“爱财”之欲望，但一定要“取之有道”；如果获得财富的方式不符合道德准则，就应当放弃占有的欲念。一个诚实守信的商家，所卖的产品都货真价实，其成本肯定高于经销质次价高产品的不良商家，其所得的利润就会偏低，但出于良知他绝对不会去通过欺诈获取高额利润。

人们之所以要崇尚美德、践行美德，一方面是因为美德的遵守是社会整体和谐有序的基本保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德的遵守对其本人会有益处。个人之所以能够从美德中得到益处，首先因为拥有美德是一个人高贵品格的标志，是自己的灵魂超越世俗、获得宁静的保证；同时，拥有美德的人总是得到社会和他人的信任、赞许，信任和荣誉就是美德拥有者所积累的无形资产。拥有美德的主体，才能越走越远，其长远利益也才可能越做越大。同仁堂之所以历经300多年长盛不衰，与其所恪守的诚信经营之道有必然关联，即“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当今中国社会处于高速发展的变动时期，市场会有利益的追逐，会有急功近利的心态滋长，会有利己的欲望不断膨胀，世俗的功利、心气的浮躁会带来一定的喧闹以至紊乱。然而，人性的光辉也在闪烁，从“雷锋传人”郭明义、“最美妈妈”吴菊萍、“最美司机”吴斌、“最美教师”张丽莉、“最美战士”高铁成等众多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物

身上，我们看到了耀眼夺目的道德光芒。张丽莉在客车冲向孩子们的瞬间，一把推开学生，把生命的机会留给孩子们；吴斌强忍剧痛完成了一系列艰难操作将车辆停稳，保全了车上二十多名乘客的生命，自己却再也没有起来；高铁成在煤气爆炸的瞬间，三次闯入火海，最终被烈火烧伤……这些“最美英雄”和他们感人的“最美事迹”，彰显出忠于职守、爱国爱民、无私奉献、舍生取义的“最美精神”，是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个人核心价值观的卓越展现。

一个人如果坚信美德的价值与力量，能够以“高山仰止”的倾慕心态去敬仰道德楷模，以“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努力去追寻美德，以“锲而不舍”的执着精神去践行美德，最终必然会“修成正果”，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高尚的人性光辉的人。

## 2. 追求荣誉，拒绝虚荣

人是社会存在物，一个人需要通过自己的言行，得到来自社会和他人的正面评价，包括认可、关爱、尊重、赞许等，获得良好的名声，感受荣誉带来的成功和欣慰，甚至希望能够美名传扬，流芳万世，这都是人之常情。正因为此，自古就有雄心勃勃的帝王励精图治，力图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以期建立不朽的霸业；英勇的将士浴血杀敌，保家卫国，开疆拓土，立下赫赫战功；文臣期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哲人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今时代为人们提供的发展机会越来越多，让人们施展才华的舞台越来越大，我们只有积极地去建功立业，去赢得荣誉，才不会辜负了这个时代。

人要追求荣誉，但需要把握好荣誉之“度”和荣誉之“质”。孔子倡导中庸原则，主张“过犹不及”，要求人的言谈举止、所作所为要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不偏不倚。就荣誉而言，中庸原则的要求是，没有荣誉感是不适当的，过分追求荣誉也是不适当的。

缺乏应有的荣誉感，把人生的荣誉看得过轻，认为成败、荣辱、贵贱等都无所谓，不追求荣誉，甚至要超越荣辱，属于“不及”。如《列子》中所说的“乡誉不以为荣，国毁不以为辱”<sup>1</sup>，佛家讲的“于诸荣辱何忧喜”，南宋诗人陆游说的“心出是非外，迹辞荣辱中”等。“哀莫大于心死”，这是一种低落的情绪，是一种消极的姿态。古人社会中，有的人出于痛苦和失望，曾发出过无奈的叹息，这是可以理解的。而现在，我们处在一个文明开放、蓬勃发展的时代，如果我们对于人生缺乏光荣与梦想，没有生活的理想和激情，没有事业心和进取心，意志消沉，无所事事，最终只能是什么都没有作为，荣誉自然不会青睐这样的懒人和颓废之人。

与上面的“不及”状态相反，爱慕虚荣，就是荣誉感过于膨胀，不择手段地追逐荣誉，追求不实在的、不是建立于真实基础上的荣誉，沉溺于其中不可自拔，属于一种“过”。荣誉的真正基础是美德、知识和才能。一个人具有持久而良好的德性表现，一个人具有丰富的知识和卓越的才能，而且他会把知识和才能服务于社会 and 他人，这样的人才得到人们的赞许，会得到鲜花、掌声和奖励。相反，如果虚荣心作祟，官员通过数字造假来提高政绩，商人通过行贿有关部门获得产品或者服务质量的高等级认证，教授通过论文抄袭、伪造数据来制造学术成果，如此等等，用欺诈来骗取荣誉，这种荣誉的获取方式是可耻的，这是对于荣誉的亵渎。关键是，这样的“荣

1 《列子·仲尼》。

誉”一定是走不远的。

### 3. 坚守底线，“行己有耻”

中国传统耻感文化注重发掘建立于良知基础上的耻感，强调发挥人的道德自省能力，其中的“重耻”“知耻”“有耻”“养耻”等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选择，是中国传统荣辱文化的核心构成要素。

《清野史大观》中讲了一个关于“明耻”的故事。江苏吴江知县郭琇，出身寒微，奋发苦读，有济世安民之志。考中进士后，因没钱送礼，候补十年才做上个知县。在官场“染缸”的浸染之下，他把持不住自己，开始收受贿赂。东窗事发后，他遭到上司和百姓的谴责和鄙夷，深感无地自容，决定悔过自新。回到县衙，郭琇将书房“明志堂”更名为“明耻堂”，在衙门前贴出告示，说以前的郭琇已经死掉了，现在的知县是另一个人。从此，他以身作则，清白做人，清廉为官。在他的精心治理之下，吴江经济繁荣，民风淳朴，秩序井然。

古人的明耻之心和雪耻之举给我们有如下启示：

第一，知耻是做人之本。人有了知耻之心，其行为就会有一个底线，就不会突破这个界限；如果缺乏知耻之心，就会无视道德规矩，甚至无法无天，犯上作乱，无所不为。无耻是人生的“大不幸”，无耻之人与禽兽没有什么区别，不能被称为完全意义上的人。《诗经·国风·相鼠》中说：“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而人无耻；人而无耻，不死何俟？”就是明确地告诉人们，一个人如果缺乏知耻之心，就不配做一个人，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

和意义,这样的人连相鼠都不如,这样的人最好早些死掉算了。孔子讲“行己有耻”,就是做事时要有强烈的责任感、道德感,如果做不好就应当感到羞耻。《孟子·公孙丑上》中,孟子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sup>1</sup> 孟子认为“耻之于人大矣”,“人不可以无耻”<sup>2</sup>,他把“羞恶之心”看作“义之端”,即羞耻之心是道义感萌生的起点。正因为此,石成金这样说:“耻字乃人生第一要事。如知耻,则洁己励行,思学正人,所为皆光明正大,凡污贱淫恶、不肖下流之事决不肯为。”<sup>3</sup>

第二,廉耻是君子的“大节”。欧阳修把廉耻作为“士君子之大节”,也就是说,不讲廉耻就不配做“君子”,就只能被归入“小人”之列。正因为知耻之心对于君子更是至关重要,孔子倡导“行己有耻”<sup>4</sup>,《中庸》主张“知耻近乎勇”,《大戴礼记》讲“君子不贵兴道之士,而贵有耻之士也”<sup>5</sup>。王阳明以宅院和房屋来比喻圣贤之学,“道德以为之地,忠信以为之基,仁以为宅,义以为路,礼以为门,廉耻以为垣墙,六经以为户牖,四子以为阶梯”<sup>6</sup>,意在说明没有廉耻就成就不了圣贤之学。

第三,知耻是改过的前提。《王阳明集》中说,“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sup>7</sup> 知过则悔,进而改之,见贤思齐,不断达到更高的道德境界,这是一种建立于耻感基础上的道德修养模式。朱熹说:“知耻是由内心以生,闻过是得之于外。人须知耻,方能

1 《孟子·公孙丑上》。

2 《孟子·尽心上》。

3 石成金:《传家宝·人事通》。

4 《论语·子路》。

5 《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

6 《王阳明全集》。

7 王阳明:《传习录》。

过而改，故耻为重。”<sup>1</sup>在郭知县洗心革面、悔过自新的转变中，知耻是中心环节，正因为郭知县的良知没有泯灭，还有基本的知耻之心，他才会悔恨自己的过错，才会“金盆洗手”，产生出重新做人的勇气。如果郭知县毫无廉耻之心，那就只能一味地堕落下去，在耻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第四，知耻是治国之道。管子认为，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即知耻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支柱之一，“养民之耻”对于国家治理有重要价值。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sup>2</sup>孔子认为统治者依赖政令和刑罚管理社会，人们就会缺乏知耻心；如果依靠道德和礼制来管理，人们就会有较强的知耻心，社会就会有良好的秩序。龚自珍认为，如果全国上下都无知耻之心，则会国将不国。“农工之人，肩荷背负之子则无耻，则辱其身而已；富而无耻者，辱其家而已；士无耻，则名之曰辱国；卿大夫无耻，名之曰辱社稷。”<sup>3</sup>

#### 4. 知行合一，贵在“慎独”

人们经常感慨的“知易行难”，即认识一个道理是容易的，而实践这个道理很困难。许宗衡、周良洛等腐败官员口头上大喊反腐败，对自己的“清白”信誓旦旦，而在背后大肆搞腐败，收受贿赂、骄奢淫逸，没有丝毫的廉耻之心。很多人在观念认知上都明白荣辱的道理，但在道德实践上真正做到知荣辱很难。我们倡导“知行合一”，仅仅解决“知”的问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解决“行”的问题。如何走出“知易行难”的困境，实现“知行合一”的目标，一个重

1 《朱子语类》卷94。

2 《论语·为政》。

3 《龚定全集类编·明良论二》。

要的途径是要做到“慎独”。

所谓“慎独”，就是强调道德自律，恪守道德良知，以内心的道德力量抗拒外在的种种现实诱惑。《中庸》说道：“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每个人都要敬畏天地，敬畏良知，一个人做坏事的时候，不要认为密不透风，神不知鬼不觉，上天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监督者”，人的良知是永恒的“审判者”，人的羞耻心是严格的“制裁者”。

承德避暑山庄里有个“四知堂”，这个命名来自东汉的杨震。据《后汉书》记载，杨震在赴任东莱太守途中，路经昌邑。当天晚上，昌邑县令王密为报答杨震的提携之恩，怀揣些金子想送给杨震。见杨震拒收，王密说：“现在是深夜，没有人知道这件事的。”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sup>1</sup>杨震堪称“慎独”的典范，他的“四知”给我们的警示是：任何一个人，无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要恪守内在的良知，克制不良的欲望，坦坦荡荡，规规矩矩，做到天地无私、问心无愧。

## 五、道德的社会：荣辱观的社会构建

孟德斯鸠认为，“共和国需要品德”，一个缺少良好道德风尚的社会，就如折断羽翼的鸟儿，注定无法展翅高飞。我们的目标是构建一个有高度荣辱感的社会，要在创造一个“仓廩实”“衣食足”的社会的同时，积极营造扬荣贬耻的社会氛围，构建扬荣贬耻的社会机制。

<sup>1</sup> 《后汉书·杨震列传》。

## 1. “衣食足”与“知荣辱”

战国时期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说：“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sup>1</sup>个人尊严与荣辱感的建立需要以较为充裕的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作为基础。如果物质财富极度匮乏，饥寒交迫，就会陷于野蛮的、无序的“丛林社会”境地，无暇顾及荣辱。俗语讲“笑贫不笑娼”、“穷山恶水出刁民”等，都说明了这个道理。孟子讲的“恒产”与“恒心”的关系也说明这个道理。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sup>2</sup>孟子论证的逻辑是，国家治理要“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sup>3</sup>。财富充裕之后，民众就不必担心“养生丧死”的担忧，理想的“王道”治理秩序就有望实现。相反，“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sup>4</sup>

物质文明的水平决定精神文明的水平，这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一个基本原理。人类一刻也离不开从外部世界获取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料，任何社会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之上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并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构建社会的上层建筑，由此而形成一定的社会有机体。没有物质文明作为基础，精神文明就只能是无源之水；物质生产不发展，精神文化必然会停滞甚至倒退。因此，要想建立一个有高度道德感、荣辱感的社会，我们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发展的成果让全民共享，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如

1 《管子·牧民》。

2 《孟子·滕文公上》。

3 《孟子·滕文公上》。

4 《孟子·滕文公上》。



果民生有了保障，人的基本尊严感就会呈现，人的精神境界就会得以提升，一个有道德感、荣誉感的社会就易于形成。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论”对这个道理做了更为细致的说明。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分若干层次，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的需求、自尊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等。通常说来，高层次的需求是在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便产生的，也就是说，人们在衣食无忧、安全得到保障之后，就希望被人接纳、关注、鼓励及支持，获取并维护个人自尊心，希望周围的事物井然有序，进而在精神上臻于真、善、美合一的境界。马斯洛认为，一个国家多数人的需要层次结构是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文化和人民受教育的程度直接相关的，发达国家致力于满足高层次需要的人数比例较大，不发达国家致力于满足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的人数比例较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给我们的启示是，一个人追求荣誉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自身需求层次不断提升的过程，因为人的基本的荣誉感很多时候是来自被人们关注、认可、接纳、支持、鼓励，高层次的荣誉感则是与道德的完善与境界的升华联系在一起的；要提升广大民众的荣誉感，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强调保障与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这必将为一个有高度荣辱感的社会的建立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 2. 从“富之”到“教之”

“衣食足而知荣辱”虽然有一定合理性，但是，“衣食足”并不必然导致“知荣辱”。我们希望的是“水到渠成”“水涨船高”，而一个让我们很无奈的现实是，“水到”了，“渠”并没有修好；“水涨”了，船并没有高上去；经济虽然发展了，人们的道德感、荣誉感并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更让我们感到痛心的是，在个别领域、个别地方，经济的发展与道德的沦丧如影随形。

在孔子的思想中，“衣食足”与“知荣辱”应该有个中介，此中介就是教育。《论语·子路篇》记载，孔子在他的弟子冉有的陪同下来到卫国，看着街上熙熙攘攘、往来穿梭的人流，他感到非常兴奋。冉有问老师：“这么多的人口，如果交给我们来治理，该怎么办？”孔子回答了两个字：“富之。”弟子又问道：“富了以后，该怎么治理？”孔子的回答还是两个字：“教之。”正因为教育的重要性，作为教育家的孔子才兴办私学，有教无类，广收门徒，并且因材施教，一直诲人不倦。在这个问题上，孟子的观点与孔子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孟子的主张是，在“制民之产”、保障其衣食无忧的同时，还必须要有“庠序之教”的跟进，使民众懂得“孝悌之义”，有基本的“是非之心”“羞恶之心”。

先哲给我们的启示是，仅仅发展经济是不够的，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教育是必要的。这里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经济与教育的关系。一个国家如果经济上一贫如洗，该国的教育无法“独善其身”。如果经济发展了，教育水平就必须得到足够的提高。甚至可以这样考虑，教育对于经济不仅仅是“紧紧跟进”，而是要适当超前。党的十八大报告把教育当作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

要求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这一认识无疑是极其明智的。

二是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就教育的内容而言，才与德、智育与德育从来是不可分割的，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知识的教育，同时要特别注重道德的教育。荣辱观念的教育是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荣辱观的教育，让人们牢固树立主导价值观念，深刻认识到正确与错误、高尚与卑鄙、善与恶、美与丑、荣与辱的界限。在中国古代，儒家把以仁义为核心的德性视为荣辱评价的基础，把荣辱与道德结合为一体，使荣辱打上深刻的道德印记。

### 3. “让高尚者高贵”

美国高尔夫球星泰德·伍兹的丑闻曝光后，这位昔日威风无比的“老虎”，顷刻之间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成了人们唯恐躲避不及的“瘟神”——教练与他提前解约，广告商不再请他做品牌代言，朋友们也纷纷离他而去。应该说，美国并不像它的汉文译名那么美，美国也存在种种丑陋，但国民整体道德素质以及在社会扬荣贬耻的社会机制构建方面，可能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提出关于荣誉与耻辱的基本观念，如果不想使之成为一纸空文，成为徒有其声的口号，就必须要有整套完善的社会机制来宣传和维持，使其在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地得以贯彻和弘扬。如果社会主流媒体在宣传倡导“以艰苦奋斗为荣”，而市场文化却在渲染和刺激人们奢侈消费、纵情享乐，让消费主义、物欲主义、享乐主义大行其道，就说明我们的宣传、

教育机制有明显漏洞。如果我们天天讲“以诚实守信为荣”，而现实中常常是“老实人吃亏”，这说明荣辱观的社会维护机制存在问题。

我们颂扬“尊老爱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为什么有人在感慨“十三亿中国人扶不起一个老太太”，为什么那么多冷漠的旁观者救不起一个“小悦悦”？南京鼓楼区法院对彭宇案的宣判表明了一些问题，法律机制的缺憾使“见义勇为”者有了更多的为难，彭宇的寒心让众多善良的人们对“善有善报”产生疑惑。在“见义勇为”的后顾之忧影响下，怎会有更多人“路见不平一声吼”？一个社会，当“卑鄙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者自然就找到了卑鄙的理由，就会继续卑鄙下去。如果社会机制不能有效扬善抑恶，就很难抑制缺德现象出现，社会道德大行其道也就缺乏相应的扶助。

美国学者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在其《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中说，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好人得不到好报，恶人受不到惩罚，却仍然要求人们无条件地讲道德，认为讲道德就是需要自我牺牲，那么，就会形成一个悖论，即“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实际的逻辑是，个人与社会是互相作用、相互影响的，一方面，“不道德的社会”生产出“不道德的人”，一个“奉公守法者寒酸，贪赃枉法者富甲；弄虚作假者升迁，据真稟实者遭贬；吹嘘溜拍者受宠，犯言直谏者被整；走前门正道者被拒，歪门邪道者得逞”的社会环境，必然会造就无良、贪腐等无耻之徒。另一方面，“不道德的人”还会制造出“不道德的社会”，一个社会里不讲道德的人越多，这个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就越低，维护道德的体制或机制就越缺乏。而两个方面构成的恶性循环，会对社会生活造成损害，会给国家、社会的发展带来诸多消极滞碍的因素。

马克思曾指出,“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sup>1</sup>我们努力建立健全让“善人得善报,恶人得恶报”的维护机制,目的就是在营造合理的、良性的社会环境。一方面,“让高尚者高贵”,要保护其在利益上不能陷于总是吃亏受损的局面,在社会声誉上有恰当的肯定和回报,让他们成为众人的榜样,得到众人敬仰。对诚信企业的表彰和政策给予,对德才兼备干部的优先选择,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实现常态化,让“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在央视隆重出场,这些都是在昭示道德的价值和荣耀。另一方面,社会应加大无耻行为的物质成本和精神成本,通过舆论的无情谴责、制度的严厉责罚,让卑鄙者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让贪腐者身败名裂,让假冒伪劣的制造者倾家荡产,让无耻者饱尝无耻带给自己的羞辱。

在构建扬荣贬耻的社会机制的过程中,要注重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让腐败者身败名裂。从政者的榜样效应对社会风尚有决定性的影响,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sup>2</sup>“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sup>3</sup>他将君子和小人的德性分别比作“风”和“草”,认为风朝哪个方向吹,草就往哪个方向倒。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切实抓好党员、干部的道德建设,“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以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sup>4</sup>“以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67页。

2 《论语·雍也》。

3 《论语·子路》。

4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

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带动政风民风。”<sup>1</sup>

如果这样一种“扬善抑恶”的社会舆论环境和评价机制得以建立健全，久而久之，我们社会就会形成一种良好的道德风尚。这一风尚一旦形成，就会具有巨大的渗透性、感染力、濡化性，对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思维模式、生活习惯等都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也一定会有助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是非观念、荣辱观念，激励人的荣誉追求，强化人的道德耻感。

---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

# 第六章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

——摘自十八大报告

---

历史将会记录，在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

——马丁·路德·金



十八大报告总结了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主要成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同时也为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即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推向新的阶段，“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sup>1</sup>。立足当前思考语境，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应对当前价值领域中的问题进行充分反思，并遵循从理论到制度的系统机制，全方位展开建设。

## 一、“问题意识”中的理性思考

把握问题的原因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必要条件，也是政府公共决策的依据。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sup>2</sup>产生“问题意识”是问题解决的起点。问题意识当然也是构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思维前提。

---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9—290页。

## 1.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跟进状态

对一个社会共同体来说，能够有序地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具有成系统的制度机制，二是具有理性自觉的主体群体，三是能够将一个社会凝结在统一共同体的价值文化系统中。所以，一个结构严密、整合有序的共同体，必须形成一种占优势地位的、彰显主体自觉自信的文化和意识的共同体。

反观中国近些年的发展过程，文化、理论、民众素质和社会制度机制都在发展。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中国社会进行了理论大反思，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旧价值体系被思考甚至被变革，新的理论和价值体系在建立，竞争意识、金钱意识，“时间就是金钱”、个人利益等权益意识，都有发展。市场理性也在生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一度设置成我们国家的发展方针，社会的改革开放也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路线和方略。直至十八大报告中对公平效率关系做了更明确的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但社会理论、文化发展和市场经济发展也存在某些不适应的或滞后的问题。社会提出“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任务，构建得还不够理想，许多理念提出来了，但“有题目缺少故事内容”，“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理念都很好，但百姓不清楚和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社会主义，许多人也不很清楚，理论在建构和社会解释方面还有许多要完成的任务。

另外,社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转型期利益与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新旧道德的交锋,中西价值观的碰撞,以及道德价值标准多层次和多样化的趋势,也导致社会现实出现一些是非模糊、善恶不明、荣辱错位的问题;追求利益最大化往往被人们理解为市场经济的本质,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实用主义气息同时弥漫。社会现实中的多元价值氛围,会深深影响社会的主流道德教育。在“利己主义”和“唯金钱论”的社会语境中,谈论道德素质、道德力量,往往就会显得苍白。青少年在接受学校主流价值观教育的同时,也在接受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其他价值观的消解,有些教育工作者因此比喻说“ $5 + 2 = 0$ ”。社会中实际盛行的多元价值观,尤其是“唯利是图”“利己主义”等价值观,影响着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也影响着某些环境的舆论氛围。

许多年来,我们社会中时大时小总存在一种荣辱不明甚至道德虚无主义的声音。唯利是图、拜金主义大有市场,讲雷锋,讲道德,有时候反而会遭遇阻力。当社会有人对某现象进行道德批评时,就有声音指责说“在挥舞道德大棒”“占领道德制高点”;有媒体倡导崇高价值观,就有人出来给你贴上“伪崇高”的标签;总有人忽略或不屑道德的社会功能,总有人反感道德,“躲避崇高”。社会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道德崇高,但社会应有崇尚道德的价值取向。社会舆论如果容忍甚至鼓励不道德行为,“劣币驱逐良币”就同样会发生在道德生活领域。道德虚无主义甚至反感道德的声音强了,社会正能量价值观、道德观,就会在“沉默的螺旋”规律中沉默下去。

十八大提出了“文化强国”思路,但文化发展中首要就是要把握好文化价值观的构建,把握好文化产业建设和文化价值观建设的分寸。目前在我国文化建设上还存在某些没把握好的分寸问题,表现为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商业文化过分繁荣,“经济学帝国主义”盛行。

而商业性文化，往往易导向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媒体作者说，“这是一个没人关心‘文化’但所有人关心‘产业’的时代”，“文化造富”正演绎着新一轮的悲喜剧，“如果有一个行业目前可以用‘人傻、钱多，速来’形容，那一定是文化产业。”<sup>1</sup>而产业化的文化在信息媒体时代的表现就是文化产品的“眼球率”和收益率的导向。文化的产业发展不等于文化产业化，应有分寸把握。

美国历史学家罗兰·N.斯特龙伯格（Roland N.Stromberg）说，“文明也如人生，有其黄金时代，当青春的自发性与成熟的智慧混合在一起时，就会产生卓越的思想能力和表达能力。”<sup>2</sup>立足新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壮大，使社会日益开放与多元，但社会价值观并未与经济发展取得一致进步。可以说社会价值层面的问题，比其他领域中的问题要更突出。人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当前社会中多元化的政治思潮与社会思潮，冲击着主流价值体系，使社会价值观纷繁多样，良莠杂陈。“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强，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这些多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同时存在”<sup>3</sup>，与此同时，社会的梯度发展，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此延伸到文化领域，突出表现为市场思维渗透到思想价值领域，人们判断事物的价值原则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功利性，有些人“把赚钱看作是人人都必须追求的自身目的，看作是一项职业”<sup>4</sup>。这不是简单的道德现象问题，而是道德存在的

1 详见邹玲文，来源：中国企业家，<http://www.xj71.com/2012/0509/667906.shtml>。

2 [美]罗兰·N·斯特龙伯格著：《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赵国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3 新形势下思想文化领域内的人民内部矛盾，<http://marxism.org.cn/detail.asp?id=2241&Channel=4&ClassID=4>，2010年2月12日。

4 [德]马克思·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53页。

生态空间是否被挤压的问题。马丁·路德·金有句名言：“历史将会记录，在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小悦悦”事件、摔倒的老人无人敢扶、产品质量安全、腐败，种种引起公众关注的事件和现象，显示了当前社会某些领域道德失范问题。

如何反思这一切问题，如何提升社会道德风气和公民素质，如何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中国人的共同价值观，已经成为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 2. 多元社会价值观的并存与冲突

有人说：“‘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被列为未来 10 年的严峻挑战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当下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复杂情况和人们的复杂心态。”<sup>1</sup>

一般而言，由多样价值结构层次构成的社会价值体系，应该是同质化的。但当前中国社会的价值结构也存在一些特殊现象，即人们内心本应遵奉的社会信条，在一些人那里被非主流观念所替代。如有些人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作为自己的信条，为达自利而无视社会规范以及荣辱观。有些人对自己与对他人持双重价值规范标准，对他人提出道德要求，对自我却往往为利己行为寻找合理理由。

当前社会价值观是多元而复杂的，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各种思潮，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十八大报告也对此强调：“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学习教育，用社

---

1 李德顺：《价值观的“主流”与“边缘”》，人民论坛，2010 年第 5 期。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sup>1</sup>

价值观的多元首先表现为多种价值观的并存，表现为多样态的社会群体不同的价值追求。“每一个主体都有一整套价值坐标体系，不同主体之间在价值关系上不可能彼此重合或代替”<sup>2</sup>。市场经济中培育起来的竞争观念、效率观念、公平公正观念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但同时，公有制与私有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道路、制度和理念上的差异，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等多种价值观的对峙与冲突也表现出来，影响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与实践。

有人说：“这个时代的生存境况，信仰的贫瘠使人们在选择的困境中无处可逃地沦为人质：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作为发展目的的人，给拉动 GDP 的阶段性政策所绑架，沦为发展手段的人质；或者把个人一再突破底线的行为推诿给可能需要漫长演进才能完善的制度，沦为环境和制度的人质；或者是沦为记忆的人质，甘愿让现在与未来被历史绑架，或是某种宏大叙事的人质。”<sup>3</sup>这种多层次的社会价值结构以及多元价值观的并存，使得不同群体与领域的应有的共同底线价值有所缺失。

社会主义所倡导集体主义价值观，强调人的价值实现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坚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而市场理性强调理性经济人<sup>4</sup>，推论人们是在根据自己的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关系，来决定自己的行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

2 庞卫国：《价值多元与主导价值观》，求索，2003年第1期。

3 刘阳：《我们是谁的人质》，南风窗，2007年第9期。

4 “理性经济人”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国富论》中观点，之后经济学不断将“理性经济人”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即假定人都是利己的，而且在面临两种以上选择时，总会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行动方案。

为, 罗素曾认为, “中国为了生存下来, 反而不得不去选择那些损人利己的恶德。”<sup>1</sup> 虽然市场经济培养起了人们个人的主体意识, 但是也易滋长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价值观, “人类的目标是多样, 它们并不都是可以公度的 (incommensurable), 而且它们相互间往往处于永久的敌对状态。假定所有的价值能够用一个尺度来衡量, 以致稍加检视便可决定何者为最高, 在我看来这违背了我们的人是自由主体的知识, 把道德的决定看作是原则上由计算尺就可以完成的事情。”<sup>2</sup> 这种市场化过程中所滋生的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与集体主义、共同体主义价值观存在着本质区别和价值冲突。

德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也同样激烈。在德性与功利的选择中, 许多人往往选择后者。当利与义相悖时, 见利忘义成为许多人行为的摹写。这种被功利主义动机和行为所充斥的社会, 不仅损害了普通大众的利益, 而且会导致整个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 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 最终与和谐社会渐行渐远。德性价值可对人们行为产生某种直接约束, 还能对社会产生来自共同价值观的整合, 因此麦金泰尔才说, “美德是人类共同生存的纽带”。但麦金泰尔之所以看重德性伦理, 或者说社会需要德性文化的第三个原因, 是因为“道德理性”能弥补“工具理性”给社会带来的某种缺陷。工具理性往往导致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物欲主义, 还致使人的“单面”发展。人的物欲发展或畸形发展, 必会导致现代人的精神空虚、无意义感、苦闷焦躁等精神心理失衡, 进而引发社会规则失范、道德败坏、矛盾凸显、人际疏离、秩序紊乱等诸多问题, 公序良俗不再, 精神良知无存, 社会就真的危险和可怕了。

1 [英] 罗素:《中国问题》, 秦悦译, 学林出版社, 1996年, 第2页。

2 [英] 以塞亚·伯林:《自由论》, 胡传胜译, 译林出版社, 2003年, 第245页。

### 3. 不良价值观的规导缺位

不良价值观造成的社会影响是多方面的。功利主义尤其是利己主义者为了获取自我利益往往不择手段，荣耻不分甚至超越基本的做人底线。各行业潜规则盛行，大多潜规则都缺失基本道德底线，有些还会突破法律底线。

不良价值观的规导缺乏，首先表现在公共管理的缺位上。以往许多时候，人们普遍将 GDP 增长视为政绩提升的标志，许多政府部门在将经济建设摆在发展的重中之重同时，忽视了精神文明、道德建设和价值观文化的建设。这造成了政府在提升社会价值观这一重要领域的缺位，许多领域和部门对突破道德底线与无德行为都缺乏基本的监管、处罚等规导。

公共管理缺位还表现在“权力越位”“不作为”等方面。权力掌握群体——公务员，却常出现不作为、乱作为甚至贪污腐败等现象。调研和分析都表明，腐败是导致我国社会不公感的首要原因，也是引发“信任危机”社会根源之一，而公信力危机一定会削弱民众信心。对腐败、不公、不信和民心的逻辑关系以及严重性问题，人们已有所认知并开始大声疾呼。一位网友正告说：“任何一次不公正的得逞必将造成民心的进一步丧失，而一次次民愤的积累最后必将酿成大祸。”2012 年《长江日报》曾发表题为《赶紧收拾人心》的社评，强调诸多群体性冲突，是政府在攸关民众利益问题上，表现出对民意的轻视傲慢，蛮横与霸道，与民心渐行渐远的后果。经济发展的成就，不能等同或代替合法性资源的获取。合法性资源不是可以无限透支，修复合法性的时间也不是无限多，等等。<sup>1</sup> 这些声音都表现

---

1 《赶紧收拾人心》，2012 年 7 月 31 日武汉《长江日报》快评。



出社会对腐败、不公和民心问题的危机感。执政党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从严治党的“紧急令”，十八大报告中也强调指出：反腐问题“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腐败等公权私用问题不仅是影响社会心态让人们产生社会不公感的首要原因，也是影响社会和谐、社会主义信念以及建立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原因。

不良价值观的规导缺乏，还表现在制度规范的缺位上。我国在惩治不良行为的有效制度和相关配套措施不健全。比如大众关注和痛恨的权力腐败问题，就缺乏严格的制度机制规范。公共选择学派这样解释权力腐败：如果制度规章不严密，一些政府官员像其他“经济人”一样，会利用公共权力采取权力寻租的腐败行为而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必须制定并完善有关规章制度来约束握有公权力的人。<sup>1</sup>在社会生活中管理乏力也是社会秩序及其主流价值观难以为继的原因之一。无论是社会诚信失范问题，还是质量隐患、安全事故等假冒伪劣问题，一揭开问题，就会发现许多问题隐患普遍而又长期存在，要么制度细则不健全、操作性差、执行力衰减，要么缺乏部门有效管理，有些管理部门形同虚设，更糟糕的是许多人已经见怪不怪，习惯性违规违法。即便我们形成了一些制度规章，但由于缺乏相应执行而成了纸上、墙上的“休眠法规”。人们说，假如违规无德事情一开始就有部门管、法律管，出现一起纠正一起，怎么可能形成许多无序状态和违规失范心态。可见，制度规范的匮乏连同制度约束的低效加剧了核心价值观建构的难度，某种意义上，制度缺失和失序环境还易造就机会主义价值心态。

1 王振贤：《“经济人”假定的演变与发展》，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2期。

另外，在整个社会思想文化层面还缺乏对当前不良价值观的基本清理和辨析。这造成了一些人在许多问题上的是非不明，荣辱混淆。在新兴媒体时代如何跟进对价值观和思潮的辨析，更好传播主流价值观，更好进行大众文化建设，都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总之，不良价值观的规导缺位更加剧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难度。《读者》上有一句话，“制度让想犯错的人犯不了错；文化让有机会犯错的人不愿意犯错”。十八大会议已强调，“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报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五位一体”的总体发展布局中，几乎每一个领域都对诚信管理和制度机制建设做了专门强调。我们应该转变道德失范治理意识，提高制度规导意识，厘清道德荣辱、价值是非的界限。守住道德底线，弘扬核心价值观，需要制度规导。

## 二、核心价值观教育群体的重心锁定

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sup>1</sup> 因此，通过多种途径与手段，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政府、进企业、进社区、进校园，将会是未来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

---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

## 1. 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在每个时代，注定有些人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们，影响着社会。朱光潜先生在谈社会发展时说，社会的“生长滋大，就看它有无突变式的分子；换句话说，就看十字街头的矮人群中有没有几个大汉”<sup>1</sup>。历史上，总有一些人用道德力量感染社会，用知识来启迪大众，在特定历史关头影响局势的发展，这些人即有“影响力的人”。十八大报告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sup>2</sup>。去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应该也是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必需的举措。文人、知识分子、理论工作者，各类公众人物，由于其独特职业性质和社会身份，他的思想、观点及价值观，他的所作所为，随时随地都在从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影响着社会大众。时下学术讨论中活跃着各种知识分子领袖，网络舆论环境也有各种“意见领袖”在发挥着影响力。如果这些人自身都缺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认同，就不可能指望他们影响大众，在全社会形成社会主义价值共识。

公众人物是有影响力的人，他们的言行对社会有着不同一般民众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因而要注重对公众人物群体的价值观培育。

“公众人物”，一般是指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或社会知名度，并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人物。公众人物可指“公共官员”，也可指体育明星、演艺明星、科技明星、知识精英等各行各业的榜样人物。大众对明星或名人的认同感尤其是崇拜情感会产生“晕轮效应”，使人们不觉中认同、模仿偶像或信任之人身上所具有的一切行为特征和价值取向。而且公众人物由于在占有社会公共资源方面有得天

1 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2页。

2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

独厚的名人效应资本或公共平台，他们拥有独特的话语权和形象展示权，借由公共媒体资源平台，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受众。公众人物的价值观及其思想道德素质，会极大地影响社会价值观及其风尚的形成，尤其影响年轻一代的价值观与行为塑造。所以，在价值观建设方面，他们有着非常重要的社会影响力。社会应该对“有社会影响力”的群体重点进行塑造，使他们成为社会价值观形象的榜样，让他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发挥积极的影响力和引领作用。

## 2. 党员干部的率先垂范

党员干部和各级公务员担负着代表人民和国家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的重任，在价值观建设中，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非常重要。党员干部是一个群体，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角色，他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党员干部掌握公权，以保证其服务的有效性，“世上不法之事莫过于执行法律的人自己破坏法律”<sup>1</sup>，如果党员干部的道德行为不如普通百姓而成为道德低下的另类群体的话，那么公权私用的危险最终会扰乱社会秩序，损害普通大众的利益。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需要发挥党员干部的率先垂范作用。邓小平多次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群众对于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连长指导员不以身作则，就带不出好兵来；领导干部不做出好样子，就带不出部队的好风气，就出不了战斗力。”<sup>2</sup> 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党员、干部模范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

1 萨孟武：《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7页。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4页。

党的重要任务。”<sup>1</sup> 党员干部是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最重要群体，党员资格本身带有严格的道德要求标签，每一个党员干部必须在社会道德底线的要求之上，而不能仅以社会底线道德作为公权行使的道德准则，更不能按普通群众的道德要求来行使职权，借助于掌握的公权来践踏社会底线道德的行为是于法、于理、为民所不容的。

干部作为社会资源的管理者和执掌者，必须在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处于统领地位。诚如法国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所言：“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政府那样，对人民的风俗习惯产生如此直接的影响。”<sup>2</sup> 美国社会学家道格拉斯和瓦克斯勒同样也指出：“政府是一个感染力极强的以身示教的教师，不论教好教坏，它总是以自己的楷模行为教育整个民族。”<sup>3</sup> 在公权行使过程中，它自身的道德品质具有广泛的社会示范效应与影响力，政府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是联运机制有效运行的基础。孔子认为政府德性是社会道德建构的核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党员干部的率先垂范作用的发挥，不仅靠自觉，更要靠制度约束，注重党员干部监督机制作用的发挥。“现在再亮的灯下都有阴影，怎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呢？怎样才能不遮挡呢？党内的监督，老百姓的监督，立法机构的监督，传媒的监督，当各种光源对准一个焦距的时候，就不会有阴影了，这就是‘无影灯’的效果。”<sup>4</sup> 在党员干部的监督中，要推动群众的底线监督，尤其是在当前强调“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氛围中，更要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社会监

1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

2 霍尔巴赫：《自然政治论》，陈太先，睦茂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330页。

3 杰克·道格拉斯，贾西兰斯·C，瓦格斯勒：《越轨社会学概论》，张宁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87—388页。

4 杨晨雨：《文化视点：武和平新书有兰州打黑的影子》，兰州晨报，2006年7月27日。

管作用，即由群众评价党员干部是否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要发挥党员干部群体的内部监督功能，即以党员干部更高标准的价值要求来评价其行为是否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

### 3. 学术共同体的责任关注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现代理念也在广而告之这个道理：“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理论文化已越来越成为当今国家发展、国际竞争不可或缺的软力量。十八大报告中也提出了“文化强国”的发展理念，这本身就表明中国在发展战略层面有了更多的文化理论自觉。理论及其价值取向，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社会发​​展道路的旗帜，理论是“一种特有的思想先导作用，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或社会危机时期，意识形态常常成为社会动员人们向既定的方向和目标前进的一面思想旗帜”<sup>1</sup>。

一个国家必须要有成熟的理论或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发展，指导道路选择。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有什么样的核心价值及其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发展道路。十八大报告强调说，“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中国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党应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而道路自信必须建立在理论自信 and 理论自觉基础之上。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想要秩序，要发展，就需要建构正确的成熟的理论体系并在其指导下合理发展。理论和文化主导社会的思考，主导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和方式。中国要走

---

1 [美] 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6页。

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就要构筑并坚守自己的理论基础和价值信念。

在当前中国“文化强国”战略部署中,要关注并改变我们理论储备和理论大众化相对不足的状况,在打造中国文化软实力任务中,中国特色的“理论构建”应是重中之重。而学术共同体作为集理论构建、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教育任务为一身的群体,在文化强国以及理论建设和理论教育方面,具有独特的理论责任地位。他们“界定本民族文明层次的核心价值观,最终形成一个正统的社会主流体系。主流价值体系形成后,知识精英们要自觉担责巩固这个体系,当好核心价值体系的先行者,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起到统率作用”<sup>1</sup>。所以,学术共同体,尤其是从事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研究的学术群体,由于其独特的工作性质和职责身份,在理论建设和理论教育方面就更加任重而道远。学者、文人在教学和研究中的理论、观点及教学,自觉不自觉地都在从理论层面、价值观层面影响着学生和社会公众,更应当在理论研究和理论教育中,多一份对中国理论及其核心价值观的自觉。

目前我国社会理论环境和舆论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过程中还存在着思想文化方面的不和谐因素,它们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产生着一定的干扰和误导作用。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理论价值体系,如何通过教育和传播使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使大众对民族、国家和社会发展目标认同,形成“最大公约”的共同价值观,中国特色的理论如何在“中国模式”中显现,如何更好地指导国家与社会的发展,这一切既是时代提出的任务,也是一种国家能力。中国道路需要主导理论和价值文化指导,更需要中国学术共同体基于对中国理论的自信与自觉基础上的理性建构。所

1 玛雅:《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三联书店,2008年,第327页。

以，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学术个共同应该是必须关注和加强建设的重点群体。应该促使文人、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坚持正确理论导向，在核心价值观大众化过程中发挥正能量的影响作用。

#### 4. 注重青少年的“养成教育”

我们所处的国家和社会已进入彰显公民主体性的时代，无论是制度自信还是道路和理论的自信，最终都要落实于社会公民对制度、道路和理论的自觉。现代社会要求我们无论从国家发展战略还是社会具体管理，都要充分注意诉诸公民的主体性。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离不开公民成熟的政治素质，也离不开公民的社会道德品质。十八大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发展目标，提出了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建设理念，当然也就非常需要具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品德的公民素质力量。它们是三个“倡导”中的一组核心价值关键词，也是公民应具备的基本道德素质。

青少年群体是公民素质提升的重点人群，是关系民族、国家能否永久兴旺发达的关键人群，也是需要加强正确价值观教育的人生阶段群体。十八大报告强调核心价值观教育应走入课堂、走入家庭，全方位走入青少年的社会生活。

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实施要注重“三位一体”社会联动教育机制，政府整合社会资源，并为核心价值观教育制度与资源提供保障；学校承担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职责；家庭在教育价值取向和方法上与学校、社会保持一致，并督促青少年在日常行为中践行核心价值观。



事实上许多国家都将社会价值意识教育作为大学生教育的重要内容,以此建构社会思想理论支撑,整合社会共同价值观。如美国,也很注重向美国国民尤其是美国青少年灌输国家价值意识,进而培养美国公民的国民精神。韩国政府也一直坚持将道德课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课程,其内容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完善,但其始终将韩国价值意识教育作为最核心的内容。<sup>1</sup>

另外,如何更好地传授理论和价值,在“传道”方式上不断思考和跟进,也是一种自觉,而他国隐性、渗透式的价值观教育方式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隐性教育强调让学生在“无意识”的境界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葛兰西说意识形态教育往往是“心理学的”“弥漫式的”“毛细血管式的”,强调的就是这种在学生的价值观教育中要注重渗透和潜移默化的方式。他国在对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时很注意借助“第二课堂”资源,教育不仅在课堂和书本上,也在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中。如美国就很注重学校、家庭、社区、教会、政府、传媒等形成的教育合力,韩国更是明确提出了“体会”式教育,曾在韩国游学的一位教师感受说,韩国小学教育基本就是生活体验课。<sup>2</sup>日本则更注重全国教育的一体化,建立学校以及文部省、都、道、府、县、市、町、村教育部门多元一体的青少年教育体系。我们在理论和核心价值观大众化方面,应借鉴他国隐形和“润物无声”的教育方式。

1 [韩]汉城大学道德课教育课程改订研究会:《第七次中小学道德课教育课改订研究》,《1997年教育部咨询报告》,1997年10月,第112页。

2 <http://xxh310.blog.163.com/blog/static/771495402011041093588/>。

### 三、优化核心价值的传播能力

“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提高传播能力”，是十八大提出的新要求。当代传媒发展已呈现出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主流媒体与大众个体微媒体等多维共存的图景。在信息化时代，媒体因其公共话语权和特有的社会影响力，在社会价值观营造中，在对公众的影响中，其功能和责任都首当其冲。按照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波兹曼的说法，“公共媒体的意义和能量，有时候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信息时代“人们已经被媒体控制”。社会价值文化产品和其他产品不同，如何定位“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性质和分寸，如何理性规导社会舆论之场，如何减少负面能量对公众意识的影响，引导社会正能量价值观，都是社会传播机构应认真思考和践行的问题，而公共媒体，在社会价值文化建设中，在社会心态的引导和建设，任重而道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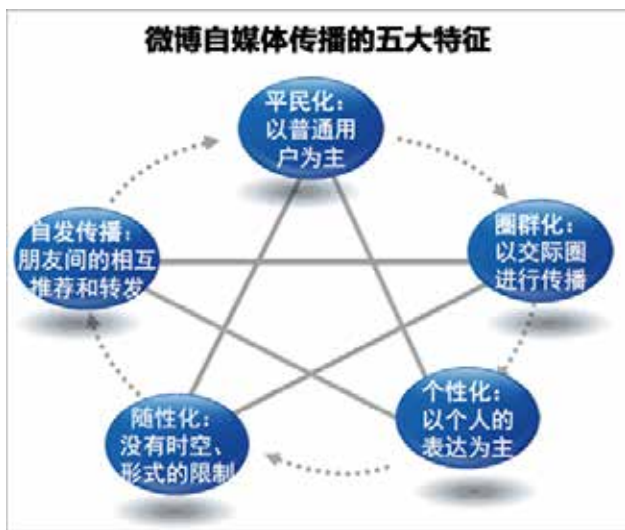
#### 1. 现代传媒的欲说还休

现代传媒“作为一种文化的技术逻辑和力量，无情地塑造着大众的文化习性，人们通过媒介接受文化已经成为社会教育的普遍方式”<sup>1</sup>。它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行为选择。媒介化社会的来临，使人们的生活每天被各种媒介信息包围，当人们心甘情愿地将自己每天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交给媒介来掌控时，他们甚至逐渐忘记媒介作为中介属性的存在，正如麦克卢汉所说的：“鱼儿知道它在水里吗？”有研究者把这种状态称作媒介化社会的“婴儿态”问题，即人对媒体具有了深度依赖。

---

1 陈正良：《冲突与整合：德育环境的系统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98页。

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兴媒体的定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的确，新兴媒体把每一个人都纳入到媒体传播的范围中，改变了传统的单向度传播方式，使传播在从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互动行为与可持续化传播。不管如何界定新兴媒体，其关键点在于，它扩展了媒体传播领域和方式，推动着社会向国际化、跨文化、跨民族化及多元化方向发展。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新兴的“自媒体”时代也给现代社会带来了新问题，比如，传统权威体系被解构，不同素养与智识水平的人，其传播地位与传播手段的日趋平等，道德水准内容的极大差异，传播方式的无序化、匿名化、宣泄化、无责化，一些主体的无道德化、非理性、网络暴力、网络欺诈等，这些问题都会给社会秩序和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多困扰。



来源：万瑞数据《微博媒体特性及用户使用状况研究报告》，2010年8月

新兴媒体传播所造成的诸多问题，是技术掌控挑战传统管理体系的反应和表现。虽然政府仍掌握着对传媒的管理权威，但技术主导下的媒体传播的技术控制这一特征，使得许多人突破政府治理规

范成为可能，如此，政府在治理新兴媒体过程中所主张的价值观，很可能会遭受到技术主导的传播行为的游离和挑战。

当现代传媒以动感的情节和华丽的影像把某种价值观传递给受众时，当微博、微信以最简洁的即时信息传递并给人话语权时，人们有可能离真相更近，也有可能被海量信息迷惑或误导，“眼见不一定为实”，现象不一定等于真相。“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对自身的这种需求自己有时也是糊涂的，整个状态就是，媒体不知道自己应该是什么样的媒体，受众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受众。”<sup>1</sup>因此，有些媒体借真实的形式，传播有选择性的信息，有些媒体内容缺乏多维视角，只选择猎奇点而不顾事情真相进行传播。尤其是现代传媒的过度市场化、“眼球经济”倾向，使一些媒体开始突破传播职业应有的社会责任底线。有的媒体变成了社会猎奇的眼睛，过于八卦的叙事，浪费现代传播资源，侵占大众时间，使大众更多沉迷于无思考的信息流中。大众传媒的内容“越来越大的部分是让人娱乐而不是以开导教育为目的，……甚至几乎全部内容都有一种普遍化的游戏或娱乐的功能”<sup>2</sup>。而主流社会媒体一度过于严肃的面孔又因缺乏媒体吸引力，造成主流价值观传播的困难；更应注意的是，价值观的某些简单化传播，还往往会带来传播的异化——即大众对主流媒体信息权威性的质疑和失信。

现代传媒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和依托，“如果一个传媒能够为主流人群在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提供卓有成效的信息支撑、知识支撑和智慧支撑，那么这个传媒之于社会的价值就

---

1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中央电视台社会记录栏目，2006年5月27日。

2 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37页。

十分巨大。”<sup>1</sup>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优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成为如何运用好现代传媒这个时代工具。

## 2. 传媒伦理的重申与规范建构

新闻学中的“冰山理论”（iceberg theory）由西方学者麦克康伯提出，是对媒体报道新闻事件的行为特点的一种理论概括。该理论旨在说明新闻传播者自身的局限性会导致传媒的片面性和对真相的远离。媒体人如海上行船，观察、欣赏美丽的风光，发现眼中世界的新奇，搜索危险的信号。但当冰山来临时，航行者能观察到的只是冰山的顶端，借助于媒介所传播的情况即使是真实的，也仅是冰山一角，而海底下冰山的主要部分却难以观察。新闻传播者与新闻传播机制的自身局限是导致冰山现象产生的重要因素，此外还有另一重要因素，即传媒人的职业水准和伦理水平。

传媒人的职业和道德素质是传播能力的基础，如何使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传播满足大众的信息需求，又引领大众的精神文化品位，凝聚社会精神，是对传播业者的基本要求，“脱离大众的传播将失去生存的土壤，不能达到传播的目的。但传播的价值取向不能停留在大众化的层面，不能等同于大众，更不能做大众的‘尾巴’，因为如果这样，大众化就会逐步沦为平庸化甚至低俗化，传播便不能达到引导社会积极向上的目的……要迎着大众，却不迎合大众；亲近大众，又不止于大众；眼光朝前朝远，并努力提升大众的精神品味，这是当代传媒所应有的价值取向。”<sup>2</sup>所以提高大众传媒及其从业人员的职责水准是关键环节。如果多数新闻人都能做到心中有良知、

1 喻国明：《影响力经济——对传媒产业本质的一种诠释》，转引自王岳川《媒介哲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5页。

2 廖梦君：《现代传媒价值取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脑中有理性，坚守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大众传媒才能真正肩负起社会监督批判与传播正能量的社会使命。

对传媒伦理的忽视，尤其是缺乏传媒伦理的规范制约，会造成媒体负功能的泛滥。媒体被称作“无冕之王”，当代西方把媒体称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可见传媒在社会信息传播中举足轻重的权力地位。媒体这种“第四权”和任何权力一样，如果滥用都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有学者认为，某些大众传媒在解构中国传统道德价值方面扮演了不到位角色，有人甚至认为当前的社会道德失范现象和大众传媒的某种“失重”息息相关，有学者因此称当前某些传媒是“倾斜的精神之塔”。传媒领域的一些道德失范已深重影响了大众的价值选择。目前看，各媒体在社会扬荣贬耻的价值观引导力度、权重还要有所加大，诸媒体尤其是新型媒体，必须改变“收视率”“点击率”为主导的市场化取向。负有独特舆论责任的公众媒体应该比常人更多一只“慧眼”，能“看透”纷乱社会现象后的本质，能把握局部、角落和全局、主流的区别，能理性掌握舆论宣传的效果和话语分寸，在积极的、阳光的社会价值观正能量营造中发挥更大作用。

规导“E时代”的传媒尤其是新媒体的价值取向，应从技术和法规双重制约入手。比如，着力提升网络媒体的监管规范能力，建立信息发布与传播的责任体系，完善信息主体责任立法，对虚假信息 and 真实信息、不良信息与客观信息进行区分，对不负责任的网络谣言和网络谩骂予以责任制约，做到传播必有责。在新兴媒体时代，媒体伦理的重塑要通过制度机制的规范来保障实施，应以法律制度手段来规导新兴媒体的发展，同时传媒业者以及新兴媒体中的公众，也应有更多的媒体素养、道德素养和社会理性自律，共同促进社会

传播生态的优化。

### 3. 把握自媒体时代文化传播中的互动规律

除了具备基本的物质、技术依托和传播工具外,社会核心价值场域的建立还必须立足其所存在的土壤,即要把核心价值体系传播到社会场域中的大众之中。我们可将这一价值观的传播过程称为大众化过程。除了传播机制的保障,有效的文化传播还需重视一个不容忽视的变量,即在信息、价值观传播中的受众心理及其传播互动状态。把握受众心理和现代传播互动规律,是核心价值体系有效传播的重要保障。十八大报告在国家战略的层面,对此给予了充分重视。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sup>1</sup>,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量突破5亿,达到5.13亿,全年新增网民5580万。这一庞大的网络人群结构由不同的年龄、学历、经历和职业等人群构成。庞大的网络人群的参与,扩充了信息传播的流量、速度和范围。面对纷繁复杂的多元信息,尤其是在面对极易刺激大众神经的网络公共事件的时候,如何做到在信息流中去伪存真、冷静围观、理性思考和正能量的传播和张扬。

与媒介化社会存在的“话语权分解”问题相关,“碎片化”“去中心化”的新传播模式,造就了网络信息世界新的“舆论生态”。网络时代的大众传媒尤其是新兴媒体就是这样,把更多的传播主动权赋予给普通个体,人们参与到信息的传播甚至制作过程中,每个人都受他人信息影响,同时每个人的信息也在影响着他人。在这个“自媒体”为特征的时代,个人网站、微博、微信层出不穷,新兴

1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http://www.cnnic.net.cn/cnnicztzl/hlwtj15n/>。

媒体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线性传播模式，非线性传播使任何一个信息节点都可成为网络中心向四方辐射。在这个过程中，也造就了诸多新一代的“意见领袖”，他们在千万粉丝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新意见领袖的出现，消解了传统媒介社会中的权威舆论渠道和话语权力，导致了话语权的碎片化。由于意见领袖的公众关注度高，他们发布的任何消息，其中包括很多未经核实的信息，有可能助长虚假信息的泛滥。另外，由于一些意见领袖自身就缺乏自律，甚至为了聚集人气、吸引网民眼球以及商业利益，在网络上发布极端言论，放大社会矛盾，引发网络舆论的偏极现象。意见领袖的特点使得他们既可能对社会发挥正能量引导，也能造成负能量价值观的散布，甚至会造成如“秦火火”一样利用网络工具和人气达到诈取钱财的目的。网络意见领袖的出现和流行，体现了当前我国社会理性宽容和多元进步的一面，也给媒体的舆论引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众传播理论中还有个“沉默的螺旋”理论，是对大众传播中个体在接受与传播时受话语权与言说者威权性的影响所产生状态的一种概括。即如果受众主体在舆论场中感觉自己的观点是少数派，他们就不愿表达自己的观念；反之，如认为自己与多数人的观点一致，他们就会勇于表达和传播。于是自然会是少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小，多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大，形成一种螺旋式“沉默”下降的模式。在新媒介时代，受众与传播者之间的界线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受众不仅参与到传播过程中，而且也决定着传播速度、方向和目的实现状况，受众的规模及传播状态等，深刻地影响着传播的效果。这提示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中，一定要关注受众与传播者的心理规律，营造正能量发挥的舆论场。

在网络生活深深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时代，还有个网络理性围



观如何实现的问题。网络超越了时空限制,无限多的人可以通过现代媒介同时关注一件事情。“网络围观”几乎成了每一个网民都参与和经历过的事。围观中有理性关注和思考,也有非理性围攻或情绪宣泄,这是网络主体多层次化、多元化在自媒体信息生态中的自然状况。一般来说,网络围观行为中会集合网民的社会思考,也有生活压力和社会情绪,有对社会腐败和不公现象的痛恨与无奈,对暴富阶层的“羡慕嫉妒恨”,有对自我人生理想实现差距的失望,对社会比较后的心理失衡,等等,有时候事件本身则成了一个载体。在多种因素和情绪心态交织中,网络舆论和价值导向就会出现比较复杂的“万象生态”。加之网络围观事件所牵涉的并不仅是公众人物、文化精英,还有大量普通公民,而且群体效应往往会增加一些无责的“偏差”和“冲动”。正如阿伦森在《社会心理学》中指出的,“当人们处于群体当中时,对行为的规范限制就会放松,导致冲动行为和偏差行为的增加”<sup>1</sup>,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也说,个体一旦参加到群体之中,由于匿名、模仿、染、暗示、顺从等心理因素的作用,个体就会丧失理性和责任感,表现出冲动而具有攻击性等过激行动。<sup>2</sup>在此情形下,网络传播与网络围观“热议”,就有可能越界或导致不实言论甚至负能量信息的传播,这些都对社会秩序、社会价值观和社会风气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必须遵循现代传媒文化传播的规律,一方面,应改变传统简单的灌输与宣教方式,充分了解大众在接受和传播中的内在诉求、认知结构和心理状态,在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过程中,警惕传播的异化,即缺乏与大众心理的基本互动而只

1 [美]阿伦森等:《社会心理学》,侯玉波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248页。

2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

盲目和刻意的传播空洞理念，造成受众对这种价值观的失信、远离甚至反感。另一方面，也要针对新媒体时代的新问题，加强对互联网传播的技术、制度的规范和管理，媒体以及网络公众，也应在相关制度机制规导下多一些道德自律和社会责任感。

## 四、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化与大众化，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上下共同努力和多维度的机制建设。

### 1. 加强理论构建与理论阐释力

十八大报告强调，“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中国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党应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而道路自信必须建立在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基础之上。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想要秩序，要发展，就需要建构正确的、成熟的理论体系并在其指导下合理发展。理论和文化主导社会的思考，主导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 and 方式。中国要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就要构筑并坚守自己的理论基础和价值信念。

#### （1）价值观生态从社会理论建构开始

理论是社会发展的思想灵魂，有什么样的理论，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和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发展模式，什么样的社会风气。理论为社会价值观生态提供思想底气或支撑。而营造核心价值体系的社

会理论生态，基本思路应从三个维度出发：

一是构建中国自己的理论范式和体系。总体来看，我们国家的理论已有基本的框架和体系，从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可见，国家层面对国际竞争中文化实力重要性已有越来越多的自觉意识。但在具体论域层面，仍感许多领域还缺乏应有的成熟理论论点，许多问题还没有调研深透。在当前中国“文化强国”战略部署中，要关注并改变我们理论储备相对不足的状况，打造中国文化软实力，中国特色的“理论构建”应是重中之重。总体来看，中国理论已有基本的框架和体系，从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可见，国家层面对国际竞争中文化实力重要性已有越来越多的自觉意识，但在某些具体论域层面，仍感还缺乏应有的成熟理论，许多问题没有研究深透，许多理论没有构建起来，许多思潮没有厘清，许多道理没有讲清楚。

二是要对诸多理论和价值观进行反思把握。厘清各种理论思潮能更好地把握社会价值导向。市场经济发展决定了社会利益主体的独立性和多样性，现代社会也给予了人们选择多元、多样价值的自由和空间。开放的社会也带来了西方世界形形色色的思潮和价值观。但无论是多元利益主体，还是多元价值取向，都必须相容在一元价值理性统领下，相洽在有序整合的社会组织机制中。如果对各种社会思潮缺乏总体了解和透视，就不可能在社会价值导向上有一个主动的驾驭。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易使人在沉迷于物质享受和物质攫取的同时，失落人的精神家园，在物欲追逐中遗忘或迷失人生意义和人格的尊严。弗洛姆因此说，“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他批判现代西方物质主义文化使人沦落成一种物欲动物<sup>1</sup>；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在人性理论上否

1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第370页。

定人的社会本质,以利己自保定位人性,它以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描述人际竞争关系,主张个人本位,他人被当作实现自我利益的工具,这种理论和观念必导向不择手段追求一己私利;而“经济人”理论,则导致自我逐利是必然选择的价值观思维,导致对人的精神人格和美德人性的不确定。如果对各种社会思潮没有总体了解和透视,就不可能在社会价值导向上有一个主动的驾驭。

三是做好价值观舆论和大众化的理论阐释。理论阐释力本身也是理论构建和正能量的一部分。从某种角度看,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和不同人群的价值观状态、大众价值观的多元化与异质化是相关的,和多样态甚至相互冲突的价值观的现实共存状态相关,当然,也和社会理论构建以及理论辨析和理论阐释力不足有关。所以,要关注理论如何大众化的问题,从解释的力度、广度上,从大众文化建设上,都要做足功课。大众文化是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承载媒介,对于文化这样具有价值意识属性的特殊领域,国家应承担起其发展的更多责任,不能简单走“市场化”“产业化”道路,文化领域的改革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结合起来通盘考虑。如果社会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大力强调核心价值理念,同时又不在于其在大众文化中的语境引导,大众文化最终就会远离社会核心价值理论。

在核心价值观如何传播和教育传递中,还存在“话语系统”进一步向大众和日常转换的问题,存在如何进一步“讲实话”“讲短话”的问题。目前可否说存在着三种“话语方式”?即文件规范话语方式,理论学术话语方式,还有就是大众日常话语方式。三种方式在不同运用领域各有其必要与合理性,但在落实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问题时,要考虑理论、价值形态的语言、文风转换问题,学会运用时

代和大众的语言方式做解释和表达，提高理论的“阐释能力”。

## （2）价值观生态的“合成系统”

要注重解决核心价值观引领和舆论氛围的“合成系统”建设问题。目前看，社会主流价值观教育和大众生活环境“教育”存在一定的“5+2=0”现象，学校课堂教育、主流媒体的“主旋律”，往往被来自家庭和社会生活的价值观“教育”消解掉了。而坊间大众舆论因为“E时代”特性对主流价值观的宣教模式产生了一定的挑战。大众舆论是大众的意识观念、心态和经验表达，它本身就是社会个体思想观念互动的一种合力，一定意义上说，大众舆论对大众更具有潜在“导向”和“教育”作用。大众舆论发育具有一定的自发性，但也可以通过自觉调控和引导培育起来。

## 2. 整合多元时代的价值共识

我们已进入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时代。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包容互鉴，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sup>1</sup>

多元社会中多元价值观的共存，给负面价值观的存在提供了生存空间。“不同时代的价值观并存，‘价值多样’导致无所适从的现象比较突出，社会对平民大众的价值取向缺乏有说服力的分析和引导，从而出现了‘价值错位’；价值真空、价值多样、价值错位

---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

和价值悬置，综合起来，又导致了‘价值虚无’的状况”<sup>1</sup>。对同一种社会现象，往往会发出多种价值判断，许多价值判断甚至相互矛盾、互相冲突。如果社会价值出于矛盾和无序状态，社会秩序和个体价值观就不可能良好实现，也就更谈不上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化和大众化了。所以，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反思我们社会的价值观现状，关注社会道德文化的建设。

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多元价值观，一些时候和一些领域，弥漫着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价值观念和思潮，它们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发展中产生了种种消极作用。物质主义使人们在经济活动中陷入对物质财富的攫取和崇拜中，在沉迷于物质享乐的同时，往往会失落人的精神家园。在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引导下，人们远离了人所应有的精神追求，人生的意义和人格尊严都遗忘在物欲和享乐的追逐之中。弗洛姆指出：“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他批判现代西方物质主义文化使人沦落成一种物欲动物<sup>2</sup>；利己主义的谬误在于，在人性理论上否认人的社会性本质，认为“趋利避苦”、利己自保是人的自然本能，它以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来描述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主张个人本位，个人利益至上，他人被当作实现自我利益的工具，这种理论和观念必然导向人们不择手段地追求一己私利。一个流行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价值观的社会，必会导致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个体追求个人利益，地方政府以GDP增长为指标，一切向“钱”看齐，甚至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在一个人人逐利的社会，道德一定缺失和滑坡，而一个只讲自我利益不讲对他人和国家责任和奉献的社会，是没有未来和希

1 陈亚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2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第370页。

望的。所以,要想提升社会公众的道德水平,形成社会共同价值观,改善社会正能量现象,就必须对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理论和价值观进行社会性反思批判,切实关注并加强社会价值文化的建设。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生态文明融入政治、经济与文化建设的战略,这一战略落实到具体的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文化可以视为一个文化系统的存在,包括文化内在体系与文化存在环境,二者之间的有效协调与共生,即可以称为文化的生态化形态。但不同领域的社会价值观的存在,也和独特的场域相关。一旦不同的价值场域缺乏边界意识,把A场域的价值原则应用于B场域,也会造成价值行为的错乱与无序。比如家庭生活场域的价值观应以亲情与孝道为基础,市场经济场域的价值观必须以公平竞争、经济收益来实现价值。如把市场的经济功利价值原则简单引入家庭生活领域,亲情与孝道就会受到伤害。所以,多样化的价值观应该相洽在一元的价值导向中。

价值多样性取决于社会现实基础的复杂性。不同的社会存在,多种利益主体及其关系,社会的发展变化,社会思想的相互激荡,都会造成现实社会中价值的多样性。价值多样性同时也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越多承认各主体的现实利益需求和层次差别,就越多赋予了人们自主选择价值取向的自由和空间;越多容纳各文化的特色和价值差异,也越显示社会的宽容和文明。

社会发展必须由一定社会价值体系设定目标,社会文明秩序、民族凝聚力、国家竞争实力,也都离不开一元价值导向的引领和整合。一元导向和多样取向的价值关系,会表现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

与各种社会价值观的关系。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主体和灵魂，在所有价值目标中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对社会意识和思潮具有引领和整合功能。可以说，在一个缺乏共同价值理念、价值规范无序的社会环境中，是不可能真正建设好秩序、富强、和谐社会的。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价值取向，要注意避免两种极端，一种是强调指导思想“一元化”时，忽视甚至抹杀社会价值观的多样性。另一种是在强调思想文化“多样性”时，放弃核心价值体系的中心地位。在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要坚持思想文化的多样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命活力的体现；要在尊重社会思想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坚持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地位。核心价值体系对多样价值取向的整合，源自社会公众的价值认同。事实上很多国家都将社会共同价值观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部分。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加强荣辱观等基础道德建设，也是对社会共同价值观进行普遍确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全球化进程中，保证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保障良好社会秩序，整合凝聚中国大众力量，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实力，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实现中国梦。

### 3. 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制度保障

国家主流价值观要获得大众认同并保持稳定性与持续性，国家的政治制度、法规与行政行为就必须很好地体现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使政治制度、法律制约成为价值观的最有力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成为核心价值观社会化的最有力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化、大众化，必须借助于成系统的制度机制才能



更好地实现。

创新制度机制，强化激励约束，是推动社会大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所在。“一个社会，如果缺乏刺激因素激励社会成员参与推动经济增长的活动，就会出现零度增长”<sup>1</sup>。同样，人们在选择和接受某种价值规范时，除了受理论和舆论宣传本身的影响外，事实上不可能不考虑践行这种价值规范的实际效益。如果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总是与社会存在以及人们的实际利益不一致或相互冲突——选择道德价值做事的人总有所失，而唯利是图的人总能得到现实实惠，也不必承担道德责任，现实中好人往往得不到“好报”“老实人”经常吃亏、英雄流血又流泪，“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贱是卑贱者的通行证”，那么社会所宣传的道德价值观就难以被人们认同、接受。

也就是说，当社会制度安排不能有效维护正能量价值取向时，负能量及其价值取向就会普遍出现。博弈论认为，制度机制可以规导人们放弃负能量价值选择。例如，如果社会在谴责唯利是图的失信行为及其价值观的同时，加强制度性制约，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看到失信者的后果，就会规导人们认可并选择诚信价值观。社会风气及其价值观念往往是建立在法规、制度及社会管理的规导基础上的。一个社会要倡导什么，除了价值观的宣传教育，还要有制度规导养成。目前我国在荣辱观上的某些错位现象，某些对道德价值的不屑一顾，都和相关的制度机制规导支撑不够相关。比如，如果仅在社会宣传教育层面要求人们见义勇为，而缺乏制度层面的规导，见义勇为价值观和社会风气就很难真正树立。许多国家都有具体法

---

1 [美] 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张炳九译，学苑出版社，1988年，第1页。

律进行相关规制。法国《法国刑法典》有“怠于给予救助罪”，美国有《救援责任法》《善行法案》和《好撒马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加拿大有《见义勇为法》等，相对来讲，我国在见义勇为价值驱动方面还需更多制度细则去规导。可见，现实中的制度很大程度地规导着人们认同和践行社会价值观。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sup>1</sup>；密尔也说，“当社会不利于人常常运用高尚的情感时，这种情感就会由于缺乏培养而枯死”；诺思也指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sup>2</sup>。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制度建设，势必要通过制度机制的设置，把核心价值渗透和体现到制度设计、政策法规制定和社会管理之中。这就要在健全完善长效宣传教育制度的同时，注重构筑价值观与利益回报相统一的价值观规导机制。还应按照社会核心价值基本理念，健全各行各业的规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使核心价值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价值导向。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2页。

2 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5页。

## 后 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sup>1</sup> 安东尼奥·葛兰西把包含核心价值的意识形态称之为“社会水泥”，他认为“在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的统一中，意识形态起了团结统一的水泥作用”。美国社会价值和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专家丹尼尔·贝尔指出，一种价值体系成为意识形态之后，“它就会变成为动员社会成员、强化纪律和维护社会控制的手段”<sup>2</sup>。美国政治学家迈克尔·罗斯金则这样看待核心意识：“当理念变得更加实用、更为现实，意识形态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凝合剂，能够把各种运动、党派、革命团体都聚合起来。为了更好地奋斗，承受牺牲，人们需要意识形态的激励，他们需要某些东西成为信仰的对象。”<sup>3</sup>

总之，核心价值、共同理想是社会、国家、政党的精神力量，一个国家若没有自己的精神信仰就等于没有国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失去长远发展的根基和源泉。对中国而言，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

---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

2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107页。

3 [美]迈克尔·罗斯金：《政治科学》，林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05页。

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sup>1</sup>。我们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共同理想来塑造灵魂，支撑国家，整合社会，构筑共同价值观，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执政党和中国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并在中国特色发展进程中，获得更多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

本书总体思路和提纲框架设定主要由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葛晨虹教授负责。其中运用了“公民思想道德与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研究”课题的相关调研和数据内容，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基地的现实道德研究所在书稿写作中也发挥了有效的平台作用。本书“第一章 何以必要：中国为什么要建设核心价值体系”由葛晨虹撰写，“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由袁和静撰写，“第三章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由张英魁撰写，“第四章 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是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由张霄、葛晨虹撰写，“第五章 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基础”由郑小九撰写，“第六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由张英魁撰写。

葛晨虹教授负责对全书做了最终的内容审定和修改。除此之外，

---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1页，第190页。

贾雪丽、吴西亮、钟锡进、牛绍娜博士，吴迪、兰超硕士等，也参与了本书的资料整理和校对等工作。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办公室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支持资助，特此感谢！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人民出版社，尤其是出版社的杨刚、吕克农、张明同志也为本书出版做了大量辛勤工作，再此一并表示感谢！